

1984
革新版

8
月號

CHINA TIDE REVIEW

夏潮論壇

● 思想的 ● 歷史的 ● 文化的 ● 批判的

戴國輝 ● 李哲夫 ● 思想性對談

焦點

台灣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地底的嘯喊／煤礦工人說礦難

張金策的許信良批判——「膨風的革命家」

孫中山先生對勞基法的嚴厲批判

現代史秘辛／吳國楨八十憶往

● 勞動者是人不是物 ● 黃順興論台灣話 ● 海外
中國知識份子的方向

頂峰書店
台南市府前路一號
電話：27371

在一個「消費資源競爭」的社會裡，內化了的消費心態能夠將一切反體制和非體制的事務都消費品化。目前在台灣這種趨勢已愈來愈明顯，「黨外」逐漸成為一個人們愛好新奇的消費心理下的一種消費品，被消費品化之後的黨外，成了人們每日忙於衣食享樂之後發洩其疏離感或浪漫情緒的消費品，群眾變成觀眾。最好的黨外是那些能將「黨外」這種商品賣得最好的。而既然是商品化，就難以避免商品價值的消費價值折舊。

南方朔，「面臨解體危機的黨外運動」。夏潮論壇五月號，頁九。

時至今日，在整個遼闊的第三世界中，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認識，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近幼稚的幻想。

黨外和國府一樣，為美國是否堅定支持台灣而心煩慮亂，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流淚。他們同為美國與中共間各種公報、文件中的措辭，各搞各的拆字遊戰，各自尋找「美國人愛我不愛你」的證據，樓樓惶惶，不可終日。

趙定一「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夏潮論壇六月號，頁二、三四。

很多同鄉不滿現狀，常常自閉守關地，不願把自己的台灣的「位置」擺在世界地圖，亞洲地圖，全中國的地圖來瞄一瞄，來思考思考我們自己所站有的地位（當然包括歷史地位）。

但我們為了明察「台灣何去何從」的課題，我們還得從全中國史，從亞洲史，從世界史的連關上面作好台灣史的定位來考察問題，才不至於陷入自己的小「框框」，溺死於「小浴池」裏頭。

戴國輝「研究台灣史經驗談」。夏潮論壇三月號，頁三五。

類似這些精彩、深刻的話語和文章，在每一期夏潮論壇上，所在多有。

夏潮論壇不是另一本政治內幕雜誌。夏潮論壇不是另一本供您消遣的雜誌。在每一期夏潮論壇上，您能讀到當代最值得您深思、反省，深深啟發着我們的思攷的文章。不論在思想、歷史、文化、文藝……的範圍內，夏潮論壇向您的思維挑戰，啟發您批判的視野。進步的黨外知識份子、青年和人民，讀進步的夏潮論壇。

夏潮論壇

地址：台北市安居街八巷六弄五號三樓
電話：(02)7084191
郵撥帳號：714363王永帳戶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
但請註明出處。

名譽發行人／楊達・黃順興

發行人／柯水源

社務顧問／李信志・何春木・吳陳惠珍・
洪壽美・高信雄・蔡伯堯・蘇惠珍

名譽社長／蘇逸凡

社長／王永

執行主編／梁春幼

編輯委員／本刊編委會

編輯組／黃怡〈社會〉李勁春〈勞工〉

・李天人〈生態〉楊秋生・王菲林

〈文芸〉尉哲明〈歷史與思潮〉

梁辰〈攝影〉陳秀賢・田華容〈採訪〉

編譯組／周偉康・莊捷芳

法律顧問／湯金全

發行所／台北市辛亥路一段87號4F

編輯部／台北市安居街8巷6弄5號3F

經理部／

電話／(02) 708-4191 (02) 7038504

郵撥帳號／714363王永帳戶

零售／每冊國內新台幣80元國外美金3.5元

長期訂戶／國內：全年12冊730元・半年40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40元

亞太地區美金35元

港澳地區美金32元

北美洲代表／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J. 07932

U.S.A.

北美業務部／Mr. Wan-Lai Chao

(1705) W. 49th St.

L.A. CA 90062 U.S.A.

台北總經銷：

百全書報社 電話：(02) 9245210

各地經銷處：

宏恩書報社 電話：(032) 280212

國華書報社 電話：(034) 559853

大華文化服務社 電話：(035) 228054

榮正書報社 電話：(038) 359352

芙華書局 電話：(037) 320810

台中書報社 電話：(042) 333363

嘉聯圖書社 電話：(052) 324581

永茂書報社 電話：(062) 234339

天和書報社 電話：(07) 3829975

環球書局 電話：(087) 323071

民生書局 電話：(039) 323765

國民書局 電話：(039) 543743

紐約書局 電話：(089) 322267

文強堂書報社 電話：(035) 239207

花蓮文具行 電話：(038) 322941

榮譽訂戶：

凡捐助5000元以上，

即為本刊榮譽訂戶，

並長期贈閱本刊。

海外訂戶請注意！

美金支票請開本刊英文全名

CHINA TIDE FORUM

或「夏潮論壇雜誌社」

歡送蘇慶黎赴美進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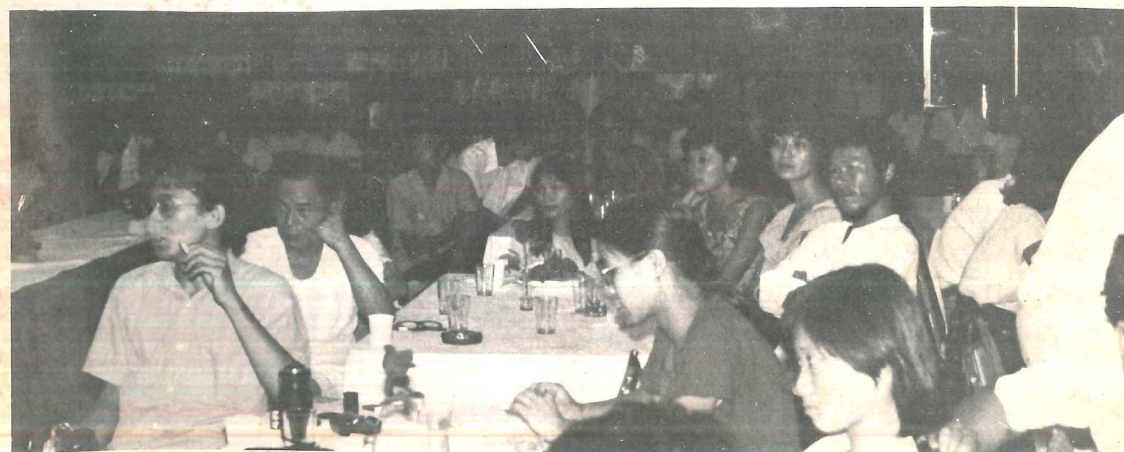
本刊前總編輯蘇慶黎小姐已於本月十七日搭機赴美繼續深造，此次赴美獲得紐約州立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此項獎學金是由以研究「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知名的賓漢頓研究中心提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鐘，「夏潮論壇」社特地假台大校友會館四樓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歡送惜別會，與會者有各黨外雜誌黨工，以及「夏潮」過去的諸多好友二百多人參加。

惜別會全場由王津平與陳秀賢二人以國、台語輪流主持，由楊祖珺、胡德夫負責演唱。會中還有多人致詞，包括胡秋原

、楊達、柏陽、陳映真、詩人高準、詹微、基隆市議員李信志等。立委江鴻堅、許榮淑也都到場向蘇慶黎致意。國中音樂老師陳揚山並作詩相唱與贈，會場氣氛十分生動活潑。蘇慶黎過去辦老夏潮的許多朋友，都到場一起合唱歡送他們口中的「蘇姐」。

蘇慶黎最後致答謝詞時，希望黨外能捐棄成見，攜手為台灣民主前途奮鬥，博得現場熱烈掌聲。未了，在全場大合唱李雙澤作曲的「美麗島」歌聲中，歡送會圓滿閉幕。



■版權頁■
■目錄■
■編輯室評論■
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工會，為保障工人的生命和權益而奮鬥
——從兩山礦難和美資華納利電子公司工人爭議說起

■卷首語■

■特別企劃■

黑靈魂的吶喊

——雙山礦災座談會

本刊 2

黯然心酸話礦災

土盛

12

台灣礦工問題面面觀

地藏

14

■現代史料■

吳國楨八十憶往

在這篇回憶裏，談到了宋子文、胡適等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堪稱珍貴史料。

江南 22

■人物對談■

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李哲夫與戴國輝對話錄

台灣的省籍問題有人把它無限擴大為民族問題，這篇對談以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戳穿假象，深刻地剖析了台灣結與美國結。

葉芸芸整理

28

■專論■

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方向

記與「台灣民主支援會」朋友們的談話

王曉波 40

■短評■

●美國即將放棄台灣？

田斯文

●「炎黃子孫」靠哪邊站

洲子洋

●反共與法西斯

華仁

●團結！為保衛生活環境而戰

林毅

●礦工屍骨寒 朱門尚有酒肉臭

王繼德

52 51 50 48 46

■工人廣場■

孫中山先生反對國民黨的勞基法

本刊編輯部 54

勞動基準法座談會

本刊編輯部 65

我們是「人」，不是「東西」！

美國跨國公司把台灣勞工當商品拍賣，勞工齊起痛斥跨國公司及漢奸買辦。

汪立峽 56

●李哲夫、戴國輝談台灣的省籍問題



●吳國楨八十憶往



●黑靈魂的吶喊——雙山礦災座談會



●吳國楨
八十憶往

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李哲夫與戴國輝對話錄

台灣的省籍問題有人把它無限擴大為民族問題，這篇對談以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戳穿假象，深刻地剖析了台灣結與美國結。

葉芸芸整理

28

■專論

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方向

記與「台灣民主支援會」朋友們的談話

王曉波 40

■短評

●美國即將放棄台灣？

●「炎黃子孫」靠哪邊站

●反共與法西斯

●團結！為保衛生活環境而戰

●礦工屍骨寒 朱門尚有酒肉臭

田斯文 46
洲子洋 48
華仁 50
林毅 51
王繼德 52

■工人廣場

孫中山先生反對國民黨的勞基法

本刊編輯部 54

勞動基準法座談會

本刊編輯部 65

我們是「人」，不是「東西」！

美國跨國公司把台灣勞工當商品拍賣，勞工齊起痛斥跨國公司及漢奸買辦。

汪立峽 56

勞資爭議何時了？

張望 58

■大眾辭典

跨國公司

本刊資料室 76

■海外傳真

膨風的革命家

張金策批判許信良

許信良在美國誇夸而談台灣社會正處於「革命的前夜」，高喊「革命萬歲」。當過宜蘭礁溪鄉鄉長、「台灣政論」副總編輯的張金策頗不以為然，諷刺他是「膨風的革命家」。本文揭露了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根本弱點。

張乃信 78

■讀者迴響

✓為陽光小集「自行解散」來函說明
閉戶關窗，何來陽光

向陽 91

■黃順興專欄

台灣語言問題之我見

江明遠 93

■名著選讀

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中）

許南村 96
周偉康 合譯

松永正義著

■電影文化

大革命的前夜

李健文 102

■社會運動

台灣社會問題與社會運動（下）

江海晏 106

●李哲夫、戴國輝談台灣的省籍問題



●膨風的革命家——許信良



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工會，為保障工人的生命和權益而奮鬥

——從兩山礦難和美資華納利電子公司工人爭議說起

六月和七月兩個月間，台灣驚傳了兩次空前的礦難事件，近兩百名煤礦勞動工人死於非命，深深地震動了台灣人民的心靈。悲傷、驚駭、疑惑甚至忿怒之情緒，充滿着關心生活的人民的胸臆。人們問：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讓近兩百個生命活活在地底兩千公尺之下窒息、燒烤而死，為什麼沒有任何人要對這悲慘的災禍負責任。

我們在報紙上，在電視上，看到那些黨政首長打着不着邊際的官腔，沒有看見過他們一丁點切膚、哀痛的表情，沒有聽他們說過一句真正從一顆哀傷自責的心腑發出來的話語；沒有聽他們表白過為不會盡到保護人民之責而自咎的話，更沒有聽他們說過半句斬釘截鐵的改革補救的計劃。

我們也沒看見、聽見兩礦的主人說過、表示過半點內疚，願意為在災變中死亡的工人和他們身後的遺族，毀產賠償，並為了這悲慘的變禍在道德上表示自咎和負責的話。

我們也沒有、或者很少聽見社會上的團體和意見領袖為此表示震怒、要求嚴重關心死難工人的遺族，要求政府當局和煤礦資本家嚴厲負起一切政治和道德責任的話。黨外議員不會為無告的煤礦工人和他們的遺族發表過嚴正的抗議聲明，不會像選舉的時候那樣熱心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為保障遺族權益，為追訴造成死難工人之責任，為了只有黨外才能真心申張的社會正義而堅決地工作。對於這悲慘的礦難，大部分黨外雜誌照例只是罵一罵國民黨，卻不曾深入揭發台灣長年來政權與資本勾結下賤踏、剝削工人的結構。

台灣的工人階級，在過去三十年間，為台灣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用他們的勞力和血汗為台灣的社會發展做了最大的貢獻，並且用他們的血乳培養了整個台灣工商業資產階級。但是，六百多萬台灣的勞動者，收入最低，工資永遠只能溫飽，却不能共同享有台灣社會的福祉：集體談判、為自己的權益自由組織，分享文化、知識的利益。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一本書、一本雜誌，是為工人寫、為工人辦的。沒有一個真正屬於工人而有力量量的團體，為工人職業的穩定、合理的工時與工資，工作的安全與健康發言、力爭。老實說，即使是黨外公職人員，也只在選舉的時候，口頭上說些爭取工人權益的話，選過了，就忘得一乾二淨。這次勞基法在立法院中的爭議，黨外議員充分暴露了它的中產階級性格，對爭取工人階級的權益，表現出再也無從掩飾的冷淡。台灣的工人階級，已經完全全被台灣中產階級社會——包括國民黨和黨外議員——拋棄了！

受到當前台灣社會所遺棄的台灣工人，在工會的名存實亡，工會和黨資本的勾結，工會的羸弱無力，以及台灣中產階級對工人權益的忽視和藐視，台灣的知識界、文化界一般地對工人無知、忽視和漠不關心的情況下，只有在渙散、個別的情況下，在個別的廠中，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起而為自己合法利益與資方爭議。最近美資華納利電子公司的勞資爭議，就是無數實例中的一個典型。

原台灣飛歌（Philco Taiwan）電子公司改名為華納利電子公司（Atari）經營，（飛歌頻頻更改名稱和管理層，據說是為了充份利用外資設廠五年內免稅的優

惠，故而頻頻重新營業）突然於七月初宣佈再度更換經營人，即日停工盤點移交。華納利企圖整廠連工人一併移交新的經營者，規避資遣費用，對今後工人的出處，避不負責交代，引起工人的不安。據華納利工人領袖指出，該廠三年來工資一直未曾調整（而該廠工資為目前台灣電子業界中最低者，伙食、交通折現後工人工資為每月七千三百三十四元）雖經產業工會極力爭取，亦不見改善。目前該廠宣稱「更換經營人」，拒絕資遣工人，擬將連廠帶勞動者一併移交新的經營者，對工人今後工作保障、薪給、福利概無承諾，對於工人要求與原資方協商，置之不理。工人因此強烈要求原公司停業後應依法資遣全體員工，然後工人再與新資方共商雙方僱傭契約。

華納利工人在產業工會領導下，和資方力爭之際，華納利的華人管理者不但不為自己的工人同胞撐腰，却成為外國資本壓迫台灣工人的幫凶。工人領袖在一份公開聲明中這樣指責：「工會決定拿出魄力和公司爭取到底。不料却被所謂的『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出賣，幫着公司威脅員工，利用高壓手段圖謀私利，欺壓善良勞工，部份不明大義幹部亦從中協同。嗚呼！自己的同胞被老外欺負（還）不夠，不要幫着老外來欺負自己可憐的同胞，良心何在？民族意識何在？……中國一直不能太平，原來漢奸走狗太多，其果有因，實在可悲」。工會並做這樣的呼籲：「一、工會爭取（議），要靠大家支持，不容少數破壞！二、這是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爭（的問題），與主管無關。何況主管已不可信任！三、抱定信心、堅持到底，全心全力支持工會，必然可以勝利！四、不能白白的、眼睜睜的任由外國老爺擺佈。大家要化語言為行動，化悲憤為力量，共同擁護工會堅持到底」。

從這一份文件中，我們生動地看到台灣工人階級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為自己的權益自發自動地起來勇敢抗爭的情形。法律不能幫助他們，國民黨不會伸出援手，大部份黨外對他們艱苦的奮鬥毫無體己切膚之情，更不用說拔刀相助了。台灣的「高級知識份子」、教授和學生，沒有人關心他們、支持他們。更可恥的是，在華納利工作的買辦知識份子管理階層，不但不幫忙，反而成為外國資本的警察偵探，破壞和威脅工人的正當要求。

在目前的台灣，知識界中不少人以民族意識、民族主義為「落伍」、為「偏狹」，和國際資本一道學舌，倡說國際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但華納利工人的眼睛比他們還要雪亮，腦筋比他們還要靈光，在切身的鬥爭中，正確地看到資本對勞動、帝國主義對民族主義的矛盾。

台灣工人階級應該起來為自己的團結權、組織權和爭議權奮鬥。捨此，已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三十年來，台灣工人隱忍相讓，到今天，別人施捨的勞基法，還要經過十年之杯葛，七折八扣。在這新的勞基法下，往後的勞資爭議還只是一個新的、複雜的開端。可是，代表台灣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既然終於把勞基法弄出來，工人就應該先堅持這勞基法，據以組成真正屬於自己的產業工會，堅持工會的獨立自主，堅持把工會中墮落的黨資代理人清除出去，堅強地團結在一起，堅定地、依法為自己的權益奮鬥到底！

又令人憤怒。在這次難得的吶喊裏，黑靈

與美國結，頗發人深省。

魂們揭露了官商勾結，盡情壓制礦工，罔顧人命的內幕。這些控訴是最真實也最可貴的材料，台灣勞工的苦境，在他們的控訴中，顯露無遺。「台灣礦工問題面面觀」的作者，在礦區中生長，對礦工生活瞭解

多，他的「八十憶往」透露了頗多鮮為人知的內情，為中國現代史留下寶貴的史料。刊出時，因言論尺度所限，做了必要的刪節，饒是如此，依然精彩可讀。

深刻，他論述了礦工的工作環境、待遇、生活方式、政治態度，透過他樸拙的文字

曾經在台灣風光一時的許信良，流落美國，日暮途窮，只好靠吹牛皮、發狂論

論壇

卷首語

■大眾辭典■

■海外傳真■

膨風的革命家

——張金策批判許信良

許信良在美國誇夸而談台灣社會正處於「革命的前夜」高喊「革命萬歲」。當過宜蘭礁溪鄉鄉長、「台灣政論」副總編輯的張金策頗不以爲然，諷刺他是「膨風的革命家」。本文揭露了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根本弱點。

張乃信 78

■讀者迴響■

爲陽光小集「自行解散」來函說明
閉戶關窗，何來陽光

向陽 江明遠 9190

■黃順興專欄■

黃順興 93

■名著選讀■

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中)

松永正義著 許南村 周偉康 合譯 96

■電影文化■

大革命的前夜

李健文 102

■社會運動■

江海晏 106

又令人憤怒。在這次難得的吶喊裏，黑靈魂們揭露了官商勾結，盡情壓制礦工，罔顧人命的內幕。這些控訴是最真實也最可貴的材料，台灣勞工的苦境，在他們的控訴中，顯露無遺。「台灣礦工問題面面觀」的作者，在礦區中生長，對礦工生活瞭解深刻，他論述了礦工的工作環境、待遇、生活方式、政治態度，透過他樸拙的文字，可以深刻地了解台灣的礦工問題。

草擬了二十幾年，歷經波折的「勞動基準法」終於在立法院審議通過，由總統明令頒佈，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很遺憾，在資方強大的壓力下，經七折八扣，面目全非，嚴重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爲了探討「勞動基準法」在社會發展上的意義及它在審議過程所呈現的各種問題，本刊舉辦座談，邀請三位社會學家一起討論，很談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台灣的省籍問題長年來都是台灣社會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有人甚至把省籍問題無限擴大爲民族問題。美國天主教大學社會系教授李哲夫和日本立教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國輝，用歷史與社會學的方法，剖析台灣三十多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深刻地剖析了台灣結

與美國結，頗發人深省。吳國楨歷任國民黨要職，所知秘辛甚多，他的「八十憶往」透露了頗多鮮爲人知的內情，爲中國現代史留下寶貴的史料。刊出時，因言論尺度所限，做了必要的刪節，饒是如此，依然精彩可讀。曾經在台灣風光一時的許信良，流落美國，日暮途窮，只好靠吹牛皮、發狂論撐門面，張金策看不過去，諷刺他是「膨風的革命家」。張乃信之文揭露了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根本弱點。

「統」、「獨」問題是關心國事的海外知識份子經常討論、爭辯的論題。王曉波指出「中國統一的要求不僅是國共二黨的主張，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自歷史的、文化的情感和現實的要求。」頗值海內外知識份子參考。

本期的大眾辭典介紹二十世紀怪物「跨國公司」。爲什麼跨國公司又稱「看不見的帝國」，本期的大眾辭典給了讀者一個扼要的解答。南方朔的「台灣中產階級的昨日、今日、明日」，續稿未到。「阿義的礦工歲月」因本期以兩山礦災爲特別企劃，下期再續。

夏潮論壇

卷首語

六月二十日的海山礦災造成七十四人罹難。就在社會各界記憶猶新，官方整頓煤業之聲，言猶在耳之際，七月十日又發生更爲悲慘的煤山礦災，死亡人數高達一百零三人，爲三十多年來最爲慘重者。爲此我們特別舉辦座談會，邀請海山煤礦的罹難家屬代表及數位採煤多年的老礦工，請他們指出台灣礦業的癥結。與會的礦工朋友很感慨地說：「以前都沒人理會我們，今天用一百七十多條的生命才換來讓我們在這裏吐露心聲的機會。」聽來沉痛而

●膨風的革命家——許信良



本刊資料室 76

黑靈魂的吶喊



本刊編輯部

雙山礦災座談會

時間：七月十九日晚上七點
地點：基隆市六合茶藝館

「雙山」礦災座談會

出席：

柯水源（本刊發行人）

張曉春（台大社會系教授）

陳樹枝（前省總工會總幹事）

陳秀賢（本刊採訪編輯、座談會主持人）

柯：感謝各位勞動界的兄弟來參加這次為「雙山」礦災而舉行的座談會，今天在座的還有學者、專家，這樣我們把實際和理論結合，對大家或許會有所幫助。

陳：各位在煤礦業裡出生入死的勞動前輩，在各位辛苦地工作一天後，邀請各位來出席今天的座談，主要是希望各位能對今後煤業的政策以及礦坑安全提出寶貴的意見和檢討。今天，我們首先要對一百七十多位死難的兄弟同胞致上十二萬分的哀悼之意。在座有許多罹難家屬，希望能夠聽到你們辛酸的心聲；記得在煤山災變時，我們在現場守了兩夜兩日，有一位入坑營救同伴的礦工會搖頭嘆息地說：「獲救的是他們的命，會死

的是天註定」，令人十分心痛的一句話，其實，這兩次的災難完全是人為的，完全是礦主未能將投資置於完善的保安設備而導致過失的不幸，我們想出一套方法防止這樣的慘劇再發生。現在請各位表示自己的意見。

安全訓練都在喝酒 打發時間

礦工甲：我看目前礦坑的工作條件是處處危險，可是又處處可防，舉如落磐、瓦斯爆炸、機電事件等，像煤塵過量的預防，這可以噴撒石灰粉來降低空中煤塵含量。以前在大礦時，這項工作有專人固定在做，但是像我現在工作的小礦，

根本只有等待保安中心人員要檢查時，才馬虎應付了事。

礦工乙：我是在煤山工作的，但因為朋友在木南煤礦工作，有時也叫我去一起工作，所以我是兩地跑，災變發生時，我恰好不在煤山。其中煤山工資較高，每天約九百元，而木南僅有七百五十元。

陳：多謝兩位意見，我希望今天在座海山的朋友談談這次災變，尤其海山一向是台灣的「樣板煤礦」，為何這次却發生慘劇，請大家談談。

礦工丙：我在海山工作十年的經驗，發現每回的安全訓練，根本就不徹底。都是在喝酒、打發時間。他們說「安全就是責任」，可是根本每回安全檢查都不認

壓縮機是應該置於坑內或坑外？因為我發現有的礦坑置於坑內，有的置於外面，並不一致。

礦工丙：應該要置於外面，如按規定做，煤山災變可以不發生。礦主為了減少鉛管和機動馬力的需要，減低成本，所以把它放在裏面，才導致這次災變。而且煤山以二班制工作，Compressor 因為廿四小時運轉，溫度必然很高。

記者：兩山災變中，我發現一個相似點：搶救時間都延誤，分別延誤三個鐘頭和一個多小時，尤其是煤山災變，時間的延誤造成人員傷亡，損失很大。如果能及時搶救，或許生還的人可以更多，請大家考慮考慮這個問題。

礦工丁：這最主要是保安人員本身的訓練不夠。

記者：目前在法令上對於礦工保安訓練有何規定？

張：在勞工安全衛生法中有規定礦主在一定時間內，必須給予工人安全上的訓練，我不知礦主是否依法行事？

礦工丁：有時我們學習人工呼吸法，以及學習在災變時，應該如何逃避的方法。柯：但是我認為你們應該學習的是，如何使用保安器材才對，而不是這些。

●座談會現場。



真。像海山的爆炸，他們認為是台車脫落撞及機電開關，可是按規定，開關應該要安置在地下，挖個洞安裝起來才對，如果按規定做，不應該發生這次爆炸事件。我真真覺得這兩次事件的發生，

完完全全是礦場保安檢查的不徹底、敷衍，礦主是應該負起全面的刑責。

柯：我有一個問題請教，這次煤山災變發生是因為空氣壓縮機（air - Compressor）起火引起的，按規定，到底

失靈無用的自救器

陳：按規定，在工作中應設有安全人員數名，但是這兩次災變似乎沒有發現他們的作用，這是為什麼？

礦工甲：據我了解，雙山災變時，安全人員在坑外，根本未能及時入坑營救。至於所謂安全設備，例如瓦斯自救器，這東西只能有三年使用的期限，可是，礦務局現存的自救器都是民國四、五十年時代購入的，早已失靈，根本沒有人會去使用。會死亡都因此引起的，更可惡的是，礦主要求我們工人出錢購買自救器，我們三餐都不繼了，那有錢拿出來購買這些應由礦主出資購買的器材。老板根本是瞞人耳目，說到保安器材，他們可以對人說我們都有按規定裝配，可是實際上全是那些買進十幾年沒換的失靈無用的自救器，誰也不願裝戴。

（一陣嘈雜，多位礦工紛紛訴說礦主如何做表面工作，忽視工人生命安全。）

陳：各位，我們再重提剛才延誤的問題。

礦工丙：我當時在海山的二斜坑工作，而爆炸發生在三斜坑，當我們吃過飯後，聽到爆炸聲響，時間正是十二時五十分

，當時耳朵有震聲響；而公司却說報說爆炸發生在一時五十分，已經延誤一個鐘頭；然後再往礦務局報案，派技正來現場時，已是三點多了。公司方面說電纜燒壞了，無法營救，可是很多同伴和罹難的家屬，紛紛要求公司趕快營救。我的弟弟在這一次災變中也死了，我當時堅決要下坑去救人，當我下坑時，發現一些新的電纜就擺在一旁，沒有人使用，公司完全是消極的態度，擺給外人



●等待下坑的礦工——他們隨時會有去無回。

看而已，公司根本沒有救人的誠意。

礦工甲：沒有錯，都一樣，老板都是在擺「水」（好看）的，把一大堆器材擺給外人看，根本沒有使用，只是應付應付而已。

礦工丁：公司根本都在擺門面，都是在敷衍外面的檢查而已，根本沒有照顧我們大家生命的安全。

陳：根據官方資料每年礦工死亡人數約為七十餘人，可否請張教授對礦工安全問題提出看法？

張：我只是一個研究者，或許有些隔靴搔癢，不知道我的看法對不對，還需要向大家請教請教。根據內政部公布資料，民國五十九年至七十一年，礦工每年死亡人數七三、四人，可是像苗栗南嵌煤礦，每年多少都會死好幾人，都不是類似這種大型災變，可能根本沒有統計在內。據我研判，這兩次災變，都是人為因素，剛才聽幾位礦工朋友談話，更可證實這種看法。根據政府資料和法令，我發現完全是安全檢查草率了事和礦主的不守法，譬如壓縮機的裝置，應該置於坑外，可是卻非如此，可見檢查人員的不認真，壓縮機又不是一粒沙塵，肉眼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定是如各位所說

，他們喝了酒，吃飽了飯，就胡裏胡塗通過了事，如何能專心檢查？

安全檢查 事先通風報信

陳：張教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政府在七十一年時檢查全省一七六座礦，其中及格僅有廿四座，經過了十二次的檢查，還有一一五座不合格。根據我們勞工安全衛生法的規定：檢查不合格，屢勸不改，必須移送法辦，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礦主被移送法辦。據我所知，在外國，每個礦場有所謂「自動安全裝備」，萬一煤塵量過高礦溫過高，警鈴就會響。……

礦工甲：有啊，我們也有會響的，但只是在保安檢查時，才會響，保安檢查過後，警鈴就拆下來了，就不會響了。檢查時會「吼」，檢查完就不「吼」了。都是保安檢查前夕，才由工友臨時裝設的。政府的安全檢查都是事先通知，這是最大的失策，等於是通風報信，讓老板可以修門面，做表面功夫。

陳：這樣事情，你們反應過嗎？

礦工甲：向誰反應？你只要反應，明天你就回家吃自己的飯，公司就叫你不必上

工了。

（又是一陣嘈雜，大家爭相訴說礦主如何壓制工人言論，其中包括利用免除勞保資格的手段，壓迫工人服從。）

要一個不會吃錢的 安全檢查中心

礦工甲：我在二十年前，曾提出異議，隨後我被剝奪了勞保資格十年，礦主說我是壞人，不可投保。

陳：如何防止這種弊害，請大家提出意見。

礦工戊：最好礦務局的人來時，不要事先通知，否則……（被打斷）

礦工甲：沒效啦，礦務局的人也是可以塞紅包的，只有成立一個不會吃錢的安全檢查中心才有用。

（哈，哈……，一陣礦工無奈的笑聲）

陳：最近報章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一位有良心的安全檢查人員，欲把實際情形寫成報告，但還沒寫完，上面的命令已經下來，把他調走了。

陳：現在，由於這兩次大型災變，咱希望政府能夠拿出魄力和勇氣來面對現實。另外有一個問題，是當礦災發生後第二天，人的生死未定，就已有二十多家葬

儀社來搶生意，大家的看法怎麼樣？

礦工甲、乙：爲了賺錢，他們當然會這樣。

礦工甲：說實在的，我在災變前每期（半月）工作十三天，但是發生事故後，只工作七天，心裡實在很怕，爲什麼怕？因爲安全設備的不良實在讓我心寒。從五十九年起就規定壓縮機不可裝在坑內，但是到七十三年了，依舊裝置在坑內。

陳：在座的勞動朋友，看起來都有五、六十歲，我都可以叫你們「歐吉桑」，但是根據目前法令的規定，五十五歲就應該退休，爲何你們還在繼續在礦場工作，而罹難工人也有高達六十三歲的老人，這是為什麼？

礦工甲：這是生活問題，雖然我已五十六歲，但是子女都還很小，不能不去工作，而且年齡老大，轉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投訴無門任人欺壓

陳：我想請教這位在海山工作的朋友，你們兄弟兩人的工作應該足夠養活老父，爲什麼你父親高齡五十九還要入坑工作

？
礦工丙：我們是勞碌命，父親不願休息，多少賺一些，多少可補家用。

礦工乙：很多五十幾歲的礦工，看著自己身體還勉強過得去，就不想退休，總是希望多賺些錢，簡單一句話，就是爲了錢，爲了生活。

陳：現在你們工人的退休金都可以拿到吧



●孤兒寡婦

有賠償了。

柯：請問你們目前錢拿了沒有？

礦工丙：現在公司認爲如果我們同意一百萬，就可以在和解書上簽章，就可以拿錢，但是大家對這個數字都不滿意，所以一直沒有簽章。

礦方賠償金不合理

記者：現在各界捐款達七千多萬，這些錢現在由誰處理，你們有代表參與其事，還是任由政府處理，而你們無從插手？
家屬代表：我們目前有六位代表參加愛心基金的處理會議，大家希望能將這些錢用來彌補公司賠償金額的不足。

家屬代表二：我們第一次協調會議是在縣議會召開，由我們縣長主持，會中擬了一個草案，規定養老金、子女教育金以幼童養育費爲第一優先使用；愛心到海山的運動，將在七月三十一日結束，等錢收足後，再通知代表。但是家屬認爲代表人數太少了。其次，我要提出礦方賠償金額的不合理，這次事件純粹是安全設備不良所導致的。公司一再聲稱比照過去，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爲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水準根本就不能相比，那

？
礦工甲：根據政府的規定就拿不到。

陳：根據政府規定，應該可以拿到才對吧？

礦工甲：從現在到退休的時候，有三十萬可拿，那一點點錢，根本就無法應付目前生活需要。而且礦主威脅工人一年必須工作兩百八十天，才發給退休金啊。

張：礦主根本就沒按規定行事。根據「工人退休辦法」，規定雇主在工人退休時，要給予三十五基數的退休金，那與勞保是不一樣的。

礦工甲：我們每個工人說實在的，都是「盲牛兼啞巴」，怎麼說呢？因爲任何機關我們也不知如何投訴，又不會說國語，而且不識字，只能受礦主的作弄。

礦工乙：我是今天來這裡，才知道政府有規定勞保提高至一萬兩千多，以往我大概不知。

礦工甲：工會也沒有用啊，咱們有意見說出去，他們向上面反應，在中途就被捏掉了。而且，他們酒一喝下去，什麼都「天不知道」。

頭家是石頭咱們是鴨蛋

麼賠償又憑什麼聲稱比照過去？

陳：政府在煤山災變後，宣布至少賠償金額必須一百萬，這給礦主一個很好的藉口，只願提供一百萬的撫卹金，不願再提高。

張：剛才你們提及的和解書，我認爲是礦主在耍把戲，我初步估計，勞保每人可拿到五十萬六千五百元，因爲礦工的月薪爲一萬多，依到今年六月上的勞保投保金額來計算，投保最低額一萬一千七百元，四十五個月算來，就有以上數目。所以如果你們羅難家屬勞保方面沒有拿到這個數目，政府就該負責，因爲政府規定「保額不足，雇主必須補足。」我的計算海山必須補足八萬，而煤山必須補足二十二萬，因爲煤山最多保八千多元，最少六千多元，與一萬一千七百多元，其中相差必須補足至少二十多萬。其次，就「廠礦退休辦法」規定，退休可領三十五個基數退休金，這錢以每基數一萬多元算來，也有五六十萬，這兩筆金額合起來至少一百萬。這些便是補償費。

政府應該出面替受難者打官司

礦工甲：而且，老板給你三萬當退休金，你也沒他辦法，他說「否則你去告我啊！」，但是咱們都是「既盲又啞」，打官司又不會，所以有三萬，就認了。就好比石頭和鴨蛋，頭家是石頭，咱們是鴨蛋，鴨蛋永遠就沒辦法和石頭爭。

記者：請問海山受難家屬，目前你們的賠償金是如何發放？

礦工丙：撫卹方面，公司連勞保一齊算，共一百萬。其中省政府公布勞保四十五個月，大概四十五萬，那麼公司的賠償就只有五十多萬而已。我們羅難家屬們，生命是可貴的，誰願意喪失生命，憑什麼礦主只給五十餘萬，也不先聽聽家屬的心聲。

家屬代表：我認爲公司要負責任，至少應將金額提高，至少礦主應付一百萬的金額，但是礦主一再推拖，以各種藉口搪塞。

記者：我想請問，你父親在這次災變不幸罹難，你可曾領到公司發放的退休金？因爲如果你的父親沒有死在災變裡，可以繼續工作至退休，也可以領到三、四十萬的退休金，如今不幸罹難了，卻只有五十萬的撫卹費，那等於礦主根本沒

另外糾紛最多的是賠償費，因爲人的生命本身有很高價值的，妻女尤其視自己的丈夫更是無價的，所以妻女在精神上的損失以及罹難者生命的損失，都可以打官司要求賠償的，多少都可以再爭取到一些賠償。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隨便在和解書上簽章，以免損失權益。

例如以前政大學生在暑假打工時，不慎被機器割斷兩根手指，依勞保只能拿到三萬元，但是他打官司，要求精神和身體損失的賠償，結果拿到二十多萬。兩根手指就有二十多萬可拿，那麼一百七十多條生命更應該可以得到足夠的賠償，至少也可以拿到一條人命一百多萬元的賠償。所以你們有三筆錢可拿，一筆是勞保，一筆是補償金，另一筆是精神生命上損失的賠償費。

你們不必求取礦主的同情，一味地乞憐似地要求他們提高金額，你們在法律上、道義上百分之百可以站穩住腳，絕對可以跟他們談判。你們千萬不要隨便地蓋章，否則到時候，不知勞保局和礦主怎樣「搓圓湯」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只有一百萬可拿，白白損失應有權益。我前些日子在台灣時報寫了一篇文章，希望政府出面

爲這一百七十多位罹難礦工家屬打這場官司，以補家屬法律知識不足的遺憾。否則，像以前在台南一位養魚人，因爲工廠污水的污染，打官司打了兩年，官司未有結果，人就先死了。政府爲你們打官司，應該很快才對。

「愛心」不是用來 讓政府逃避責任的

陳：我們現在應該擁有的權益兩種，一是喪失工作權的補償，以及喪失生存的賠償才對。最近，又有人提出「國家賠償法」的想法，對於這次礦災，能進一步由國家賠償我們的損失。現在，有一位在「台灣勞工法律援助會」服務的唐先生，要爲我們這些打赤腳的勞動人出面，討回一些公道。另外一方面，我要說的是「愛心」是我們這個社會幫助我們這些窮人，不是拿來幫助政府逃避應負的責任。

唐：我要說明一點，是關於請求勞保差額以及賠償金額，法律上有有效期限是兩年，希望各位能夠注意期限。

陳：在這兩次災變的善後處理上，我們發現目前社會福利的缺失。「愛心」雖然可以表示社會的同情心，但是政府更應

該提出魄力，面對現實，關懷社會福利。我們每年被外國騙去那麼多錢都不在乎了，政府對我們勞工朋友的安全福利，實在不應該再吝嗇，應該要設法法律來保障。孫中山先生也說：「權利是爭出來的。」我們必須爭取我們的權利。

礦工丙：我們希望「愛心」必須合理解決，而不要引起任何糾紛磨擦。不要將愛心和賠償金混淆。



● 一羣沒有父親的孩子

我們以爲，這些錢應該完全歸我們保管使用。

陳：前些日子，先總統的蔣夫人也說過，她要讓罹難家屬子女免費到華興中、小學讀書，讓我們這些赤腳的作工人也能和那些有錢人子弟一齊讀書。非常感謝蔣夫人這個安排。據我所知，日前行政院長俞國華下令，說要用最優良的醫療，如果費用不足，要用愛心專款來撥發；還有賠償費用不足，也要用專款來補足。若是這樣，大家想想，那政府做了什麼？這是不合理的。因爲這筆款項，是社會幫助咱們受難家屬的。照理說，醫療方面，政府應該在勞保方面全力照顧我們，否則，就好像我們做工人「屁股打不痛」，白白被欺侮。勞保應該是要徹底醫治勞工的疾病和災難的救護，否則，照他們這種說法，要是沒有這項「專款」，我們的勞工朋友就要在一旁喘了，死也沒人知道。抱歉，我這樣說，實在是我對這兩次災變的善後處理在情緒上非常不滿。

「當場我們很多人都 都掉下淚來」

陳前總幹事：不過，在煤山災變後，我看

見報上刊登勞保局長的談話，表示勞保局要全額補助醫療。大概是政府方面協調不良，才會有兩種說法。

陳：我想請問家屬，可否說明在協調會中，政府方面如何幫助我們工人說話，而礦主又是怎麼說？

礦工丙：在協調會中，政府也沒有幫助我們甚麼。因爲礦主方面，有一位省議員李儒將在說話，縣政府的官員根本不敢說話，以免得罪他。只是找一些縣議員來發表談話，多是在勸我們要節哀之類的廢話。我們大家本來都知道要節哀，可是他們這樣沒誠意，更讓我們感到悲哀。甚至最後李儒將表示，最高賠償額六十萬，絕對不願再提高。這話讓我們很生氣。縣政府的官員也沒有表示什麼。最後縣政府有一個官員甚至怪罪我們家屬代表人多口雜，意見太多，才沒有辦法作個定論。在整個協調會中，我們罹難家屬完全站在不公平的一方。當場我們很多人都掉下淚來。

出賣「愛心」的協調會

陳：實在很糟糕，一個有「愛心」的社會捐款，在整個協調會中卻完全沒有絲毫

陳：愛心捐款對象是你們，主權應該是你們的，你們才有權決定使用方式。

礦工丙：我們也堅持使用的權利在我們自己，而不是像一些報紙所說：「我們山地人對一百萬就應該滿意了」，或是說「我們山地人沒有知識水準，不會使用」。我們山地人不是這樣，我們也可以買房子，做些有意義的事，紀念這些罹難的同胞族人；我們山地人是窮苦地生活，越是窮苦生活的人，越不會浪費錢。

「愛心」捐款應由 家屬保管使用

陳：我們知道，我們勞工朋友就是勞工朋友，不應該分山地人或平地人，山地人也是有人格和尊嚴才對，不應該像報紙那樣隨便批評人。請在場參加協調會議的代表，談談你們的意見。

家屬代表：協調時，政府方面對於「愛心」捐款的處理是希望由家屬領回50%的金額，其餘由政府設立基金保管，負責子女教育金，但是我們家屬認爲，萬一小孩子國中畢業後，不是讀書料子，那麼這些錢要如何處理，而且有些家屬並沒有子女，那又如何分配這些錢。所以

的愛心。只因爲礦主方面有省議員，所有的官員就像老鼠遇到貓，一句話也不敢說。所以，協調會到今天還沒有一個定論，完全因爲工人的地位不平等，沒人替咱們說話。只是他們在說，我們根本無法發言。所以我希望藉這次座談，可以表達我們的心聲，讓這個社會能夠了解我們的苦楚，讓這個社會發揚應有的正義，讓有愛心的社會了解最沒有愛心的協調會中的內幕。希望各位報章雜誌的同仁，用你們的文字，來叫醒社會的正義感，替我們工人出一口氣。現在我們請台灣省總工會的總幹事和張教授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收錢的時候才曉得 工會的存在

陳前總幹事：我首先感謝在座的張教授，他一直對咱們勞工朋友非常關心，用研究報告在學術界幫我們講話，尤其在我任總幹事期間，提供我非常多寶貴意見。剛才有些朋友私下跟我表示，「工會只有在收錢時，才會找勞工朋友」，我想在此說明工會的組織和功能。我不是本位主義者，我必須爲工會解釋一些看法上的不一致。

工會是咱們勞工朋友團結起來的團體，循團體交涉方法解決勞工問題，而勞工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核心，所以解決勞工問題也正是解決社會問題，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好處。雖然一直有很多人反映，認為廠礦工會根本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但是工會是分級的，若是產業工會沒有解決，可以反映至縣工會，或是全國性各行業總工會，甚至全國總工會；千萬不要因為一次反映沒有解決，便想法偏激。不論是政府也好，工會也好，國民黨也好，在野黨也好，我們黨內黨外對於勞工問題非常關心。千萬不要認為說也沒有用。

今天大家認為兩次災變都是人為因素，如果大家平時能反映，今天也不會有生命、金錢上損失。有一句話說「自動檢查」，意思就是說每個人能時常檢查自己和工廠的安全裝備，遇有問題即刻反應，以彌補「工礦檢查小組」人員不足。但是也不能全怪罪你們，因為照你們所說，反應太多會遭不利待遇。而且有些工會理監事也常常受到資方利用，升他做工頭，以至不能反應問題，所以大家都認為「說了也沒用」，但是這是一個人的問題，不是工會組織的問題，俗語說：「狗吠火車」吠久了，火車司機也會看看這隻狗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所以你們只要常常反應，久了礦主也會改變。例如在座的張教授，就一直在替我們反映意見，而工會也一樣在負起這個責任。

勞工有事應反映

行政院前孫院長說過「以廠為家，以廠為校」，就是要我們以工會為家為校，例如大家剛才說安全檢查小組人員只會喝酒，這類事情應該反映，工會才會知道。如果初級工會不能秉公辦理，可以向省級工會反映，尤其省工會理事長他本身便是廠礦檢查小組的委員，絕對可以為我們反映意見，甚至可以請全國總工會現任立法委員的理事長出面反映。

再則，像賠償問題，像張教授所說勞保差額的問題，這類問題都應該反映到工會，由工會出面，為我們向勞保局爭取。工會也可以請當地社會局為我們出面解決。我們應該遵循現有制度爭取我們的權利，例如張教授剛才所談到政大學生的賠償例子，便是由工會出面爭取的。我一直到最近，都有很多人來找我幫忙。很多在法院訴訟的例子，很多對方的律師都希望和解協調，都可以依循法律，來避免不必要

的爭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有事必反映，不要悶在心裡。也希望大家有事來找我幫忙。謝謝！

工會都是「他們的人」

礦工甲：今天聽到這位先生的解說，我才了解工會也是有效的。但是，譬如我們礦坑裡一些所謂的工會理事，很多都是頭家的「換帖」，表姐夫，或是其他有關係的人，找他們要求退休金提高，他們都是推說「不知道，自己找頭家去」，根本沒有幫我們說話。所以你們上級根本就不知道這一切。

（又是一陣嘈雜聲，大家紛紛控訴低層工會人員的昏庸和無能）

陳：法律可說是我們的眼睛，有了法律，我們就不再是盲牛。但是對於工會無能惡劣的幹部，照你們說，都是資方的朋友、親戚，「都是他們的人」。所以我們大家要一齊吠，拿筆的朋友也要一齊來吠，經過兩次災變，我們用一百七十多條人命和數不盡的血淚，才能換到今天在這個地方「吠」，以前一條一條生命被丟棄，我們都沒有聲音，也只有這次用一百多條的人命，我們才有機會可

以出來說話，我相信政府、社會大家都會聽到我們的心聲。我相信凡是關心勞工問題的朋友，都是愛國者；我希望我們政府，我們社會能夠提出辦法和勇氣，來解決勞工問題，而不要只是「騙團仔，打屁股」，似地敷衍。現在我們請張教授為咱們說幾句話，作為今天的結束語。

勞工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張：各位朋友，剛才我也說了不少，又有陳前總幹事也為咱們說明工會組織。當初我關心勞工問題，是因為我認為勞工問題不是一個勞工個別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問題。所以勞工朋友你們遇到問題，不是你們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體勞工的問題，更是整個國家、社會的問題。你的問題沒解決，你的朋友的問題也沒解決，整個社會、國家的問題也就沒解決，那麼國家不會強盛，社會不會進步繁榮，所以我說「關心勞工問題的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所以你一有問題，一定要想辦法反映表達，基層工會不行，找更高級的工會，這條路不通，改走別條路，工會是咱們的，

而不是「他們的」。否則找勞工立委出面也可以，如果他拒絕，可以當面罵他不愛國，因為勞工問題不解決，社會就不能發展。

所以國父就說「權利是爭出來的」。例如「勞工安全衛生法」有規定勞工必須接受安全訓練，但是你們大部份都沒有接受這種訓練，那你們就必須要求，否則一旦遇到危險，你們沒辦法應付來保護自己生命，往往就因此賠送生命。

所以很多問題，大家一起努力打拼，社會也一起來努力打拼，勞工減少損失，社會也就減少損失，那就自然會發展。各位的報告，和我四、五年前根據內政部的資料所做的研判得到一樣的結論，就是大部分的職業災害，不止煤礦業，都是由於資方罔顧法令，任意恣行而造成。

但是勞工朋友也應負起部分責任，因為你們不知道法令也罷，一旦知道却又不去督促資方遵守，結果受害的是你們。所以我希望以後我們大家共同負起廠礦的安全督促責任，避免職業傷害，要求雇主遵守法令，改善勞動條件以維護保障我們的生存權利。多謝！

礦工戊：有個問題請教，目前有一些工廠，可能是為了逃避年資退休金，每年替

勞工辦退休，連帶將勞保退除，硬迫工人停工一個月，然後又再找同一批工人工作，這要如何處理？

陳總幹事：同一工廠，年資必須承認。

礦工甲：但現在有的使用「包工」的方法，就是逃避年資的退休金，這又要如何處理？

陳總幹事：這牽涉到契約行為的問題，分為「不定期契約工」和「定期契約工」，前者不是屬於臨時工人，必須受年資限制。而後者則屬於臨時工、視工作期限而定，這種工人沒有遣散費可拿。

礦工甲：但是，往往我們都把私章交給礦主去統一支薪，也不知道他們蓋在那裡。

陳總幹事：根據規定，雇主是不可以集中接收勞工的私章，這是違法的行為。你們可以向工廠檢查會議反映。

陳：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在此一齊「吠」，我希望我們的心聲能藉著這次有意義的會議，能讓社會千萬萬關心勞工的愛國者也能共同努力打拼，為了社會的進步發展共同奮鬥。由於時間關係，今天的座談在此結束多謝各位，多謝！多謝！

（掌聲）

黯然心酸話礦災

士盛

六月二十日，由電視新聞看到海山煤礦災變報導，直覺反應是受困人員生機渺茫，因為該礦範圍廣大，坑內道路複雜混亂，很難尋找或處理出來一個「安全避毒區」，也因此，主管機關的搶救措施，大致來說還算得當，畢竟那種災變，任何人都束手無策的，僅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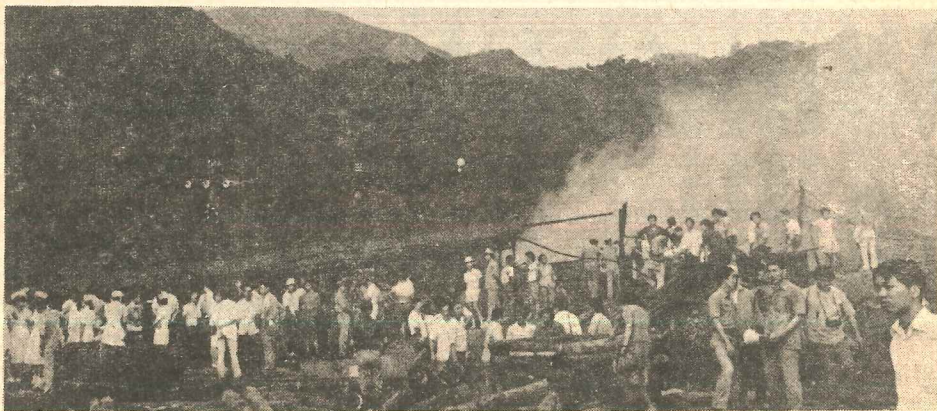
●要命的二十小時

七月十日，再度由電視新聞看到煤山礦災報導，並得知受困人員已清理出來一個「安全避難處」，無庸置疑，他們獲救的機率很高，因而感到欣慰，並祝福他們早點獲救，以免中毒太深。可是第二天閱讀早報之後，不禁罵出一句糟糕，怎麼回

事？十幾小時過去了，官方還找不出一個良好對策。怎麼回事？原來入坑搶救的人員沒有配備防毒器材。難道是煤山礦場太小，不如海山煤礦重要，以致窘態畢現嗎？稍後，廣播電台才緊急呼籲有「氧氣筒」的民衆踴躍提供。老天！晚了要命的二十小時。

為什麼會遲誤那樣久？搶救人員忙進忙出，到底有無實質效益？見到第二天的報紙一再歸咎礦方，諸如報案太慢、應變力差、搶救不力、設備不良、器材不足……，不錯，那些都是礦方的罪狀，然而那是災變發生後，兩小時以內的情況啊！當主管機關技術人員到達之時，要人才——有官方與各礦支援的熟練人員；講權力——有向各方要求支援人員、器材、設備、醫護……等權力，難道煤礦界一百多處礦場，湊不出搶救器材、設備與人員？難道整

●救難時間整整延誤了二十小時。



個台北地區找不到所需工具？看到此次的搶救措施，真叫人鼻酸，主管機關是該痛切檢討了。老天！要命的二十小時。

●辭職的意義何在？

前期的雜誌，敝人曾談到煤礦大災變通常是「湊巧」發生的，乍看煤山礦災，似乎單純的僅有「壓縮機起火」這一點，可是細思之下，卻發現所謂「湊巧」的因素更多。其弊病約可看出下列幾點：「坑內違法設置壓縮機」、「壓縮機過於老舊、以及維護不當而起火燃燒」、「排氣坑道彎彎曲曲、設計不良」（註一）、「通風扇的馬力不夠、風量不足」、「電源供給問題」、「礦方應變能力太差」、「礦方缺搶救器材與指揮人才」、「官方支援的技術人員尋不出有效對策」、「必要的搶救器材支援太慢」、「受困人員聚集一處、沒有充分利用剩餘空氣」……從上述可以看出主管機關「事前監督不周」，事後救急無方。

災變第二天，礦務局長向省府請辭，以示擔當。辭職應該照准嗎？何必呢！他並不懂得煤礦實務啊！而且辭職之後，僅

是修身養性、等待復出，有些甚至連休息「這種避風頭的步驟」都免了，立刻另就新職，那麼「辭職」的意義在那裡呢？

倒是礦務局的「技術保安組」面對這兩次災變，還能平心靜氣、無事人一般的吃飯領薪水嗎？這些人愧也不愧？如果有擔當，全組人員應該受嚴厲懲戒。猶記得當年接受礦務局的安全訓練時，一位課長級「官員」一再吹噓——如何勇敢，如何適當的背著「羅列加」救命器，冒險衝入災變現場，不顧「瓦斯」、一氧化碳毒氣、濃煙、尚在燃燒的支柱、落磐、視線不良……等等危險與威脅，緊急搶救受困人員。如今，瞧著一具屍體運出坑外，心底不禁浮起老大一個問號？不知他的吹噓是爲了「建立自我形象」，還是爲了鼓勵礦工，使「原已存在的冒險犯難精神」更加強烈呢？如果是後者，他有沒想到——「不怕死，也是礦場肇災的主因之一呢！」老天！要命的二十小時。

●筆於七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註一：煤山煤礦的排氣坑道彎彎曲曲，以致搶救人員與器材不能由「排氣坑」送入災區，如果「排氣坑」是直線的斜坑，受困人員獲救機會將大爲增加。



問題面面觀

哀悼兩山災變中罹難的兄弟

地藏

作者生長在台灣的礦區，對礦工生活的各方面有極深刻的認識。本文是想瞭解台灣礦工問題的人，不可不讀的佳作。

台灣礦工問題



●礦工在賭博、抬槓（洪瑞麟）。

海山礦災剛發生不久，經濟部的官員即信誓旦旦地表示，將督導有關單位對礦場安全的法令和措施再加檢討，對小規模業者可能採取較嚴格要求，孰知言猶在耳，瑞芳九份山腰的煤山礦場又生劇變，死難人數高過海山礦災，多達一百零三人。

海山、煤山兩次的災變，社會大眾在國民黨有意的轉嫁下，象徵著我們這個社會溫馨的同情心，一時之間，愛心滿天飛，就連那些平日罔顧勞工權益的資本家、官僚，也捐出巨款表示自己「人飢己飢，

人溺己溺」的「菩薩」心腸，不知要讓多少人感激涕零。可是如果詳察一番，不難看出他們的心態，金融界、工商界等大資本家，他們的捐款一定要在鎂光燈的照耀下，配合著自己和黨工官僚偽善的笑容，見諸報章，接受文人、記者的吹捧，在他們的嘴臉裡，我們根本找不到一絲哀痛之情，有的只是那不絕盈耳的歌功頌德。這種官商聯合表演的政治秀，真令人作嘔！

●地溫高達四十度 死亡率世界第一

目前台灣的採礦工人約有兩萬五千多人，其中年輕力壯的礦工，越來越少，多半為四十至六十歲之間的中、老年人，甚至也有高出六十歲這個上限年齡的老礦工；這對原本地理環境惡劣，先天不足的台灣煤礦業而言，更是佈上了一片愁雲。礦工的年事已高，又在深入海平面兩千多公尺，地溫高達四十度的危險環境下工作，實在可以用奔車朽索來形容，其危險性不在話下。更由於目前惡劣的保安系統加上開採集約化的關係，往往難逃賠命斷腿的厄運，台灣礦工死亡率佔世界第一。據統計，台灣地區煤礦場最近二十年（至六

十八年止）來總計發生災害一、七五〇件死亡二、三三八名，其中發生在坑內的佔九六·三%（一、六八九件）死亡佔九七·二%（二、二六二名），依照這個統計，每年有將近一二〇名礦工慘死坑底；其中尤以民國五十三年罹難人數高達一八九名為最。如果一個工人工作三十五年（二十歲至五十五歲），能夠安然全身而退，那真要感激祖宗積德和保佑了。

根據六十八年所做關於台灣勞工年齡的分配統計中顯示，四十至六十歲的礦工佔全部礦工的六八·三%，這比同時間的製造業（一六·三二%）、水電煤氣業（三八·九%），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三七·八三%）要高出許多。更由於近年來生產型態和勞力結構的改變，工人可以驅使機械、增多工作量且多領薪資，所以年輕的技工多不願從事掘炭的工作，因此這種比例上的差距，更形嚴重。這顯示了今天台灣煤礦業的老化以及夕陽景景的淒涼。

●台灣煤礦的經濟 可採量僅五千萬公噸

台灣煤礦業依照礦務局七十年統計

，各煤田的儲量，尚有二億六千多萬公噸。不過，若從實際地質和採礦條件來看，學者專家表示這份報告「過份樂觀」。台大地理系教授王源先生指出：「統計中的汐止煤田可採量為八、二〇四萬公噸，為各煤田之冠，但實際上，開採此一煤田的煤礦公司，其產出收入，尚不敷生產成本。且該處煤田必在離地面六百公尺以下的深度開發，地溫已達不可忍耐的程度，因而大部份區域業已廢坑」。因此「凡離地表八百公尺以上之深部煤，不應算入可採煤量」。所以王先生估計「全省的經濟可採量應在五千萬公噸左右，如依當前的產量每年二百五十萬公噸計算，亦祇能開採二十年而已。」由以上的證詞來看，礦務局所估計的可採煤量顯然過於誇大，與專家的估計竟相差兩億一千萬公噸。礦務局在計算煤存量時，只以「經濟開發」為著眼點，完全沒有考驗礦工工作的環境險惡等條件。說穿了就是和資本家「賺錢第一」的原則相互呼應，用這虛誇的數據，作為支持礦主繼續開採煤量的說詞，為資方牟利。可是，有誰能了解，就在這些數字背後，隱藏了多少礦工的辛酸血淚！四年前的永安煤礦災變，不就正是由於深度開採而釀成海水滲入成災的巨禍，礦工的生

命就這樣白白被犧牲了。

煤礦業在民國五〇年代曾經風光一時，當時開創了台灣煤業史上連續五年年產五百萬噸的巔峯記錄；可是好景不常，由於國際廉價石油擴張，石油化工取代了以往煤料原始動力型態的工業，煤業因之一落千丈，淪為夕陽工業，幾無遠景可言。後來雖在六〇年代初期因能源危機，以及伊朗革命，使煤炭地位一度恢復，但因原氣斷喪過深，好景僅是曇花一現，始終不能再創新績，目前僅能勉力維持每年二五〇萬噸的生產量而已。同時，工人的工資也呈現不穩定的跌落，目前工人的日薪約為六百到八百元，但是礦主經常藉著煤業不景氣為藉口恣意要求工人共體時艱，降低薪資，而一旦產業稍稍起色，却又以物價高昂為由，不肯隨著景氣的復甦提高待遇。由此可知礦主永遠是「只賺不賠」，將工資列入生產成本中計算，斤斤計較，不惜犧牲工人生計，多取利潤，尤其那些與黨政掛鉤的礦主（海山即為一例），更是十足表現如是心態。

●死亡的陰影常據心頭

錢，為自己子女儲備教育基金，並且諄諄告誡子女必須往外地發展，或求學或就業，不許重蹈自己的覆轍，一切一切都只為了補救萬一自己身亡，子女便會無依無靠的心理危機。日積月累，他們多能在鄰近市鎮甚至大都市的衛星城市裡，購置一小幢公寓，讓自己子女能更方便地就業讀書。至於另一種樂天縱慾的村人，幾乎全都是那些勞動力旺盛，工作最艱辛的採礦工人，尤其三、四十歲的壯年人。他們缺乏適當的休閒活動來調適身心，再加上死亡的陰影始終佔據心頭，往往只有藉著酒精和牌局來麻醉自己；也讓自己更有每天面臨死亡挑戰的勇氣和機動。這種類型的礦工，對於兩性關係並不十分看重，不時有外遇的傳聞，這大概也與「及時行樂」的心理有關。

●礦區選舉 公開亮票

礦村的居民在政治事務上是屬於保守的性格，主要是由於對政治事務的無力感繼而冷漠，以致不聞不問，這種情形尤其在偏遠的山區中特別明顯。從投票行為可以看出，只要礦主屬意那位候選人，工人幾無選擇地順從或屈服在礦主的命令下，

礦工的工資是論件計酬，普通每日工作六至八小時。但由於礦坑工作危險性高，勞動量大且地溫高，特別耗損體力，再加上礦工年齡的老大，因此，礦工每月工作日數約為二十天，但不得有連續三天不上工的記錄，否則一律開除。根據目前礦場法的規定，雇主於礦工作六天後，應該給予休假一天，不得強迫工人上工；但是在北部的某些礦場在星期例假日仍舊有不少礦工入坑工作，雖然礦主給付工資，但顯然已違反禁令了。

礦村的凋弊，導致人口嚴重的外流，這是目前台灣一般礦區普遍的現象，往往每戶人家就剩下一些年近古稀的老礦工和自己的妻子，兒女則紛紛到外地求學，就業謀生。

由於礦村地處偏僻，甚少康樂設施，村民閒暇時的逍遙不得已只有淪為聚賭酣醉等刺激性高的玩樂，這也正是礦工對於自己生命缺乏安全感的宿命觀的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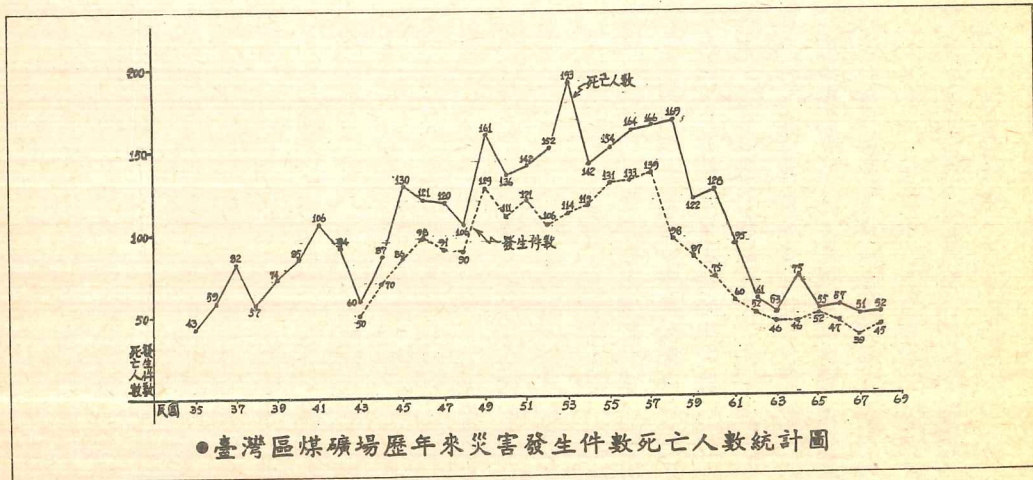
由於朝不保夕的心理，構成了礦村中「勤儉拘謹」與「樂天縱慾」兩種截然不同的強烈對比。其中勤儉而拘謹的多半是那些白領勞工，文書性職員以及少數的挖掘工人，他們刻苦地儲蓄每一分掙來的金

甚至有些礦區投票所是公開亮票（否則，工人將遭不利待遇），黨部的勢力配合著資本家的脅迫手段，礦村的高投票率（佔應投票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但確實前往投票人大約僅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中相差百分之四十的票數，其來源路人皆知）和票源的純度都比眷村的鐵票更令黨工滿意。不過，近年來這種情形開始有些改變，尤其是民主運動鏗而不捨地進行以及大眾資訊消息大量流通，礦村勢必逐步的開放。在隱性的影響上，可以看出工人已經慢慢學會採取「拒絕上工」（談不上有組織的罷工），來要求加薪；再加上都市生活勢力的逐漸入侵，村民勢將同時扮演政治中自由的選民以及礦場中受制的工人的雙重角色，使得工人逐漸珍惜自己權益，甚至有些瑞芳地區的礦工，在選舉期間專程趕往基隆等地聽取政見，為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助陣。雖然往後礦區地方自治事業還有漫長的路途要走，但是至少工人已逐漸自覺自身的權利，而不再只是任宰任割無助的一群。

●去勢的工會 甘為資方馬前卒

檢討礦村的自治與產業的民主，不可不提的是代表工人與資方（台灣區礦業同業公會）簽訂團體協約的「台灣省礦業產業公會聯合會」，其中規定成員為所有從事礦業生產事務的人員，包括採炭工、運輸工人以及管理人員等等。但是，真正掌理會務的幹事們，却多來自與資方接近的職員，而非從事勞動的工人。他們行事無自主能力，唯礦主之言是聽，為了自己的升遷以及任職長短全繫於資方的好惡，不惜婢顏奴膝，使出渾身解數討好長官，根本無力為勞動工人仗義執言。同時黨部的操縱與攪和，也使得聯合會徒具形式，只成為產業公會不折不扣的玩偶，猶如一隻關過的公雞，徒具其貌，却叫也叫不響。他們為資方效力，做馬前卒，永遠不餘遺力。例如在三年前的福田煤礦災變發生後，就是由他們出面幫資方斡旋，殺低賠償金額，「大功」誠不可沒！

資本家恣意剝削、罔顧工人福利，如果政府官員能夠善加督導，那麼今天礦災的發生也不至於如許頻繁，善後處理也不會如此不公。試想一條人命一百一十五萬已經被歌頌成「從優撫恤」，那麼這個社會已殘酷到什麼樣的境地了呢？更何況這一百多萬金額裡面有部份是礦工自身勞保



●臺灣區煤礦場歷年來災害發生件數死亡人數統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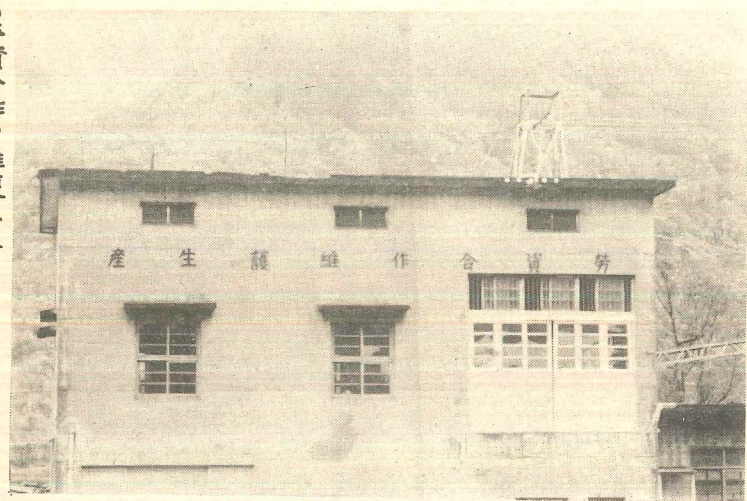
應得的錢，是他們在世時所流的血汗凝聚而成的，絕不是那些官商的德政美意。

●礦主是劊子手失職的官員是幫兇

更要注意的，是今天任何事變的撫恤金額，在我們這個社會，這個體制裡，已不是決定於受難人的損失或受難人的家境清寒，而僅僅是取決於每一次災變的新聞被炒熱的程度。如果今天礦災罹難的人數是一個、兩個或則只是十來個人，那麼牟利日亟，與民爭利的「官商結合體」絕對不會大費周章。「依照慣例」，四、五十萬解決一條人命已經是資方最高的忍耐極限，例如福田煤礦災變的賠償金額以及偶聞的小事故的善後處理，便是例證。政府之所以願意花大量金額來「撫卹下民」，絕對不是恩惠，那只是國民黨政府應該負擔的「遮羞費」罷了！我們必須揭穿「從優撫恤」的謊言，向官僚和資本家討回公道。

如果說礦主是災變的劊子手，那麼官僚便是不折不扣的幫兇。當我們翻看五花八門有關礦場安全的規則時，人們很容易誤做一個推論——礦務工作必然紮實。可

是，仔細深究，仍然可以發現一些端倪，窺見今天台灣礦業發展血淋淋的一面。因為我們礦場的法規是那樣地偏袒資方，而勞工生命安全的保障，只不過是達成前述目的的手段之一，也就是將礦工生命權利入生產成本來計算，一旦資本家發現購置



●勞資合作？維護生產？

保安設備金額比賠償工人生命、身軀的受害要來得耗損資本，資方會毫不猶豫地犧牲工人，以求獲得最大報酬。在他們的價值中，「資本」的地位要高於「勞力」，「物」的地位要高於「人」。例如民國五十六年經濟部第四次公布施行之「礦業登記規則」中，對於礦權的所屬以及登記所需規費等問題明白地記載，可是對於礦產登記時，是否需要任何保安方面的證明文件卻沒有一字提及；彷彿是說，只要有錢，萬事沒問題，在在顯示以經濟利益為第一優先考慮。又如「煤業合理化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該基金乃由於煤業經營困難，政府接受礦業鉅子顏氏、李氏家族要求，決定由工業燃料天然氣每立方公尺附加一角，以四年為期，自六十二年征收，合計征收一億二千萬），在第五條基金用途的規定中，只有第一款是攸關勞工生存的，該款指出「推行煤業合理化計畫有關改善坑道設備之資金融通或其貸款利息之補助」，其餘皆是用於「開採之研究試驗所需機械設備之購置與研究」或是「提高生產效率經基金會核准之各項補助」等等，把提高生產列於第一順位考慮的心態，可見一斑。

六十三年頒佈的勞工安全衛生法，在

第十二條規定「事業單位平時僱用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勞工安全衛生組織；僱用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應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自動檢查」，第十九條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等等，洋洋灑灑，共列三十四條法令規定，可是實際上形同具文。

●安全檢查單位「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其實法規訂得再嚴格，若遇上執行不力的官員，則災難浩劫的來臨，就很難說是偶然的了。尤其是基層保安中心或礦務局的督察，和資方礦主已經緊密地「永遠站在一起」，三天一小酌，五天一大宴，遇有上級單位的抽查，甚至還通風報信。這類官員最擅長「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作法。譬如最近全面停工的安全檢查，預計不少大礦的主人可以因而獲利不少，因為小礦一關閉，大礦必然會接收人力和裝備，並且可以分得輔導貸款補助，何樂不為？另一方面，在一般情況的檢查，如果礦場被發覺在保安設施不良，依照法規，最重也僅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鍰，這樣的罰則，如何能遏止礦主的利慾薰心、罔

顧人命？而官商結合，上下其手，又如何能讓我們溫馴的礦工不成為這不義制度下的祭品！

我們的礦工一直被壓榨得喘不過氣來，久久也不見他們採取任何具體的抗議行動。推究其原因，主要由於礦業工會聯合會多由白領勞工擢升後，主掌其事，澈澈底底便是資本家的附庸寄生，美其名為居中協調，實際上是為資方宣達政令，要求工人澈底「以場為家，以場為校」，卻從來不曾為工人爭取絲毫的利益，這個組織最大的功能是堵塞任何反對產業專權者的嘴巴，只要有人提及產業不民主，工會便以資方代言人身份，以自身為例，提出反駁。工會在這裡也被視為獨佔事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任何工人只要入坑工作，就自然無例外地被攬入工會名單，並規定由資方提供名單交由工會處理，如此一來，誰也逃不出控制，縱然自覺福利權益被剝削，也只有咬緊牙關，含淚認命。

●勞工無法申訴礦主違法情事

依照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勞工如發現工作場所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

衛生的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關申訴。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待遇。」可是實際上，工人只要對於現況一有異議（不論是保安設施或是工資待遇），都會遭受極其不利的後果，甚至因而被扣上「破壞勞資關係」的大帽子，成為礦區內歧異份子，遭受調查。於是，當依循目前體制內的管道表達意見受阻時，憤怒的工人不免有反抗的舉動，例如北部某大礦在去年年底就發生了兩場人為的機房大火，驚動了礦主、主管機關和情治單位，但是始終未知肇因。由此可見，工人逐步地自覺到權利攸關的問題，而不再像以往儘是任宰任割的羔羊。

目前礦業保安政策的目標，是要「將災變的罹難人數降低到日本的標準」，也就是每年不超過五十人，可是單單一次海山的爆炸，就已炸掉礦務單位的痴人說夢。台灣現有一百二十四礦，但據六十八年時資料顯示，當時一六二礦中有一〇二礦產量僅佔全產量的一〇%，如今類似的小礦，更將因逐年的開採，益見其小，這些都將成為煤炭業的「不定時炸彈」，如不加以整飭，勢必會有數以千計的工人將葬身坑底。這類小礦由於財源短缺，投資必

然儘量用於與生產相關的機械上，而對於攸關人命的保安措施，充其量只是應應景而已，這可從台灣目前僅有三分之一礦場設有安全課可以得知。同時煤業合理化基金對於保安裝備補助極其有限，向國外採購分配各煤礦使用者計有自動瓦斯警報及斷電器八八台，防爆型馬達八九台、防爆

型風扇機四〇五台以及自救呼吸器四千九百個等等，其中自救呼吸器是規定在每名礦工入坑工作時必須由保安人員檢查的必備器材，可是台灣兩萬五千餘名的工人卻僅擁有五千具的呼吸器。由此可見保安器材的匱乏和短缺，勞工在這種環境下工作實在無異於賭命。

●展開工人自救運動

現時最重要的煤業行政，應該是革新人事，澈查煤源，淘汰劣礦的工作。其中人事的革新是首要之務。礦務局人事久未更動，暮氣沈沈，地方保安中心人員更是與當地的礦主深相結納，對於礦區裝備，多睜隻眼、閉隻眼。這一環如不整飭，無異是台灣煤業的毒瘤。其次，對於保安不良的劣礦一律封閉停工，對於良礦則給予鼓勵和補助，也是當今之務。

但是，如果這種由上而下的改革行動不能得到支持，那麼工人自救的運動就應該如火如茶地展開，由工人自身團結起來，對自己的生命、財產，負起神聖不容侵犯的保衛權！一項由工人自覺組成自願性團體——暫名為「自治會」（仿梁漱溟先



●礦工居住環境極為惡劣。

生鄉村建設辦法概要）應該成立，自治會擁有自身權力，可以行使拒絕合作等方法，迫使資方接受一個較合理的勞資契約。而且它可以選任有經驗的工人從事每日保安工作的巡查，對於任何不穩當的地方，隨時提出警告，張貼於坑口，以昭告警惕同伴。並且自治會有權對礦場的經營提出意見，並且可以鑑定自身礦場的優劣，而提交報告給主管礦務機關，由礦務局執行封閉或補助。因為工人對於礦坑的情況最清楚，既不可能隨意刁難礦主（否則，封閉礦場後，自己便需轉業或遷徙他處，都是麻煩困難事），也不會包庇礦主（因會危及自身生命），最適宜執行此鑑定工作。總言之，自治會必須擁有兩樣功能：一是耳目，二是喉舌。耳目專掌礦區保安制度的運作，並且配合生產，以收興利去弊之效。而喉舌專司與外界連絡之情事，並且可以提出控訴和呼籲，以達濟難防災之利。

●完整的礦工醫療 亟待建立

礦區醫療設備簡陋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只有某些大礦才有門診處，至於偏遠地區，則無處求醫，必須至外地求治。而

門診處的負責醫生，又多為考不取醫師執照的密醫，根本就應付嚴重的傷患，只能處理一些輕微的外傷和感冒。目前在基隆、瑞芳設有礦工醫院，算是對於傷患有了進一步的照顧，不過，由於礦工長期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尤其煤塵侵襲呼吸

系統，常形成呼吸道的疾病，通常這類型的疾病必須建立完整的「家族病系」，才能有效控制、治療。而且礦工每年也都應該有一次至數次的身體檢查，以收早發現早治療之效。可是，這些凡屬礦工醫院都應該有的功能至今仍未具備。

●低薪工人比「傷害」 還不值錢

勞工經濟學家 Rodest S. Smith 指出：「一種工業決定花多少錢在安全設施上，可以決定這公司的利潤問題。低薪資的工人比「傷害」還不值錢，也就是說，當一個有高科技術而薪資待遇較好的工人傷殘時，照顧他們所需的費用多於因沒有他們而產品損失的總數。低薪資工廠的受傷率來得大的原因是，它可以將傷殘的工人換掉而不需花更多錢來改善安全措施。」在「利益動機」下，資方往往不願投資在安全裝備上，罔顧勞工的生命，來求取最高的利益，而政府主管單位的縱容則助長這類情形的惡化，正是吾人所該同聲譴責的。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煤業合理化基金的使用辦法中僅有的關於安全器材的購



●在資方眼中低薪工人的命不值錢

置都因為資方的自私自立而變成徒具虛文，兩億多的金額幾乎完全被納入資本家的荷包，而勞動者只有在死亡陰影下出生入死。事實上，在煤礦的種種災害中，造成最嚴重傷害死亡的原因，莫過於瓦斯爆炸或突出，從最近廿五年（至六十九年止）台灣地區煤礦重大災害的記錄顯示，60件大型災害中（一次死傷五人以上）僅有十三次屬於非瓦斯事故，也就是有四十七件災害不是由於瓦斯爆炸，便是由於瓦斯突出。可是，根據文獻指出，「關於瓦斯災害如能防範得當，嚴密控制瓦斯的停滯與流動，實可避免。」（台灣礦業史）由此看來，今天台灣礦業工人的職業危機的抒解，是「不為也」，而非「不能也」。如果今天政府與礦主願意開誠布公，真心愛惜礦工的生命，礦工就應增置一切安全器材，諸如瓦斯檢定器，並改用耐爆型電機，而政府尤應嚴格督責安全檢查事務，切實負起責任，不能再縱容礦主視礦工生命如草芥。否則，國民黨大員這一陣子發表的有關的整飭煤礦業的談話都只是應景的官樣文章，對保護礦工生命毫無裨益，令人心驚的悲慘災變仍會再發生。到時候，再喊「送愛心到××」就沒人理會了，民衆要做的將是群起憤怒聲討。

現代史料

吳國楨八十憶往

江南



吳國楨其人往矣。在他口述的回憶裏，透露了不少現代史中鮮為人知的內情，為現代史留下可貴的材料。因言論尺度所限，原文做了必要的刪節，敬請原諒——編者

(22) 夏潮論壇 / 84年8月號



●王世杰

吳案擴大為一個政治事件，是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事。總統府秘書長王雪艇撤職查辦，但內情却秘而不宣。一說，受民航公司（CAT）套匯的牽連，一說，與遠在美國的吳國楨有勾結。小道消息，盛傳不衰。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吳於前一年五月廿四日離台，去國半載，關於過去的不愉快，隻字未提，頗有「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的美德，有潘公展（前上海市臨時參議會議長）的一段話，作為見證：

「我在去年夏初，吳先生初到美國西岸時，因曾聽得方自台灣述職回美國的蔣廷黻博士談及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的成績，認為在推行民主政治上相當成功，當時就在

六月十日紐約華美日報社論中，稱譽吳先生省主席任內對此有其貢獻。等到他在七月初到紐約，在其公園大道的「大使旅館」中招待記者時，我又寫了一篇「君自祖國來」的社論，要他對自家人打開天窗說亮話，報告一些「真」消息給僑胞聽聽，不要像專對外國人一般用些外交詞令，我並且在這些文字裏提出三個問題向吳先生請教：

『第一、憑藉什麼力量去反共？這股國內海外以及大陸上潛伏的力量，究已培養到什麼程度，團結到了什麼地步？第二、任用什麼人才去反共？是否還是論資歷，講派系，談同學同鄉關係，以為用人的標準，抑或明賞罰，嚴黜陟，進賢能，罷貪壬，卓然樹立嶄新的風氣？第三、自由中國今天是否在政治上已先與竊據大陸的共×作仁政與暴政的競賽？假使我們所用

的方法還不盡完善，是否正在努力改進？

但是吳國楨先生對我提出的問題，並無答覆，也從無不滿意政府的話題。後來旅居紐約的十幾位國大代表，由於斌總主教發起，在中美聯誼會聚餐歡迎吳氏夫婦，我也在席間問過吳先生關於外傳台灣物資換取外匯和設有大跳舞場的謠言。他對前者約略解釋了台糖出售與糧食出口的事，而對後者則稱並不知道。此外再絕未有片言隻語提及國民政府的不夠民主，更談不到有「專權」的字樣。去年雙十節前夕，紐約中華公所中美聯誼會華美協進社等團體發起在花園大道的華道夫大旅館內，舉行國慶晚宴，特邀吳國楨和斐列特將軍演說。吳氏的演詞還是呼籲僑胞和友邦人士支持中國政府的反共鬭爭，可見吳先生的轉變，當在那時以後。」

「陳變」自與王世杰去職的謠言有關。吳為此，擬就啟事一則，於一月十六日寄給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張其昀，張把皮球踢給經明老先生。

風傳非法套匯 吳蔣隔海大戰

(23) 夏潮論壇 / 84年8月號

吳老先生，日本士官出身。清末扮演過建軍的重要角色，素以名節為重，兒子的遭遇，感同身受，豈能以等閒視之，接獲啟事稿件，不容稍緩，立即出馬，遍訪台北各報，接洽刊登。

各報廣告科，不看內容則已，看到吳國楨的大名，除了向上級請示，愛莫能助。報館負責人再呈報中央黨部，總統府一再稽延，蔣先生終於點頭，於二月七日刊出。

吳的廣告，久無下落，不免冒火三丈。八日接見記者，一聲霹靂，事件爆發。

「吳先生，假定廣告事，順利按時刊出，這場隔海大戰可以避過嗎？」

吳未作正面回答，敘述原委如次：

「那實在是巧合，二月八日這天，芝加哥電台的X節目主持人，因原定的來賓爽約，臨時拉我去湊數。有位記者向我提出，台北報紙說我貪污，是否有其事？這樣揭開序幕。後來，聖路易的一個朋友，在他的報業系統，寫一篇文章為我辯護，因此，擴散及全美。」

「你知道張道藩在立法院質詢的事了？」我提醒他。

「那是奉蔣先生的命令，罪狀甚多，甚至說我『非法套匯』……」

「這點徐柏園在立法院曾公開否認，決無其事。」

「有人說你『銀行有驚人數字的美金存款，在美生活豪華』……等等。」

沒有等吳先生接下文，夫人先開口：

「這是憑空造謠，我們到美國，經陳誠批准的結匯款項僅五千元（台北雜誌報導，徐柏園說是四千五百元，有五百元的出入。）後來的生活，全靠K.C.巡迴演講的收入。」

第二天清晨，陽光透進書房，春意殷濃，北國嚴寒，南方春暖，窗外偶而傳來啾啾鳥語，更增添大地春回的氣氛。

在早餐桌上，邊喝橙汁，吃煎蛋，邊談天說地繼續前一天的談話。重點放在知人論事這方面，又作政壇掌故聞之，亦可作史事片段看之。

蔣宋門法擲花瓶 陳方私函釋前嫌

「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你做政務次長，你和宋先生的關係一定很不錯？」

「我和宋先生打交道，是在做湖北省財政廳長期間，那年湖北大水，哀鴻遍野

自兼外交部長，宋子文駐美交涉，在身份上，屈居大使胡適之下，所以，要求部長名義。

「蔣宋雖是親戚，鬪法鬪得厲害，蔣問宋，有沒有考慮次長人選？蔣廷黻如何？」吳呷着咖啡，精神抖擻。「蔣是孔祥熙的人故宋未接下文，蔣先生再問，有一個人，你不會反對的，胡世澤管常務，吳國楨管政務。」宋當場同意。

處事明快，具包公之風 整飭紀綱開除邵毓麟

曾任外交部情報司長的何鳳山，在其回憶錄中，春秋人物，對他的長官，評述如下：

吳國楨以政務次長代理部務，宋子文雖為部長，實際上並不到差，長住美國華府。吳氏這個人精明幹練，且當盛年，精力充沛，深受最高當局寵信，算得是紅得發紫的人物。而他也確有一套的作法。

有那些作法呢？傳說（一）吳不帶私人，一切秉公辦理；（二）用人惟才，任何人推薦，一概置之不理，僅宋子文部長批准，與陳布雷介紹例外；（三）利用公議代理私決。何鳳山津津樂道地說：

。何永瀾主席派我去找財政部長宋子文，請求中央撥款賑災。我到南京找宋，宋去上海，我追到上海，宋回南京，他總是設法躲着我，情急生智，用廿元大洋買通門房，始克如願。」

「宋這麼官僚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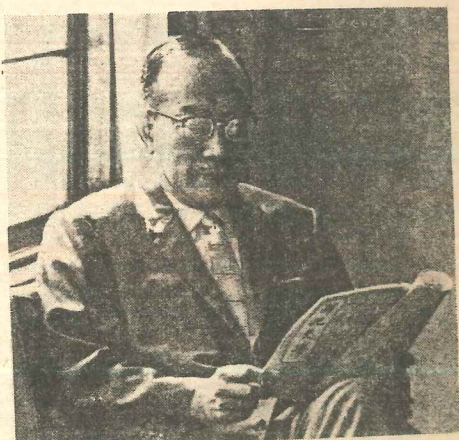
「K.C. I can only give you five minutes to present your case.（我祇能給你五分鐘的機會。）宋愛說英語。」

吳祇用三分鐘，把湖北的情勢，說得一清二楚。宋立即同意，但宋有條件在先，「As long as you are（只有你在，才能照辦）。」

宋是國舅，外間傳說，蔣宋關係並不



●宋子文



●邵毓麟

「現在說一下部務會議的重要，每星期部中開部務會議一次，由各單位的主管司長參事與簡任秘書等參加吳次長主席，常務次長吳世澤亦列席。所討論的除行政方針，重要案件與棘手問題等之外，尚有人事的決定，有時參加的主管人員，因意見的不同，彼此爭辯激烈，吳次長不以為異，不加干涉亦不作左右袒。某次總務司長李維果與禮賓司長吳南如，為了工作的分配，兩人爭執得面紅耳赤，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我也與吳司長因批評科員呂一民，當場發生過大辯論，這種現象表面上雖有似吵架，實則並沒有傷害彼此的和氣，

「為什麼不找你的Sister？」
「No！」連連搖頭。
「給蔣先生寫一封信不就得了？」
「能否幫我代勞？」
「找芷町（陳方）比較合適。」
陳芷町，吳推崇為天下第一刀筆，致蔣函，其中兩句「子與鈞座，情同骨肉，誼實君臣」，國楨先生仍琅琅上口。字裡行間，其實是認錯道歉，但盡在不言中。
第二天，蔣果召見宋子文，盡釋前嫌。
「後來，陳芷町到我家，大吹宋子文請他寫信的事，我假裝一無所知。」吳笑了，夫人亦為之樂也融融。「我相信，陳方生前，從來不知道其究竟」她說。
抗戰後期，宋子文任外交部長，但這位部長常駐華盛頓，實際職務吳國楨全權代理。據吳回憶，鄧泰祺下台，蔣先生曾

與阻礙事體的進行，於今回味這一部務會議決定一切的制度，頗為民主，也比較公正，是最好的制度。不過勝利以後，吳氏離去，此一制度就形存實亡，漸漸的消失了！」

吳給人的印象，開明圓滑。當省主席時，開門辦公，官民一片。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吳具包龍圖的性格，遇事乾淨俐落，決斷明快。和魏道明，嚴家淦之流的官僚之尤，截然不同。

他告訴我開除邵毓麟的例子，就會令人擊節稱賞。

邵，杭州人，任外交部情報司長，同時侍從室兼職。凡是內侍出身的官員，仗著後台硬，外放時，無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邵亦難於例外，不時為大公報撰文，議論時政，且以權威姿態出現，宋子文部長屢次警告，邵置若罔聞。

吳代邵務，邵依然如故。「爲了整飭紀綱，我不能容忍了」吳說：「我找邵面談，邵不到，一氣之下，簽報蔣先生，蔣批示『革職永不錄用』。」從此，次長威信大立，再沒有人敢捋吳的虎鬚。

「不過，這樣我得罪了陳布雷先生，做宣傳部長期間，我和陳有很多交往，陳是好幕僚，然非用人之人。」一語道破，

那位在南京一死謝君主的布雷先生的弱點。

卡內基說過，「我最大的成功，就是，凡是我手下的人，都比我能幹。」這句話的真諦，用我們的話說，即「知人善用」。由「知人」，我們涉及很多當時的政治人物。

吳任外次，黃朝琴外放金山，擔任總領事。後來，吳任主席，黃是台灣省議會議長。吳稱讚黃「忠誠幹練」，「十分傑出」，連震東「靠不住」。

糧食局長李連春「苦幹」，吳三連「厚重」。大約廿年前，吳三連訪美，尙會私訪吳於伊利諾私宅，暢敘別情，不畏刀斧。

我提到張群，一則他們間有私誼，一則外面傳說吳也是政學系的成員，請他加以澄清。

「這完全是傳言，中國有CC派，而絕無政學系這個組織。」吳斷然闢謠。「岳軍先生，我們很有私交，有次他問我：『你看我能做些什麼？』，我回答『太平時候的宰相』，他說：『你以爲我不能應變嗎？……』」

張群之能成爲不倒翁，重要靠他的是肆應本事。他的名言，「蔣先生是食客，

我適是大廚，他愛吃甚麼菜，我做甚麼。」吳說他治世之能臣，實言簡意賅，收一語中的之功。

就美國當前的情況，他深有感觸引用孟子，「上下交征利，國危矣」這句話，發生警語。

他比較中西文化的區別，西方追求進步，企業，主動。中國倡導「講信修睦」、「和爲貴」，所以縣官的主要建築物，命名爲太和殿，保和殿，一切在「和」的前提下前進。

西方過份重視權利，忽視責任，在一部字典裡，沒有一個「讓」字，中國人具忍讓的美德。

吳提醒我，他的新著「中國人的傳統」對此有詳細的討論，可見他晚年思想，近乎哲學家羅素的變化，仍保持尖銳的觀察，不保守亦不固執，永遠走在時代的前端。

胡適愛熱鬧 流落紐約景況慘

「我知道，你和胡適之先生，有過一次小小的筆戰，胡先生已作古多年，能否說說你對胡的看法？」

杜的回應，遇事第一個捐款，對吳執禮甚恭。有次，杜去市府見吳，「杜先生，我抓了不少你的門徒！」

「我知道，市長，你稱我杜先生，怎麼敢當。」杜受寵若驚地回答。

「從現在開始，我們是朋友。」吳當面宣佈。

「在你手裡，我不犯法。」杜信誓旦旦「媚我包的，因爲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不傷天害理，煙，我不插手。」

杜透露一項秘密，且有□先生的手令爲證。原來，吳鐵城做上海市長的時候，杜販煙，得到□的許可，按月要給國府繳款。

「上海淪陷，杜去香港，爲甚麼不去台灣，是爲了和經國不和嗎？」我問。

「不是，他不喜歡陳誠。」

在候機室，我們提到現在華盛頓的張彼得，張是吳上海時代的老部下，吳夫人說：「Peter英文不好，人也不行，會裝腔做勢，賣主求榮。」

因機場麥克風傳來旅客登機的通知，我們和吳氏夫婦握別，回到金山，我們沉浸在歷史的往事裡。遙念吳老健康，下次再去看他。（全文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



●胡適

「我一向很尊敬適之，當年我去北平，他特別設席款待。大陸淪陷，他住紐約，租一間公寓，我去看過他，他的情況很慘，每月靠蔣先生給的三五〇元津貼過日子。以他的資格，可以到任何常春藤大學任教，但是，誰肯請他呢？有了胡適之，那些假中國通又怎麼辦？」

「門戶之見，是不是？」

「一點不錯，當然，五十年代和今天的情況也不一樣。後來，普林斯頓大學請他做兼職圖書館館員，月薪三百元。適之的確很委屈，我問他，爲甚麼不去巡迴演講？他說，每一次演講，要兩週時間準備，所以，無法勝任。」

「那末，你們又怎麼割席的呢？」

我復誦殷海光的評語：「胡適一生的悲劇，是太喜歡參加雞尾酒會，愛熱鬧。」吳先生回報以沉默與微笑。

因搭下午的一點飛機，首途華府，我們提前到機場，亦在機場餐廳午餐，繼續我的訪問，談話重心，移向非政治人物，中國的「教父」杜月笙，事實上，正是訪問的尾聲。

吳過去和杜月笙素昧平生，當上海市長後，是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首先向他請示：「杜月笙這個人怎麼辦？」吳的答覆：「依法。」

台灣的社會發展與省籍問題

李哲夫與戴國輝對談錄

葉芸芸整理

台灣的省籍或民族問題演變至今，實在很難限於台灣人與國民黨之格局內來討論，探討到某一層次就必然要碰觸到帝國主義的問題。這個矛盾要探討下去，就不能局限在台灣島上來談，也不能在省籍上繞圈子。

李哲夫（台灣嘉義人，

美國天主教大學社會學教授）

戴國輝（台灣桃園人，

日本立教大學史學教授）



戴國輝教授（左）與李哲夫教授。



葉芸芸（左）與戴國輝教授、李哲夫教授。

人物對談

●多年來，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海外的，對台灣政治現狀的不滿，所採信的反應多半是訴諸情緒化的言語或政治主張口號。無法進一步針對問題加以深入的探討與整理，確實有違知識份子對社會應具有的啟蒙的責任。

葉：省籍問題或有人稱民族問題，一直是台灣政治上相當關鍵性的問題，海外對這個問題的主張不少，也相當強烈，却較少有客觀、沉思的探討。卅年來隨著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開展，省籍問題必也一直在發展在變化，而今日的台灣社會已經邁向「現代」化、多元化了，黨外民主運動更是新人輩出，省籍問題恐怕很難一直留在桌子底下或愚性層次階段，因而我們也感覺到海外確有加以探討的迫切感。

●省籍問題有其特殊的歷史性格

戴：我目前只搞歷史研究，但過去在東京大學唸書時，碩士論文寫的是社會學方面的。今天有機會和社會學的專家李哲夫教授一起，針對台灣的省籍問題，經由社會學與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交叉討

論，希望對這個問題能有一番整理。

剛才葉芸芸提到海外對這個問題的主張強烈，却少有冷靜的探討。我也覺得多年來，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海外的，對台灣政治現狀的不滿，所採取的反應多半是訴諸情緒化的言語或政治主張口號。這樣子，雖然可以把問題攤出來，却無法進一步針對問題加以深入的探討與整理，確實有違知識份子對社會應具有的啟蒙的責任。

最令人憂慮的是，海外的政治理論及其作為，把省籍矛盾無限擴大成為民族、種族矛盾問題，恐怕會把台灣帶往好似納粹、希特勒給德國老百姓以及猶太人所加添的那類災禍。我們都知道，當年德國反共產產階級與共產黨爭奪政權，希特勒得資產階級之擁而上台，後來却無限制縱容反共而演變成極端排外性的種族主義，大殺猶太人以及異己，造成恐怖的法西斯時代。這個問題也並不孤立，在世界史上也有共同經驗的，不僅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日本對朝鮮人、東南亞國家對華人也一直有類似的做為。雖然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確實有歷史上非常特殊的地方，但基本上是一個地方主義的問題，地方主義的問題在一

個邁向現代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是相當普遍的、是世界性的，因此，今天我特別高興，能就這個問題在社會學研究方面，多向哲夫兄請教。

●爭論的焦點——中國觀念的「民族」

李：國輝兄，你太客氣了。你首先提到的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在傳統上這兩者間是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史學的傳統方法是拿事實，經過相當的整理後就好像可以把「事實」陳列出來了，社會學則往往是說事實需要分析。但是，社會學在經過長久以來運用分析的辦法之後，近年來也開始有所反省，覺得社會學所依據的歷史基礎似乎太淺薄了，因為太重視現今的問題了。我個人也有這種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傾向，總是以現今的問題當做開端，然後才往歷史追溯。關於我們今天所要談的省籍或台灣民族論的問題，剛才葉芸芸提到分開有「主張」和「探討」兩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待，若以社會學研究的方法來談，「主張」和「探討」並不見得要完全分開，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正是今天所存在的主張，然

這種短期居留的統治者心態，主要在於短期的利用當地的人力與資源，並無長久的打算，因而，只要其統治力量能夠維持局面，他們並不想跟當地的人民同化，台灣只是回到故鄉的墊腳石。這種強壓手段，就激發當地人民的反抗。

後再問為什麼會有這些主張？這麼一來，當然就不像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了。但是，等一下討論下去，我會非常需要歷史的細節來支持和驗證分析的方向。

現今已有的有關省籍問題或民族問題的主張，基本上都包涵了一個相當混亂的概念。到底所談的是指中國各地方、來源的不同呢？或是指種族的不同呢？種族的不同又可分兩種：一是指原種、血統來源的不同，也就是像白人與黑人。另一種主要指文化背景的不同，血統上可能相當接近，但是因為長期隔離與不同的文化發展，而造成不同的風俗習慣等等，叫做 ETHNICITY。而今天我們所關心的這個問題是具有現實政治的涵義，所以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我們或是其他海外台灣政治運動團體在爭論省籍這個問題時，其焦點的觀念到底是被如何解釋，以至於引起今天這樣的爭論？我們應先在可能理解的範圍內，

數的人移民到一個地方去，而成為少數的統治階層，最古典的例子就是「殖民」。西方的殖民者以他們優越的政治、經濟與武力到落後的地區，不僅破壞當地區原有的社會秩序，並且依其意願，指揮當地社會新秩序的創造，也就是說以其本身的優越性移民到另一個地方去當主人翁。另外一種是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而成為少數民族，就像中國人移民來美國一樣。還有其他的類型，我們等一會兒討論時可能會觸及到。

那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帶領着到台灣的那一群外省人，就是第一種類型，他們雖然是少數，但基於政治與軍隊的背景，他們自認是來管轄台灣的，是以統治者的身份移民來的。然而，當時的台灣，並沒有條件，要求被統治者一定要反抗統治者，而造成兩個民族間或者省籍間的界線。當時的確沒有這種因素存在，怎麼樣發生的呢？什麼樣的情況下，使得被統治的當地大多數人，產生要求自己統治自己的權力呢？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產生。光復不久，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接收官員與軍隊的逐漸積累起來的失望，已經是老生常談，衆所週知的

就各種主張中的不同點，畫分定義、界線。以我個人的觀察，今天人們所激烈進行的政治性或感性討論的問題，實在並不是「種族」的問題，既不是英文所謂的 RACE 也不是 ETHNICITY。雖然有許多討論的文章，沒有畫分清楚，都一概以種族視之。在中國的觀念，其實應該以「民族」稱之較為恰當，其內涵是 NATIVE NATIONALISM——就是有一群人在經過以文化、風俗習慣、歷史背景甚至種族膚色等等界定之後，覺得自己與其他群體有很大的不同，而以此為基礎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所以我認為 NATIVE NATIONALISM 應該是中國觀念裡的「民族」。

中國大陸所說的「少數民族」則是相當於 MINORITY ETHNIC GROUPS。而我們今天爭論的焦點則是台灣的省籍問題到底構成「民族」問題？因我們才有那么多的感情與憂慮其對政治的現況與將來會有什麼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問的問題實在是——NATIVE NATIONALISM 的問題在今天的台灣，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與省籍的界線，是不是構成某一個基礎（無

較為嚴重的現象是，這些國民政府的行政官員普遍帶着過客的心態，就像是被派到殖民地的優勢民族的殖民官員，有一定的任期，只是暫時性的。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年前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方向與心態大致是這樣的……

戴：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去……
李：對，對。當時匆匆忙忙逃到台灣，總以為喘一口氣，馬上就要反攻大陸回家鄉了。這種短期居留的統治者心態，主要在於短期的利用當地的人力與資源，並無長久的打算，因而，只要其統治力量、武力能夠維持局面、壓得住，他們並不想跟當地的人民有所交流或同化，台灣只是回到故鄉的一塊墊腳石。這種強壓手段，就激發當地人民的反抗。就像其他的殖民地一樣，殖民統治者的利益與當地人民的利益絕不可同日而語。殖民者的利益在於掠奪殖民地的資源運回母國，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則在於本地的長遠展望。這是台灣與其他殖民地相同的地方，也就是橫面的普遍性。但是台灣也有很多特殊性……

戴：當然，歷史背景大不相同。
李：原因有很多，以古典的殖民模式來比較，就有很大的差異。譬如歐洲在南洋

論由人種、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等，分出有明顯區別的一群人，並且基於這種區別，使得這一群人主張建立另外一個國家？

光復當時的台灣人，雖然意識到，相對於外省人，自己世代生存的地方是一個大陸各省以外的地方。但當時並無一種想法，認為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也沒有那種要求，所以，他們總是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在台灣海峽對岸的那一邊，光復接收的當時才會那麼熱情的歡迎祖國。關於這一點我們大概都不會有什麼異議的。需要探討的問題在下面，光復後的歷史經驗是否造成一種條件與情況，而觸發了所謂的民族感情，包括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要求呢？是有那麼一段歷史曾經造成了這種要求。

● 古典殖民統治與民族意識的萌芽

談到這兒，可能先得從橫面的、普遍性的整理來釐清——種族或是民族間的衝突是在何種情況下產生的呢？一般粗枝大葉的分畫，由歷史背景造成的種族之間的關係大概有兩種，一種是一群少

或南美洲的殖民地，當殖民母國要在殖民地發展經濟時，立即就面臨一個問題——殖民地欠缺能夠承擔母國所要發展的經濟型態的人力資源，也就是說殖民地的原有文化背景、生活習慣或教育水準，並不能馬上與較先進的經濟發展的要求配合。因而，就產生了輸入「第三種種族」的現象，印度人到殖民地的非洲，中國人到殖民地的南美洲或南洋都是變成這種 MIDDLE MAN，是去為殖民者服務，充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這種古典的殖民模式，在台灣就不曾出現過；首先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完全被切斷，不可能再運人到台灣，其次，台灣當時勞動力的水平，遠超過那些到台灣來的國民黨所能經營的，也就是說當地提供足夠發展的條件，包括人力和日本人所不得不留下來的一些基礎。所以古典的西方殖民統治型態，並不適用於解釋台灣的問題，雖然，早先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有着疑似殖民的關係，但是往後的發展却不是一樣。那麼，今天所有各種不同的台灣民族或省籍的觀念，其主張的方向以及激烈程度的不同，可能就是反應台灣從那個時代以後，因為政策的變更，台灣人與大陸人間關

●來台大陸人士因時期有異，其構成份子不同，當然其心態亦有其相異的地方。「二二八」的彈壓與在台的「清共」，其主要目的、對象、具體過程有所不同，我們需要留意詳細分析才够社會科學。

係的變化，而導流出幾個對台灣省籍觀念的不同層次的理解與主張。

簡單地說，一直到一九五四年，美國明確地告訴蔣介石不支持「反攻大陸」以前，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強壓手段。也就是說，在一九五〇年代前期之前，是赤裸裸地、用武力斬除一切可能產生的反抗力量，以求短時期間，在台灣建立起絕對的控制力。二、二八事件只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例，整個時代是一個恐怖黑暗的時代，被捕、被殺害的絕不只是台灣本地人，還有很多是與國民黨一起到台灣的大陸籍人士，後來被判為政治犯。事實上，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國民黨因為在大陸的失敗經驗，心懷着對共產黨的恐懼，在台灣進行一場殘酷無比的「清共」。單就台灣人民而言，國民黨遂變為一個與台灣本地利益完全不一致的少數統治者，其恐怖鎮壓的統治手段，確實在省

●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之所以會扭曲成民族主義的假象，有兩點最重要：第一，台灣有過五十年與大陸割裂的體驗。第二回歸祖國之後不久，就遇到了二、二八事變與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樹立政權的兩個衝擊。

，也有很多大陸籍的共產黨人，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段內情幾十年來很少為人所知，年前黨外雜誌在國民黨釋放了一批在火燒島關了卅年的政治犯之後，才有文章談到大陸籍政治犯。台籍小資產階級，藉張俊宏的「中智階級」來稱呼亦可，他們的「孤兒」屬性，自限為「只有我是被迫害的無辜養女」的觀點相當地重。

有一點我們需要較為嚴密地分界的是——社會各階層對省籍矛盾的不同反應。我認為把省籍矛盾等同於民族矛盾對待，或是說這種感覺最深刻，反應最為強烈的，多半是中產以上的階級與知識份子，的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的本省人也是這些精英份子佔大多數，農民、勞動階級參與的可以說少之又少。除了二、二八事件之外，中國共產黨政權在大陸的建立，對台灣的知識份子、中產以上的階級也是一個非常大的

籍問題上造成了歷史性的傷痕，為當時某一部份的台灣人民催生了「民族意識」。

●社會各階層對省籍問題的不同反應

戴：從事實上，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點是，來台大陸人士因時期有異，其構成份子不同，當然其心態亦有其相異的地方。第二點是，「二二八」的彈壓與在台的「清共」，其主要目的、對象、具體過程有所不同，我們需要留意詳細分析才够社會科學。

至於第一點，光復當時和一九四九年以前從大陸來台人士，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六種成份。「一為陳儀的班底。」二為國民黨各派所派來台的「先遣隊」份子。三、避免大陸的亂局，真正來台作事的，特別是有關資源委員會方面的「非政治」人士。四、老留日份子來台求發展。五、舊「滿州國」、「汪政權」有關份子，埋姓隱名為逃避「漢奸罪」來台混水摸魚。六、對岸閩南方面人士藉通達閩南話來台淘金者。我們以後若能多注意上

衝擊，怎麼說呢？就邏輯上來說，在國共政權之爭奪過程中，台灣的資產階級原來應該可以加入國民黨的陣營與共產黨對抗的，但是光復回歸到祖國懷抱才

第二年就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可以說是狠狠地被陳儀和國民黨踢了一腳。三年之後，共產黨的政權在北京宣佈成立，國民黨被趕出大陸撤退到了台灣，不僅如此，堅決反共的美國繼續支持國民黨，台灣竟然成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尤有甚者，台灣子弟還有可能被那個不肯接納我們的國民黨政權送到「反攻大陸」的戰場上充當炮灰，成為國共內戰的犧牲品，而且，大陸與台灣、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對比之懸殊，再怎麼看國民黨的勝算都幾乎等於零，那麼，只要國民黨繼續留在台灣，台灣就免不了要被捲入國共內戰的命運。就是這種恐懼與矛盾，使得台灣的資產階級有了與國民黨、中國畫分界線的心態，而產生了早期的「聯合國托管論」、「混血民族論」、「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請求美國支持台灣獨立。因為要向國際訴求，輿論上最好能造成台灣人與中國人已經不是同一個民族，台灣與大陸已經毫無關係的印象，使共產黨沒有理由，藉口過海

述幾點來作具體分析，或許較易了解當年的情況。一九四九年底以降，「避共」大撤退來台的有關軍政、黨務、財經、學界人士和他們子弟的事，我們今天就不多言及了。

言歸本題，哲夫兄，你由一般性的角度，引用世界其他殖民地國家的普遍情況來探討台灣的省籍矛盾的問題，是相當貼切的。換一個角度，由大陸籍人士在台灣的稱呼，由「唐山人」到「阿山」、「豬仔」這樣的改變，我們也可以看到省籍矛盾問題在台灣的歷史演變。光復初期的台灣，的確是沒有省籍矛盾或對立的問題存在，當時台灣人民所認同的祖國是由重慶復員回來的南京國民政府，台灣人一直尊稱大陸來的人為「唐山人」，是所嚮往的唐土那兒來的人。而我們客家人對大陸籍「原鄉」，對大陸來的人稱「老屋伯」、「唐山客」。但是經過二、二八事變後，對祖國的期望落空了，失望了，「唐山人」遂變成「阿山」、「豬仔」這種好吃懶做、侮辱性的稱呼了。

關於二、二八事件，一般都只談到受殺害的台灣人，方才哲夫兄提到五十年代前期，國民黨在台灣所迫害的政治犯

到台灣來，這些實在都是具體的歷史經緯所造成的。

省籍或地方主義的問題日本也有，世界各國也都有的。台灣的省籍矛盾問題，之所以會扭曲成民族主義的假象，是有其歷史的特殊性，整理起來有兩點最重要：第一台灣與大陸不曾被一起殖民過，台灣有過五十年與中國近代史與大陸割裂的體驗。第二回歸祖國之後不久，就遇到了二、二八事變與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樹立政權的兩個衝擊。

●歷史不會停留在五十年代

李：經過你由歷史縱面的整理，我們就更加清楚，今天人們所談的中國觀念的「民族問題」，並非人種或種族的問題，而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群體，成立自己的國家的政治要求的問題。

總結我們上面所討論的，如果歷史停留在五十年代，國民黨繼續其高壓的「殖民」統治，與反攻大陸的國策，國民黨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台灣人民之間，就可能延續著以二、二八事件為代表的關係。那麼，幾乎可以斷言，台灣的「民

韓戰以後，台灣做為對中共的圍堵政策的一個重要戰略點，美國是絕對支持國民黨有效而穩定地控制台灣的。從那時候開始，國民黨政府，接受美國的軍援及大量的經援，並就日本人留下的一些工業基礎，開始在台灣經營發展。

族意識」就有可能成長，並將成為台灣人民反抗運動的基礎，武力革命或有可能發生。但是，台灣的歷史由五十年代後期却有了大轉捩點，那是因為美國明言不再支持反攻大陸，而促使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政策有所調整，當時，國民黨本身對「如何調整？」或許並不明確，更不會讓老百姓知道。但是，不可能光復大陸，而必須在台灣久留，必須在這塊土地上經營以求落地生根，則是不爭之事實了。五十年代以後台灣的發展談起來是相當有趣的，美國扮演個重要的大角色，她雖然不支持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但是，韓戰以後，台灣做為對中共的圍堵政策的一個重要戰略點，美國是絕對支持蔣介石政權有效而穩定地控制台灣的。從那時候開始，國民黨政府，不僅接受美國的軍援，也接受大量的經援，並就日本人所留下的一些工

業基礎，開始在台灣經營發展。

前面已經談到，國民黨統治台灣與古典的西方殖民國家有所不同，歐洲工業先進國家，當年到他們的亞、非洲殖民地，多少都帶著一點資本，並有一定的市場與產品要求。而國民黨政府到台灣時，却是一個經濟破產的政權，所帶到台灣的是少數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工作及技術人員、少數的商人和大量的軍隊，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力量，而非開發經濟的殖民力量。但却無妨，提供軍援、掌握資源與經援的美國不正是殖民者嗎？後來的日本也是。國民黨政府恰似一個代理殖民的中間人，以中華民族的觀點而言，國民黨政府是繼續在當「□□階級」的角色，這個角色國民黨並非首次擔當，在大陸時期已有相當的經驗……戴：而且，在大陸時地方大，人才分散了，較難起作用，到台灣以後，人才集中起來了，就能夠成為主要的動力。

●經濟開發與省籍矛盾的淡化

李：對、對。還有一點，就是前面已提到的第三種民族的矛盾問題，西方典型的

殖民者，需要輸入第三種民族來協助經濟開發。台灣卻不需要，當時台灣一般知識水平很高，也就是說台灣本地住民就能夠產生協助管理經濟開發的中產階級。這就引起台灣人經驗上的矛盾，二、二八事變後早期那種全面反國府的心態，到了此時，已有部份中產階級參與了國民黨政權的經濟活動而分享了一些好處。台灣人，雖然在政治上仍無插足中樞之餘地，但確有許多中產階級參與經濟活動其中。所以說，歷史畢竟沒有停留在五十年代，台灣的「民族意識」也就沒有繼續成長的客觀環境，反而是「淡化」了。但是，歷史也不會停留在「經濟起飛」前夕的六十年代，中產階級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成就之後，很快地就覺察到政治權力上的不平等與隔絕，於是就有了黨外民主運動，要求民主、參政。自六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前期以來，黨外所倡的均是「民主」而非「民族」，這「民主」的要求，絕不基於五〇年代的「民族意識」。

戴：所以，大陸籍的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高玉樹等能夠站在一起，組成聯合陣線，是有社會經濟基礎的。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就是哲夫兄剛才談到的，六十

年代以後台灣經濟的開發，除了美援以外，可能還要考慮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等因素。在這個社會經濟基礎上，有了較強烈的意願，想要培養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的陣容，以為阻止中共滲透台灣的對抗力量，但是，這和國民黨黨內要求絕對控制的頑固保守勢力間是具有很多矛盾的。

李：關於台灣的經濟開發以及土地改革的問題，論者多半給予相當的評價，尤其是美援的機構——農復會所發表的論文，對台灣之經濟開發推崇備至，或說是三民主義之實施，或曰拜美式民主政治之賜，這類論文自然很受美國讀者之歡迎。時至八十年代的今天，美國仍然帶着濃厚的「民主導師」的心態，以在世界各國支援推行民主政治為己任。這種「民主」的理想原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政權，却是一點點「民主」的概念也沒有的，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過是認真的在當「買□」的角色。

然而，經濟開發的直接影響，却是導致以省籍的界線來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線、意志衰弱了、潰散了。為什麼呢？經濟開發以後，就有少數台灣資產階級

，有機會看到所謂國民黨的「高等上層社會」，也有某種程度的經濟的客觀競爭，也有某些原屬軍、政統治體系的特殊階級的外省人，轉入了當地社會的生產隊伍。省籍的界線就不再那麼明顯而尖銳，而是穿孔交流了。

●台灣資產階級的出路

戴：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知識份子與中產以上階級，確是相當致命的打擊，犧牲的人才不少。對生存者而言，三七五減租以及土地改革的衝擊也很大，我們可以具體的實例來整理。如果以傳統的觀念來看，辜顯榮、辜振甫父子都該算是漢奸，據傳辜振甫在光復當時，曾捲入日本軍人搞台灣獨立的旋渦裏，二、二八時他逃到香港去一段時間。但是，後來土地改革，以四大公司的股票向地主換取土地，大家都知道，當時四大公司的股票只有水泥公司的才賺錢，而水泥公司的股票，最後正好是撥給辜家、林本源等，最有力量台灣資產階級，他們因掌握了實權重新發跡。當年的吳三連並沒有什麼資產，他在日據時

代抗日政治運動中的貢獻，使得他成為極有聲望的知識份子，當時他也得到美援棉花而開始發展台南紡織財團了。我們不易找到確實根據來斷定國民黨或美國當局當年的動機，但由結果來探討，發現是有相當代表性的資產階級或知識份子都被編列到經濟開發的體系中去。而且，做為圍堵中共的戰略要點柱石之一小部份。軍糧供應的穩定，軍事基地建設所需之水泥，這都與土地改革之實施，水泥公司之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其他美援所扶持的民生工業，還有麵粉、紡織、塑膠等等，台灣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就這麼起來的。相對的，大陸籍的資產階級，却少有恒心積極地加入台灣的長期經濟開發，他們可能對國民黨缺乏信心，對台灣的興趣也不大，多半在台灣停留一下，以後就將資金外移轉到美國、香港、南美洲或南洋等其他國度。所以說，不管是不是巧合，美援在台灣所栽培的，確是一批台灣本地的上層資產階級。而這些台灣資產階級在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後，可能對政治也相當恐懼，他們把所有的精力向經濟方面發展，也終於找出一條出路。當然，其中也有要求政治上有更多發言權的，高玉

●民族矛盾的理论論實在只是一種假象，並無實際的社會經濟基礎。

樹、李萬居等人跟雷震搭配的出現就是反映了這一股力量，透過胡適之得到美國的支持，曾經有一些發展，但是後來還是不能為國民黨的保守勢力所容，雷震終於下獄。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在台灣地方政治上不可忽視的醫生。台灣的醫生在日據時代曾以蔣渭水、賴和為代表，在抗日政治運動中相當活躍，扮演了不少正面的角色，光復後，二、二八事件犧牲的醫生也不少。到了五十年代，政治權力、參與的轉型，最主要的就是國民黨對地方政治放手，開網於一口，好使有關人士有一出氣之孔。讓當地人去搞派系，而抵消了一部份反抗體制的「抗力」。

因而，地方上可能有政治權力要求的，像醫生這一類資產階級，多少有了出路，ENERGY有了消散之處。剛才您提到，如果歷史凍結在二、二八事件後的TIME TUNNEL，可能會發生更大的政治、社會上的磨擦，但是這一轉換，把社會政治矛盾都改觀了不少。

●中央政府與法統的強調

李：你談到了非常關鍵性的問題，我認為台灣在六十年代以後，政治上最大的轉變，就是產生了中央政治與中央政府、地方政治與地方政府的區分。決定政治的不一定是「政策」，有時候客觀條件的影響更大，人口就是其中之一個重要因素。光復當時台灣的人口是六百萬，到了八十年代是一千八百萬，三十年來人口成長為三倍，通常三十年成長為兩倍已經很高了，由此可見，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的大陸籍人士對台灣人口成長的貢獻！我們再以西方古典殖民為例來探討，就會發現，當殖民者決定在殖民地安頓下來時，殖民者人口較多的要比人口較少的壓力更大，就像南非、阿爾及利亞都是歐洲殖民者人口較多的殖民地，正因為他們人口多，要求安定與控制力的壓力也就更大。因而我們可以推論，當五十年代後期以後，國民黨自知不可能反攻大陸時，又面對着十年來大陸籍人口的膨脹，其要求安定，要求絕對地控制的壓力必然地也隨着變化。尤其，當經濟與社

會開始有所變化，大陸人與本省人開始有了交流以後，要保持社會安定，統治力量必須很強，「中央政府」與「法統」的強調也就益形重要，因而，「反攻大陸」的政策雖在五十年代後期已不得不放棄，但是一直到六十、七十年代，「反攻大陸」這個口號却是絕對不能放棄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階級問題。雖然一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因為分工與分配，階級一定會產生的，台灣的確是明顯而快速地在產生階級，但是國民黨却完全避開階級觀念，而以「法統」與「省籍」做為統治的兩個基本原則。所以，我認為在五十年代，台灣確是有強烈的省籍問題，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界線清清楚楚，是絕不會與社會階級混雜的。到六十、七十年代，省籍問題的存在却是政策上的需要，原來是社會自然形成的，後來則是人為的，因為要強調「法統」，就一定會加強省籍矛盾的問題……

戴：因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大部份是大陸時代選出來的外省人士，「法統」的強調必然根據省籍背景，如此一來，當然無意中亦給省籍矛盾加油添醋……

李：對。那麼，我們相對地看七十年代興起的黨外民主運動，雖然表面上談的是民主、是參政或選舉，其實就是圍繞着「法統」的問題，黨外運動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有了一個主題，而且這個主題甚至還包括了「省籍」的矛盾問題。

國民黨對高雄事件的反應，為什麼那麼緊張呢？過去她自己藉省籍的分界來避開階級問題，但是，黨外運動興起後，非常明顯地，「省籍」問題轉而成為黨外手上一張運用自如的王牌了……

●黨外支持者的階級背景

戴：而且，黨外能隨心所欲控制省籍問題，國民黨却只能藉省籍問題來保衛「法統」，無法控制省籍問題的焦點突破圍困。下面我想補充一點，分析黨外支持者的階級背景。由六十年代中期以後，至七十年代，這段經濟上高度成長的時期，教育普遍地提高，經由土地改革和美國經援所栽培的一批本地資產階級出現了。台灣社會也在激烈地變動中，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最上層和最下層兩個階級省籍問題的淡化。上層的，因為經

濟發展的需要，本省人與外省人有了交流，像水泥公司或幾個大銀行都請許多外省官僚當顧問，也有通婚的。而下層的外省人，像退除役軍人為了生活只能溶入台灣本地的下層社會，結婚對象也是高山族或貧苦的工、農人家的婦女。

李：外省人本身的階級極端化了。

戴：對。所以說最上層和最下層階級的外、本省人已經站在一條線上。剩下的是中間的，始終浮游不定的中產階級，他們在經濟、教育方面有了提升後，對政治上的缺乏發言權，自然有相當的不滿。所以我認為，這一部份中產階級是支持黨外強有力的階級基礎，同時也是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力量的重要來源，還有反共的長老教會，以及其他基督教會人士，也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那麼，海外的部份，在一九七二年承受了中共與美、日關係激變的大衝擊，造成主張台灣民族論並着重尋求美、日支持的第一代台灣運動領導人廖文毅、邱永漢、辜寬敏等人相繼返台，向國民黨投降。這就充分說明了，民族矛盾的理論實在只是一種假象，並無實際的社會經濟基礎。但是，這之後，美國的台灣運動反而興起了，這是代表新興中產

階級的年輕一代，這部份哲夫兄也會經過參與，可否請你分析一下？

●台灣結、中國結與美國結

李：哈哈！這個分析起來很有意思的。上面我們討論的，已經很清楚地分辨了五十年代所產生的「民族意識」或說對時局的反應，而產生的「民族」的要求，與六十年代所產生的是大不相同的。六十年代以來，確如你剛才提到的，上層與下層的已經沒有省籍的問題，只有中間的，要往上層沒有可能，往下呢！當然自己不願意。正好，那個時候國民黨開放了留學生政策，於是，大量的中產階級子弟到了海外。你剛才要我分析這些人，我想這些人是在幾個失望下所產生的，他們可能帶著比五十年代的「台灣結」更嚴重的情緒在參與政治運動。怎麼說呢？第一，他們對國民黨當然失望了。第二、老一代的台灣運動者也令他們大失所望。第三、對中共，他們從未有過寄望，這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教育中，中共從來都是不許碰觸的、不能想像的。因此，他們實在是毫無

●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面臨著如何解釋自我存在的問題，不僅僅台灣島內的年輕人，海外的、港澳的，甚至大陸的年輕一代，都普遍關心這個問題。他們不僅要求掌握科技控制的知識，對自己的存在、對世界的情況都有認識的要求。

去路的，只有選擇「美國結」，寄希望於美國人。今天，在海外可以看到的很多台灣運動的言論中，這種美國情結是表露無遺的。

更進一步深思，我們會發現，這個「美國結」，其實是整個六十年代的產物，實在是不分省籍的。「中國時報」就是一個外省籍的「美國結」代表，他們的經驗與台灣運動人士的經驗，其實是很相近的，只是他們雙方都繼承了傳統的「省籍矛盾」，因而向無法合作。但是，某一天，如果利害一致超越了傳統的省籍矛盾，合作是很有基礎的。而且，這樣的合作也是台灣當局以及一部份美國政客所期待的。台灣的省籍或民族問題演變至今，實在很難限於台灣人與國民黨之格局內來討論，探討到某一層次就必然要碰觸到帝國主義的問題。前面已經談到，六十年代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維持政局，是因為背後有一

個真正的殖民者——美國。這個矛盾要探討下去，也就不能局限在台灣島上來談，也不能在省籍上繞圈子，事實上，六十年代後期以來，利益的分界線就不是省籍了……

戴：但是表象還是省籍的。不滿現狀的「台灣」朋友，一直都把這個表象亦是假象當做「真象」，來做他們的「情緒戰」……

李：表象是歷史原因，因為這些人無法克服歷史遺留下來的心理。但是，很多利害關係的估計、盤算，雙方却是一致的，譬如，年前大力支持美國賣武器給國民黨的不正是台灣同鄉們嗎？

●將來是屬於新生代的

戴：最後，我們是否探討一下省籍問題如何能夠克服？而不至於演變成法西斯的鬼胎。就社會學的範疇與理論上，哲夫兄，你認為有沒有「出口」呢？

李：國輝兄，你給社會學出問題來了，我倒覺得今天的談話受你這歷史學家指引的較多呢！哈哈！話說回來，社會是發展的，歷史不會停留在五十年代，當然

談，必須要放到國際社會、世界的觀點來看待。

戴：關於知識壟斷的問題我有兩點補充一下。首先說以前國民黨為什麼能夠壟斷？五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經濟基礎還不穩，而且又害怕共產主義滲透到台灣來，所以，當然要控制思想、知識。過去老一輩台灣人士是透過日文接觸世界思潮。光復後年輕的不再具備日文的能力，也還很難透過英文接觸思想性的書籍，而中文書籍國民黨就很容易控制。但是，隨著經濟的成長，台灣與世界的來往漸漸頻繁而打開了孔道，還有香港、東南亞的僑生對突破知識壟斷也有相當的貢獻，六十年代以後留學生多了，也有回去的，又開放觀光了，所以國民黨要再持續知識的壟斷實在是很困難。人的來往，語文上能看英文的年輕人都逐漸增加，慢慢地形成衝破壟斷局面的動力。最近我看到「暖流」上有一則消息，說是各大學附近的書攤有很多三十年代文學書籍出售，且非常暢銷。因而康寧祥提出質詢，要求國民黨開放有關書籍。

最後，我談一談對年輕一代的期待。前面我也提到我對省籍問題的憂慮，擔

心省籍問題被台灣民族論者無限擴大，擴大成民族問題，變成排外「種族」意識，而把台灣帶到法西斯的窄路上。然而，我這次來美訪問遇到一些香港、東南亞的留學生，有的以前在台灣唸過幾年書，有的也沒有，但他們的台灣的政情與前途很關懷，對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大力支持。也有一些外省籍留學生，認為國民黨太對不起台灣人，而帶着一種原罪感在支援台灣的黨外民主運動。

只要台籍的年輕人，能放眼世界克服自己的「小格局」，與上述一批年輕人合作，是可以給台灣吹進新的風氣的。我又碰到一些富有朝氣的台灣青年，我感到台灣的年輕一代是有希望的，他們難免還要帶着一點歷史的傷痕，但是大方向上需要他們超越，而我也相信年輕的一代是能夠超越，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李：僑生對台灣的關心，我也有一些個人的體會，的確非常感動人。他們有的甚至從未去過台灣，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不僅僅關懷、支援，同時還有無限的嚮往，這可能與他們本身的殖民地經驗有關吧！然而，他們的關懷、支援並不會得到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接納，但這也無妨，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原是凍結在

也不會停留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雖然，目前人們把焦點放在 ESTABLISHED 的一代，但是將來是屬於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新一代的。對年輕人我比較樂觀，至少近來在新生代所辦的黨外雜誌，已漸漸可以看到超越「島國意識」的世界觀，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觀點的文章，雖然有的相當激烈，但這是一種求變的表現，還是可喜的。看這種發展，應期待他們突破省籍觀念的局限，揚棄歷史的包袱，而以開闊的視野與胸懷去研究台灣本土的根本問題。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三十多年來知識壟斷的局面正逐漸在被打破。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除了政治上集權外，知識的壟斷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年輕人，都是在知識壟斷下受教育、成長的，因此我們看到他們在感情上反抗，卻無法在文化上、在知識上反抗。七十、八十年代的年輕人不同了，他們開始要求知識的自主權，國民黨說不准讀馬列，不准讀三十年代的文學，年輕人就偏偏要讀……，正好這個時候，新生代普遍要求突破知識壟斷，對台灣問題也有不同的評價、也理解到台灣的問題不能只局限在台灣一島來

六十年代以前的心態，從來不曾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的發展一起成長的，這是華僑界的普遍現象，沒有辦法。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如今，台灣要求知識不再被壟斷的現象相當地普遍，也不僅限於本省人或外省人或民主運動的範疇了。譬如前不久，台灣在討論「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問題，可見認識的要求，已不再限於對科技的生產及控制的要求，還擴大到自我解釋、自我認識的要求。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還面臨着如何解釋自我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台灣島內的年輕人，海外的、港澳的，甚至大陸的年輕一代，都普遍關心這個問題。他們不僅要求掌握科技控制的知識，對自己的存在、對世界的情況都有認識的要求。因而，我更相信台灣的新生代是有希望的，雖然他們仍然多少帶著歷史的傷痕，但這個歷史的傷痕在他們身上將成爲一種警惕。而且，如果省籍是問題，他們就會首先面對這個問題，會先搞清楚彼此到底是誰？他們不會再任人指使，告訴他們「你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只要新生代能夠突破、能夠超越，民主運動必能提高層次。

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方向

記與「台灣民主支援會」朋友們的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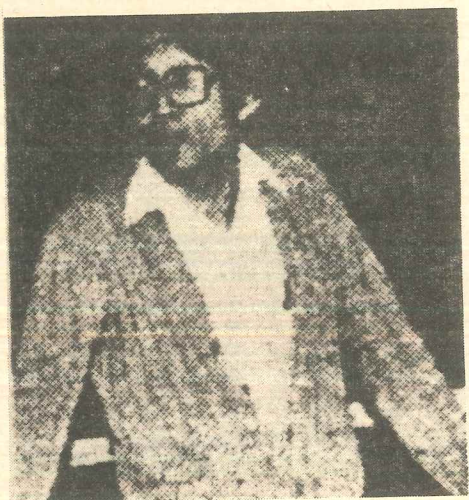
王曉波

中國統一的要求並不僅是國共二黨的主張，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自歷史的、文化的情感和現實的要求。

●「和尚」結婚了

此次赴美訪問，路經東京，就有朋友告訴我，「和尚」要結婚了。六月二十五日，我到了柏克萊，問到了「和尚」的電話，證實他確實要結婚的事，並向他道賀，在他堅持邀請下，七月一日晚搭機到底特律，參加了他露營的結婚儀式，及七月七日在芝加哥的結婚酒會。

「和尚」乃是林孝信的綽號。與「和尚」相識，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們都是台大學生，他是物理系的，我是哲學系的，他高我二班。一九六三年，台大



●「和尚」林孝信結婚了！

學生曾有過一個「自覺運動」，我是那年秋天進台大的。「自覺運動」在台大有個刊物叫「新希望」，進台大後，我很快就投入了「新希望」的編輯工作，而常常到男生第六宿舍二〇三室，找鄧維楨討論編輯事務，孝信也住在那個寢室。

「新希望」被迫解散之後，他糾合了一些念理工的同學和「新生報」合作，在報紙上開闢了「科學週刊」一欄，介紹一些科學新知給中學生讀。當時孝信給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刻苦勤學、任勞任怨、苦幹實幹，「和尚」的綽號，不僅指他剃的那個大光頭，也有苦行僧的意思。

後來，他出國念書了，竟用雲遊四海

海外傳真

沿門托鉢的方式跑遍美國各大學校園，勸說中國留學生，而創刊了「科學月刊」。不久，留學生的「保釣運動」起來了，我在台灣聽說孝信就是「罪魁禍首」，接着又聽說孝信變成了「共匪」或「台獨」。

八〇年，我到美國，看到一些「台獨」的刊物在罵他是「併吞派」，也聽見一些傳言說他有「台獨的尾巴」，甚至，還聽說在某一場合被「台獨」毆辱。而他本人則爲了「保釣」放棄了學業，護照亦被註銷，綠卡又沒拿到，又拒絕申請政治庇護，而變成了一個有家歸不得的「黑人黑戶」。那時，他已在美國糾合一些朋友，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發行「民主台灣」刊物，反對台灣當局對「高雄事件」的處理。

無論孝信被左、右、獨三派如何的誹謗，並且他又從不作任何解釋，但認識孝信的朋友對其刻苦崇高的品格無不敬佩。有些朋友對其不肯變通的「擇善固執」的作風，最多不過有「林石頭」的埋怨而已。

●統獨問題不能迴避

七月二日，我到了底特律的營區，參加露營的人有上百人之多。有些是我認識的，有些是不認識的，有些是經過「保釣運動」的，有些還剛從台灣出來在念書的。他們的露營除了遊樂活動外，還安排了有關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討論會，我也參加了一些討論會，並發了言。但因屬於臨時性質的講話，事先沒有準備，不免顯得拉雜和凌亂。所以，我願以文字的形式再做一次表達及補充，以就教於支援會的諸君。

我個人覺得支援會或孝信，之所以受到許多誤會，主要是對許多來自各方的誹謗不作解釋，而只在海峽兩岸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民主上下功夫。當然，我也知道，支援會的朋友怕一旦公開主張統一，就被利用；公開標榜反對中共，又會被國民黨或台獨利用；而台獨的一些荒謬的理論，也不是支援會的朋友所能接受的。甚至有些朋友自認爲，以往喊過「統一」被中共利用了，至今一碰到「統一」就有道德上的「罪惡感」。

但是，任何關心台灣前途的人，豈不能不涉及統獨的問題？即使是爲民主而奮鬥或爲獨立的民主而奮鬥的問題。迴避統

獨問題，只講民主，就不免給人有不清楚的感覺。

當然，在目前國共鬥爭的中國現實政治下，談統一問題是有其現實政治上的困難，不歸於楊必歸於墨似的。但是，中國統一的要求並不僅是國共二黨的主張，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自歷史的、文化的情感和現實的要求。國共二黨的統一主張，毋寧說是看到了這一項人民的要求，而以此作爲他們政治號召的一項運用，這也許還比較符合彼等政治的實在。

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那麼海外的民主運動，就應該超越國共二黨的侷限，爲沒有充分表達自由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表達他們中國統一的願望。站在民主的立場，中國的統一不是統一於某個黨派，而應該是統一於全民。如何統一於全民，法國大革命時有「國民會議」；孫中山當年也提過「國民會議」。

再者，民主也不是一蹴可及的，而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法國大革命的混亂不必說了，英國初期的民主也沒那麼理想。傑佛遜在美國獨立後，還在神壇前起過誓，要和一切的暴政奮鬥，也不該是無的放矢的。直到今天，還有人說，美國只是「少數人的民主」。即使是以「國民會議」

統一後的中國，我們可預見的，也是需要聯名質詢，最近，立委余陳月瑛又提出開放大陸探親的質詢。難道這些都不是台灣人民的聲音或願望？

現在台灣開放了觀光，為了避免台灣人到大陸去玩，而不發香港的觀光護照，但還是有人迂迴的跑到大陸去看看，難道台灣人民只喜歡到日本、美國觀光，而不喜歡去看看滿街都講「台灣話」的廈門嗎？不願意去看看自己先人墓碑上的潁川、泗水、隴西：嗎？我看那也不見得罷。

再者，日本電視記者拍的「絲綢之旅」引起台灣人民收視的狂熱，出版畫冊又造成空前暢銷，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還記得七十年代後期，台大曾經有人做過一個對大專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贊成中國統一的。

所以，我認為，台灣人民在現實政治上反對中國統一，其實是反對中共極權的統一，而不是反對統一的本身。

●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人性不能不有理想，政治也應有其崇高的理想，才能提昇其文明的道德，柏拉

圖講「至善」，中國人也講「止於至善」，天下沒有「至善」，「止於至善」只能是無限的不斷的道德提昇，否則，所謂的政治活動也只能是現實權勢支配下的螞蟥運動而已。

●反對專制的統一

另外一面，人生也不能不面對現實，失去了政治現實的政治活動，也只能是政治空想家而已。以現實面而言，今日國家組織尚存的一天，總是有一定的強制力的有一個過程，民主才能上軌道。

或者有人說，台灣人民是不希望中國統一的，從目前現實政治來說，這句話有它的道理，因為不在民主的方式下統一中國，只有三種可能，一是把「四項堅持」搬到台灣；二是把「戒嚴法」搬到大陸；三是名義上統一，實質上，各堅持的持，各戒各的嚴。對台灣人民沒好處，對大陸人民也沒好處。

但是，超越黨派的全民民主的統一，就一定會是因為統一而遭到台灣人民的反對嗎？我看那就不見得了。

在以往中國人所稱的「太平」就是統

預算嗎？

如果，中國能由民主統一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台灣的商品可以流通於大陸市場，資源可以由大陸取得，難道台灣的商人會反對嗎？這幾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外銷不好，追根究底，市場發生問題，全世界的商人都注目於大陸市場，而唯台灣商人無視於此？若果真如此，又為什麼有偷偷摸摸的「三角貿易」。記得幾年前，台灣資本界的代言人高希均就在「國建會」上提出與大陸通商的呼籲。黨外人士費希平、黃信介、康寧祥也為通商提出過

這種強制力，包括國內的，也包括國際的，有國家組織的鎮壓，也有人民不滿的反抗。這種強制力的形成與集結也是有其原因的。

主張台獨的一些人說，台灣並非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這句話並沒有現實政治的意義，因為北美也並非自古就是美國的領土，中國自「古」的領土也很小。

從歷史來說，台灣是不是中國的領土，實際上是由政治的強制力決定的。如果當時山地人有力量可以驅逐漢族移民的話，台灣就決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土。如果鄭成功不能驅逐荷蘭人的話，台灣也決不能成為中國的領土。如果第二次大戰，日本不是戰敗的話，現在台灣也不能成為中國領土。如果不是國府有武裝力量遷台及美軍進駐台灣海峽的話，今天也沒有台灣海峽兩岸的對峙。

雖然，國際上開了二、三十年的「台灣國際地位未定」，但是，現在世界各國都不能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也是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有那一個中國政府可以放棄台灣的主權？即使今天中共政權垮台，明天的中國新政權也不可能放棄台灣主權要求的。

那麼在現實政治上，台獨的可能性只



●大陸農民在鄉鎮出售蔬菜。

屏東恒春鎮的早市



一，不打內戰了。今天我們當然不會為了「太平」連專制皇帝都接受。但是，統一了之後，台灣的軍費就可以不必負擔那麼多。每次黨外人士在選舉的時候，都在呼籲裁減國防預算，能減輕台灣人民的國防負擔，難道台灣人民也反對？在不能統一的情況下，即使台獨成功，就能裁減國防

有二種途徑，一是以帝國主義的力量打敗中國，再訂一個「馬關條約」，但是，這在現實上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台灣人民又會對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抱着什麼態度呢？五十年的台胞抗日史應該殷鑒不遠罷。或者說，那是台灣人民的「落後性」，還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封建思想」，但這種「落後性」，「進步的」台獨諸君又將如何克服之？

第二是結集台灣人民的力量對抗中國，迫使中國承認台灣獨立，又因為國府不承認台獨，所以，要先推翻國府。又要推翻國府，又要對抗中國，這種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尤其是未來大陸的政局若獲得改善，或在中共結束後出現新的政局，台灣人民基於「落後性」的「大漢沙文主義」，又有多少台灣人民願意追隨台獨諸君呢？

所以，我覺得，在現實上，台獨的可能性太小了，既不符合國際政治的客觀形勢，也不符合長期的台灣人民的主觀願望。

●主張與批評 台獨的自由

對峙的
 情形
 今以歷史結構
 此入
 已之——此地敵人散佈
 進軍
 此係李叔。

取代血統論的，現在有經濟論和文化論。經濟論，說穿了，和費正清的「海洋中國」並無基本的不同，只是把「海洋中國」縮小到台灣一地而已。所謂文化論，不過是吹捧一下日據時代的「三腳仔文學」，說台灣已形成了漢文化與日本文化結合的新文化，這個結合中也拉了什麼荷蘭、西班牙、山地族作陪。

「台灣民族論」在理論上實不值一駁，但在感性上却在群眾裡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他們將台灣人的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裝飾成一個「民族」的「偽形」。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擴大就是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的傾向又是民族統一的阻力。這個問題在法國大革命後也曾

並沒有賦予人在出生前選擇族別的自由。最多只能埋怨自己「投錯了胎」，在「投錯了胎」之後，又在沒有選擇自由的情形下，接受了該民族的文化，成為該民族歷史之鏈上的一個環扣。這完全是一種「先驗的」和無可奈何的。

因為有這些「先驗的」存在，所以，作爲一個中國人，就免不了有自然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的流露。任何中國政治的黨派在海外號召華人，如果不首先掌握這點華人的民族感情，恐怕就很難獲得海外華人的擁護和支持。

有些朋友或自覺於社會主義的國際性，而對各國被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分軒輊的支持和關切，但是，絕大多數關切民主運動的海外華人，相較起來，還是最關切中國（含台灣）的民主運動罷。

就民主而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這一點海外朋友已應有共識，或謂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然沒有發達的或壟斷的資本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的可能。這也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常識，雖然，二十世紀的蘇聯和中共的革命，認為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故使得認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而是資本主義太少的劉少奇受到殘酷的鬥爭，但也造

發生，並且討論過的。其所以成爲民族統一的阻力，乃是因爲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產生於農業社會和封建的狀況下的。

「偽形」的「台灣民族論」除了鄉土感情和地方意識外，還有一些具體的歷史、政治、心理的因素促成其發生。五十年代的日本統治加上三十五年的國共分裂，在近九十年間，台灣有八十五年與大陸形成隔絕狀況。光復後的台灣，政治未能充分民主，尤其「二二八事變」後，台胞對光復的熱烈期望頓時跌入冰凍的深淵，轉而對祖國的失望。中央政府遷台，全國只剩全省，雖然有省政府的存在，其實全省的權力却掌握在由外省人佔絕大多數的中央政府手中，而成為台獨所攻訐的「殖民統治」。台灣的政治未有充分的民主是事實，但「殖民統治」却和「台灣民族論」一樣是「偽形」的。

我認為，把台灣獨立論建立在台灣民族論上，這是一種不聰明的提法。因為「偽形」的台灣民族論是經不起批判的，台灣其實應將其獨立論建立在國家論上，國家論是屬於政治學的範疇，而民族論則必須涉及血統、文化和歷史。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而言，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但是，一個民族也可以建立一個以上的國家，這種

成了大陸上文革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不可不謂之慘痛。

我絕無意爲資本主義辯護，並且，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弊端百出，尤其是由資本主義產生出來的帝國主義爲禍全世界，中國亦有切膚之痛，第三世界的人民至今猶在其剝削下的貧窮落後中掙扎。但是，有了大陸這三十年的慘痛教訓，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實行社會主義，這些問題也必須嚴肅反省，重新的認真討論。

即使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但沒有民族主義的完成是否可以有真實的國際主義的產生，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個人是懷疑的。

●民族的民主運動

以現實的國際政治來講，蘇聯對中共的「社會主義兄弟友誼」如何了，「蘇聯老大哥」不可靠，難道「美國朋友」就可靠嗎？中國人的奮鬥還不是要靠中國人自己。站在中國的立場，不論實行什麼主義，「濟溺扶傾」也是傳統中國國際政治的理想，但是，中國自己都站不起來，又如何幫助別國？當然，我們還是可以聯合第

例子也很多。當然，這又涉及了台灣獨立建國的可能性問題了。

雖然，我個人並不贊成台獨，但是，在一個民主國家內，人民有權做各種的政治主張，也有對各種政治主張批評的自由權利。主張與批評都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 生爲中國人
是無法選擇的

在海外我也看到一些朋友研究社會主義，並且，以此批評因民族感情而對國共二黨或「偽形」的「台灣民族論」認同的海外華人。

作爲一種學說或政治主張，社會主義也是應該受到尊重的，迴避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反共家，也只能是另一種形式的鴛鴦而已。

中國是否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或實行那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這應該是一個嚴肅而值得討論的問題。但是，民族感情却是一種自然的流露，不能因其現在受到政治黨派的利用而予以排斥或抹煞的，而是只能因勢利導的。

人可以有選擇或變更國籍的權利，但
 却沒有選擇或變更族別的權利，因為上帝

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共同奮鬥。

如何團結海內外的中國人爲中國奮鬥，如何激發海內外的中國人爲中國而奮鬥，這應該還是民族主義的範疇。並且，在人類還停留在國與國之間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階段，做爲一個中國人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今天只不過是在民族主義的範疇內，我們認識到民主是中國奮鬥的重要必須目標之一。我們是在爲中華民族的民主而奮鬥。並且，在歷史的實踐上，民主運動與民族主義也是並行的，並且，民主運動的實現也才是民族主義的完成。

所以，我認為，近代中國民族的民主運動，應擔負三項任務：一是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建立一獨立自主的國家；二是結束專制統治，建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府；三是統合各地地方主義，完成中國的統一。

參加了孝信的結婚露營，受到支援會許多朋友的啓發，而草成此文，但因身處旅次，資料不全，思慮不周，待返台後，必將各位朋友給我的啓發認真研究。唯願以此文作為孝信兄嫂的新婚「賀禮」，並請海外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指正。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于柏克萊

美國即將

放棄台灣？

田斯文

●香港問題國民黨 上不了談判桌

六月七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李文在紐約演講暗示，美國支持中共的香港政策，也就是間接對中共「統一台灣」的最重要國家目標給予支援（見「聯合報」，李靈均：評美駐港總領事李文談話）。

短評

李文的演講印證了淡江大學李本教授於五月十一日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演講和警告，他說：「中華民國各界應該預想美國可能改變台灣關係法執行上的態

度。」他並請委員們注意中共已經和美國簽定核能協定，發展殲八、殲十等高性能飛機等事實，才不致重蹈以往一直將中共視為廢物的錯覺，要不然等問題出來，恐怕為時已晚。

「台灣問題」從年初便正式上了中共與美國談判的枱面，但國民黨自身却上不了談判桌，國民黨最關心的是，在香港問題上英國幾乎是無條件放手了，但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人是不是跟着要放手？

答案越來越明朗，今年二月廿二日，中共頭目告訴正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前任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里辛斯基：「中國統一以後，台灣仍將實行資本主義，大陸

則維持社會主義。在一個中國之內，能有兩種制度，任何一方都不傷害另一方。」

●台灣問題 循香港模式？

到了四月底美國總統雷根訪問北京，鄧小平告訴他相同的話，並保證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不受影響，他說：「海峽兩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觸，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又說：「香港問題如獲得圓滿解決，可以為解決其他問題（即台灣問題）提供一個模式」。

當時雷根沒有正面答覆鄧小平一廂情

願的講法，只強調不願意放棄老朋友。可是到了六月，李文藉着香港問題發表演說，正式說明美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立場，並間接影響對台灣問題的態度。

李文的演講是美國對台灣關係「質變」的預兆，照理美國握有台灣比放棄台灣更為有利，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美國可能改變台灣關係法執行上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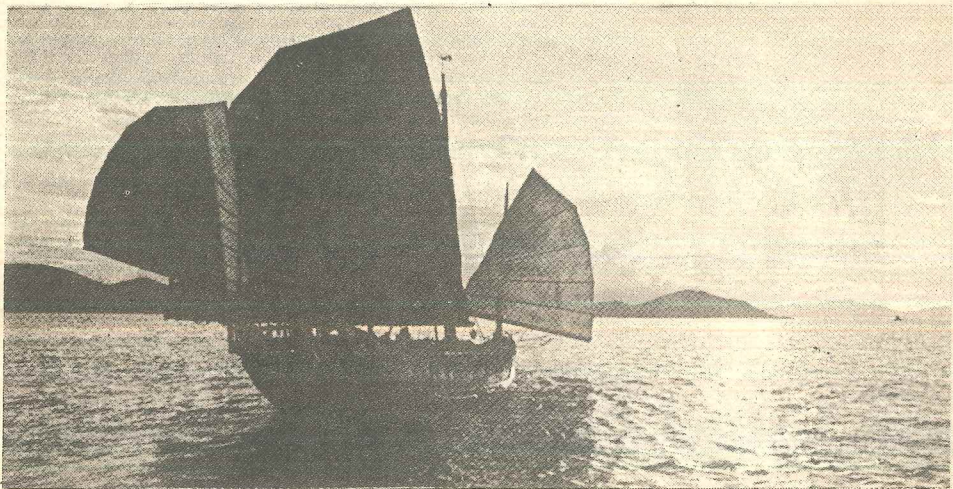
這可從穆考斯基的談話看出端倪：

美國參議員穆考斯基一再想來台灣做生意，販賣阿拉斯加石油，他和高華德最能替「老朋友」着想，六月二十八日指出，中共如果把新發展的殲八（F-18）飛機佈防台灣海峽，美國將被迫提供高性能飛機給台灣。

然而他又說，他對鄧小平所說「一個中國，兩個制度」極感興趣，認為深具意義，他相信中共處理香港問題的方式將對台灣的未來具有啓示作用。

●台灣還是可利用 的籌碼

至於中共與美國的核能談判，雖然有阻力，但由於中共需要美國協助它發展核能發電，雙方終將達成協議。



從穆考斯基的談話，可知雷根赴大陸時談判的十二座核能電廠（價值二百餘億美元）和香港的利益，正開始對美國發生無比的誘惑，據說雷根的對華態度，正受通用、西屋和貝泰等核能工業公司的壓力，這是中共明顯的經濟攻勢。

美國人在未來既可在台灣保持原有利益，又能從大陸得到雙倍以上的利益，焉得不對台灣放手？

當然台灣問題遠比香港問題複雜，美國人大可放長線釣大魚，用不着當冤大頭，還可以運用台灣這個籌碼，多釣一些利益，同時緊抓中共牌，大概是雷根之善可陳的外交上唯一的潤滑劑，否則在蘇聯的進逼下將一敗塗地。

當然中共不會平白被玩，年底的總統大選和七月底的洛杉磯奧運，美國人都要靠中共吃飯，要是萬一中共也宣佈退出奧運，雷根就非翻倒不可。

但是在這一整體不利的形勢下，國民黨並非痴呆不變，迅速擴充的外匯存底固然是在做實質的準備，核電工業、科學園區、外資工廠（如RCA等）、自由貿易區都是加速把台灣利益奉送美國人的做法，這一招是很管用的，美國人保有台灣總比放棄台灣好一些，不是嗎？

「炎黃子孫」

靠那邊站！

洲子洋

根據報導，南非政府即將廢除「最後一個華人社區」，而「今後炎黃子孫所待遇將與白人一致」。在這「炎黃子孫所待遇將與白人一致」說法中，不免有一份欣喜，甚至驕傲之感。

●白人種族主義的法西斯政權

事實上，南非這個國家，是由極少數的白人，對非洲黑種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種施行極為野蠻、殘暴、黑暗專制統治，惡名昭彰的國家。在二十世紀的今日，地球上幾乎沒有一個他地方，像南非那樣施行着公然的白人中心的種族差別、歧視和隔離政策。在南非，只有純粹歐美系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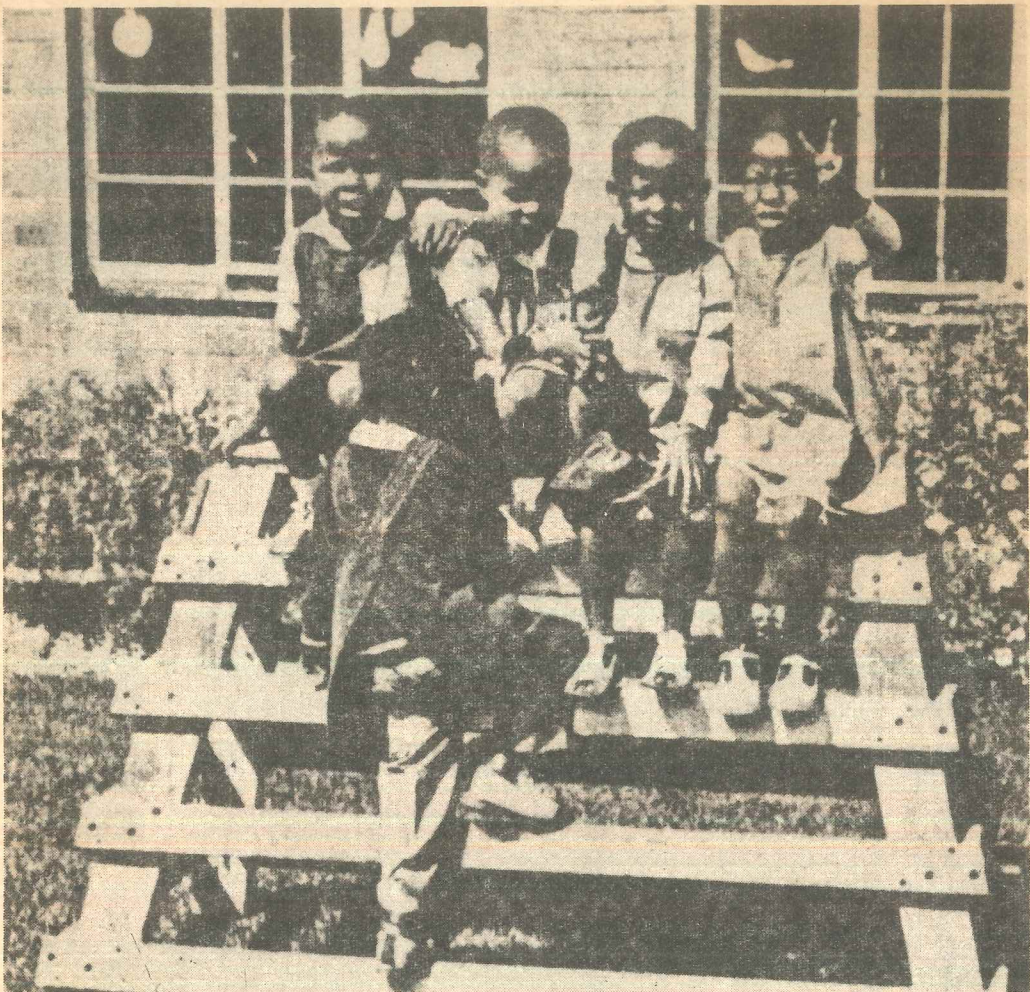
人才是統治的民族和階級。在白人以下，是所謂「有色人」，包括白人和土著的混血種，以及一切非黑人的有色人種。最下層，是非洲當地的黑種人。

在這以前，中國人被視為有色人種，被劃在中國人地區居住。中國人和其他有色人一樣，只准在被劃定的地區中生活，他們的工作、活動範圍、政治權利、公民權利、文化權利……都與白人不同。而黑人的權利，又遠不如有色人。他們被強迫遷到荒脊偏遠的地區居住，一遷再遷，而且一切黑人和有色人皆不許到白人區活動、營生、置居。黑人和有色人走在街上，白人可以任意毆辱，財產幾乎可以由白人任意侵奪。黑種人和有色人在政治上受盡歧視，他們的人權、財產的權利毫無保障。

對於受壓迫的有色人和黑人的反抗，南非政府採取極為野蠻、殘酷，毫無法律原則的鎮壓、逮捕，並加以酷刑拷打。

●只與三個國家建交

南非人民反抗白人種族主義法西斯政權的鬥爭，已經愈演愈烈。南非人民的反抗運動，愈來愈壯大，在許多英勇的宗教和政治領袖，以及一些南非人民的藝術家、文學家的領導和支持之下，白人種族主義法西斯政權越來越不得全世界的人心。在目前，和南非政府正式有外交關係的，只有三個世界上最保守的國家：美國、以色



列和中華民國。其他的國家，都因不恥、反對南非野蠻的種族差別主義而紛紛與南非斷交。

受到這樣的政權授予「在白人區居住的權利」，是一項光榮呢？還是一項恥辱？近來，不少台灣的資本家到南非去做生意、開工廠，利用「政治上」一些特權，對土著勞工進行剝削。南非人民仇恨白人種族主義法西斯政權，連帶地也仇恨與南非政府狼狽為奸的外國人。南非內部政情極端不穩，或遲或早，南非人民一定會起來推翻白人殖民政策。到時候，今天「所待遇與白人一致」的「炎黃子孫」，在南非人民忿怒的火焰中，會遭到什麼樣的處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爭取南非人民 真誠的友誼

中國人應該在今日與南非人民一道受苦，在明日享受南非人民真誠的尊敬與友誼呢？還是在今日貪圖名實不符的「與白人一致」的「待遇」，而走上後日南非人民正義之審判的末路？國府當局和在南非「進出」的中國商人、資本家，也應該好好的想一想了。

礦工屍骨寒

朱門尚有酒肉臭

王繼德

近來，先有海山煤礦災變，再有煤山煤礦慘劇，短短幾天之間，一百多名礦工死於非命，俗語說得好：「人命關天」，豈容主管單位再掉以輕心。就在災變後不久，行政院幕僚機構中負責先行審核，研訂國內重大財經政策以供行政院會參考的經建會，在討論台灣地區煤礦發展政策修正方案的委員會會議上，卻出現重要官員因「公」陸續退席的情事，令人有所不解。

●退席去那裏？

重要經建政策的擬訂，竟然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比不上私人性質的「艾森豪基金」獎金得主年會嗎？請告訴我們，到底是為什麼？

不過話說回頭，也許有人認為，這次王章清、張繼正、徐立德的心態也不算是太「特殊」，可能只是想趕去參加「艾森豪基金」獎金得主年會，跟許久不見的會友見面、聊聊天，搞不好還可以聽一聽有「見地」的建議也說不定呀？如果不相信的話，他們還可以舉出，一些在公家機關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們還不是「偶而」在上班時間因「私」開一開黨部的會議也不是沒有，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事實上，這種「見怪不怪」的行徑還真是有些奇怪，身為人民「公僕」的政府官員，吃得「俸祿」是老百姓交的稅，怎麼可以因「私」就「溜班」呢？在上班時間，去開一開私人聯誼性的「年會」或許王、張諸公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面對著從礦坑中挖出來一具具的屍體——交稅的「主人」，卻能置經建會委員會會議於第二順位，這樣的「僕人」也許應該自動辭職了吧！

短評



根據報導，就在經建會委員會會議召開那一天，「艾森豪基金」獎金的歷屆得主，在當天下午四點也舉行年會。而行政院秘書長王章清、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財政部長徐立德碰巧會是「艾森豪基金」獎金得主，因此也是「年會」的會員。

當經建會委員會進行不久，王章清秘書長和張繼正總裁便相繼退席，放下攸關數萬礦工生計和生命安全的台灣地區煤礦發展政策修正方案討論，翩然因「私」另赴他會去也。不久，徐立德部長意圖跟進王、張二公，準備退席。而素有「鐵頭」之稱的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便理直氣壯地要求徐立德留下繼續開會，並指出，徐立德主管的經濟部是委員會會議討論方案的主管部，不應該提早退席。據聯合報指出，趙耀東此舉方使此一重要會議得以繼續進行，不致停擺。

王章清、張繼正、徐立德都是目前行政機關或是國營事業的高級官員，又身兼擬定國家重大財經建設政策的經建會委員，在重大財經政策決策過程中扮演相當的角色，竟然在討論影響重大的台灣地區煤礦發展政策修正方案的委員會會議上，或者先後離席，或者意圖退席未遂，其心目中究竟置礦工同胞的生計與生命於何地？

退一步說，如果說王秘書長、張總裁、徐部長三位「大人」是因「公」另有要事，非得先行離席不可，那倒也還有話說。但是，「艾森豪基金」獎金得主年會從名稱上看來，不過是一個私人的聯誼性組織，卻足以使王、張二位「大人」相繼從經建會委員會會議離去，也使身為台灣地區煤礦發展政策修正方案主管部會首長徐「大人」意圖離席未果，真不知其「魔力」究竟何在？

●憑什麼從經建委員會退席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經建會委員會會議開會期間，是在一般公務人員辦公期間，徐立德既然只有離席之意，而無離席之事實，暫且不論。而張繼正、王章清二氏則是在上班時間內因「私」離開會場，是不是在上班時間內因「私」離開會場，是已經「早退」了呢？如果說，他們沒有請假，前兩年因民選地方首長「不假外出」提彈劾案的監察院見看此情此景，再想想煤礦災變的冤魂，不知道是否有意再「彈劾」一下。就算是他們有請「事假」，身為國家主權擁有者的一份子，有不得不請他們解釋一下。難道說近在眼前海山、煤山二次災變一百多條人命；難道說國家

孫中山先生反對 國民黨的勞基法

本刊編輯部

勞動基準法在資方的強大壓力下，弄得面目全非
國民黨的做法嚴重違反了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就是 反對資本家

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窮人反對富人的反動。

『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家，國內無論甚麼事，都被資本家壟斷。富人無所不為，窮人找飯吃的辦法都沒有；故發明民生主義，為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

『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

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佔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

『民生主義之真義』

●資本家者， 無良心者也

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

『社會革命談』

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工廠，僱了幾千名工人做工，每人每日發給很少的工錢，他們便自誇於眾，說是實行民生主義。：資本家憑藉他的金錢魔力，牢籠許多工人，去替他個人出死力，工人出了許多血汗，只賺得少許工錢。這種工廠的組合，外國話叫做血汗店，真是一點都不錯。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資本家以機械為資本，壟斷利源，工人勞動所生之產，皆為資本家所坐享。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富人的財產過多，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

『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

地主、資本家既占優勝之地位，工人遂處於劣敗之地位矣。法律上又保護資本家與地主之專利，故地主益壟斷其地權，資本家益壟斷其利權；而多數之工人雖盡其勞動之能力，反不能生存於社會。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他們用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權，遇事都是居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法律政治制度不是為資本家而設的？

『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英美各國皆受資本家專制之害，議員亦多為資本家所收買。

『民生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

●罷工是工人抵抗 唯一的武器

工人抵抗唯一的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利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

『民權主義，第三講』

當知世界之一切之產物，莫不為工人血汗所構成；故工人者，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類之功臣，而受強有力者之蹂躪虐待，我人已為不平，況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乎？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為工人咎也。

罷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慘最苦之事也。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工人便有工會，如果受人家的壓迫，

便全體罷工去抵制。……你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向來是怕外國人的，凡是中外發生了交涉，中國人總不敢講話，但是這次沙面的工人抵制他們，因為有堅固的團體，所以遇到外國人發生苛例，便全體罷工，要求列強來取銷。列強因為看見工人有堅固的團體，所以不敢再壓迫，便要同工人講和。由此可見工人要有團體，才可以保護自己。

『農民大聯合』

至余對罷工者之感想，苟彼等之目的為經濟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罷工，其後雖牽涉政治，原始時實為經濟的也……惟凡關於改良勞工情形之運動，余皆贊同之。

『對於勞資問題及社會主義之意見』

余平心思之，資本家所獲甚豐，皆由工人之勞力而來，工人爭其所應得之權利，亦理所當然也。

『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

●制定工人保護法 改良勞工生活

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

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為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

制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北上宣言』

制定工人保護法，以改良勞動者之生活狀況，徐謀勞資間地位之平等。

『中國國民黨改進黨宣言』

工人之價值，即可按照社會生活程度漸次增加，務使生計寬裕，享受平均。

『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我們是「人」，不是「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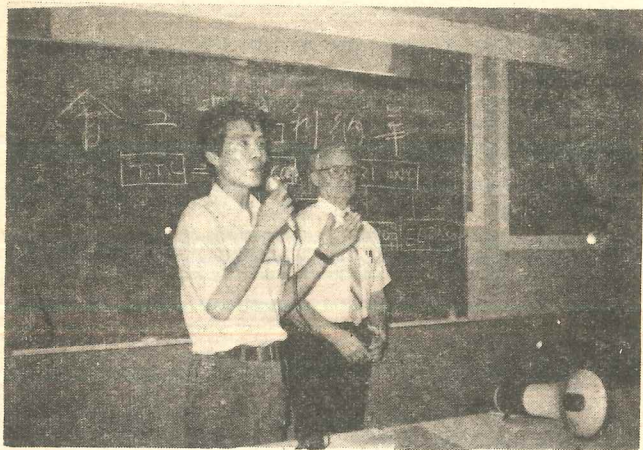
記一件台灣勞工反抗跨國公司壓榨的案例

汪立峽

七月十八日，「勞動基準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前一天，淡水鎮「美商台灣華納利電子公司」的產業工會，邀請若干雜誌與報紙記者，參加他們召開的「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這個大會的目的，是抗議公司當局在轉售股權及資產過程中，忽視勞工的權利和人格尊嚴。

台灣的工會，尤其是以工廠為單位的基層工會，以往從無主動邀請傳播媒介報導工會開會的例子。這一次，華納利工會竟然向資方爭取到容許記者進入廠區的會議室採訪勞資談判的情形實為罕見之舉，或可視為台灣工運在進步中的一種表徵。

當天下午二點鐘，我們三、四個所謂「黨外雜誌」的記者，在工會幹部趙先生的引領下抵達華納利廠房外，首先映入眼



●工會幹部趙光中向公司美籍副總裁質問

簾的是一字排開的致賀花圈，從大門口一直延伸到圍牆尾端，它們是台灣北區各電子工廠的工會送來為華納利工會與資方談判時壯大聲勢用的。各工會和電子器材工業聯合工會，以及台北縣總工會，也都派有重要幹部參加大會，為他們的勞工兄弟撐腰。

在大會開始之前，華納利工會的幾位重要幹部曾向我們簡單說明這次勞資衝突的原因。

●飛歌公司五度易主的怪異歷程

「美商台灣華納利電子公司」的前身即是在台灣與「美商台灣通用電子公司」齊名的「美商台灣飛歌電子公司」。飛歌

公司在台已有十九年的歷史，是在外商投資條例下第一家享受保稅制度的跨國公司。十九年中曾經四易其主，頭二任均屬美國福特集團，第三任是美國喜萬年財團，一九八一年七月間美國ATARI集團購入飛歌公司，惟仍沿用原名。

今年六月一日飛歌當局突然向員工宣佈更名為「華納利」，英文名稱是ATARI。當時工人們就感覺奇怪。但亦不明所以。到七月二日，華納利關係企業遠東區副總裁華爾德又突然召集員工宣稱：華納利已將大部份股權售與予美商「H」公司。又說：改組後，公司名稱依舊，「ATARI」三條槓的商標亦不變。同日，有兩名來自香港自稱代表「H」新股東的華人，向員工宣佈：華納利公司自七月一日起「財務凍結」，往後所有帳目、財務報表需經他們二人簽字始生效力。

這一切看在華納利勞工們的眼裏，直如墜入五里霧中，頓感大勢不妙，因為過去公司有什麼新措施，多由駐台美籍總經理蓋瑞召集員工開會佈達，此次「公司改組」却由遠東區副總裁出面，顯示內情頗不單純。而那兩個港籍華人，擺出一副接收大員的架勢，更讓他們心中惶惑不安。

七月三日，施姓與賀姓二名港籍代表

宣佈工廠暫時停工三天，進行勘察及盤點資財的工作，但對員工未來何去何從，則無一語之透露。此種未定狀態，頗使工人感到焦慮，各種生活及家計的壓力，一起湧上心頭。工會在工人的要求下，於七月四日針對公司的「凍結財務」，宣佈說，逼不得已他們將以「凍結員工」相抗衡。

七月九日早上，工人依照廠方原先的宣佈，回到工廠上班，却在入口處見到公司貼出的一張告示：「盤點尚未完成，請大家勿進入工廠，依下列指定地點集合，由公司當局說明情況」。工會此時認為資方不無欺騙職工之嫌，乃緊急貼出一張通告，聲稱：「截至目前，資方尚未與工會協商，任顧員工權益，任何工作變更皆屬違法。……」並派員持小型喊話器要求員工依例打卡，回原工作崗位待命。但資方人員同時亦擺出「陣勢」，不讓工人接近打卡鐘。雙方數度陷於衝突邊緣。最後，工人仍自行衝入廠房，坐在工作枱旁閒聊或打瞌睡。

●華納利「不良前科」，讓勞工心寒

說起來，工人對資方的不信任，其來

有自。ATARI自買下飛歌以來，即將原先生產電視和音響的生產線，改為生產電視遊樂器。由於當時國內外都無競爭對手，華納利連續二年訂單源源不斷，狀況最好時，每天出口七個大貨櫃，年度營業額高達一億美金。去年三月間，為因應生產之需要，尚增加勞工三百餘人，使全廠工人超過二千人以上。可是好景不常，飛歌公司生產的二六〇〇型電視遊樂器，不久被小型及家用電腦取代。自去年八月開始，飛歌呈現青黃不接現象，乃將三月間增雇的三百餘名勞工，一口氣又予遣散，同時凍結所有人事，包括對外不進新人，對內不予調薪。

到今年二月間，又裁撤二批，共二八一人。當時曾為遣散費問題，勞資雙方頻生衝突。工人對資方未遵守工廠法預告遣散期間，深表不滿。雖然資方最後同意發給十天預告期間工資以作補償，但工人已覺醒到認為資方以錢為一切，絲毫不尊重勞工人格，而深表抗議。

今年六月間，飛歌於更名華納利之後，再度裁撤四十七人，仍然未按規定發給遣散費，導致工會的嚴重對抗。台北縣政府亦在工會一再的陳情下，對華納利行函糾正。起初，公司尚以「並未收到縣府來

文指正，其函僅給予工會」，企圖賴帳，後因經不起工會的壓力，才補發欠資了事。

由於華納利當局有這麼多「不良紀錄」，再加上該公司的工資一向偏低，最早本薪（所謂基本工資）為新台幣四五〇〇元，後調為五〇〇〇元，已維持二年半，迄未調整，招致工人的強烈不滿。其實，這是台灣各電子公司剝削勞工的共同現象，非獨華納利所有（參見附表①）。不過

附表① 台灣各電子公司勞工薪資調查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元

公司名稱	本薪	伙食津貼	交通津貼	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	其他津貼	總計	(伙食、交通津貼)合計
新亞	6,600	1,800	供車	300			8,700	9,284
松下	6,400	600	480	350		800	8,630	8,630
惠東	6,000	625		450	1,500		8,575	8,575
橡樹	6,000		900	1,400			8,300	8,300
世界電工	6,050	500	500	1,200			8,250	8,250
克林登	5,700	供餐	供車	900	500		7,100	8,414
鼎普	4,900	供三餐	供車	500		1,400	6,800	8,114
精密	5,800	供餐	900	500			7,200	7,930
百音	4,620	500	450	600	1,380	300	7,850	7,850
增爾智	6,050	500	500		600	600	7,850	7,850
杜邦	5,700	供餐	750	660			7,110	7,840
華新麗華	5,775	400	360		1,000		7,535	7,535
三桂	4,410	300	400	700		1,600	7,410	7,410
三洋	4,500	1,350	600	300		600	7,350	7,350
飛歌	5,000	550	供車	600		500	6,650	7,234

，華納利當局曾向員工承諾於今年七月份軍公教人員調薪時，彙整各同業間薪資一齊調整，而今，却突然宣佈已轉售給別人經營，頓使工人對這些外商有「能賺則賺，不能賺則脫手」之感（參見附表②），難保將來「口口」不如法泡製。這種情況近年來在台灣已有多起，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商卡林電子公司及美商大力鐘錶公司（天美時）。難怪有一位台北縣總工會的重要幹部在華納利勞資談判現場對記者說：「

附表②

華納利電子公司自開廠以來營業額調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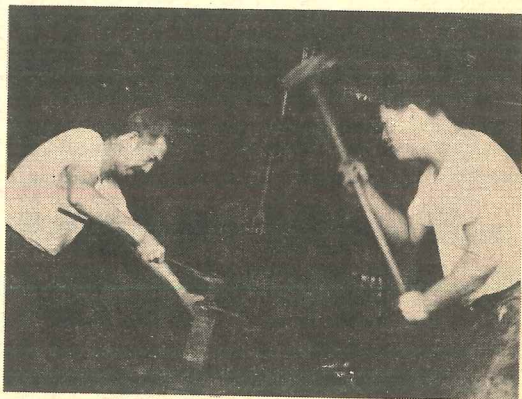
1982年	NT\$ 2,181,000,657
1983年	5,041,886,382
1984年(1~6月)	1,741,357,797
不動產現值	873,960,000
目前每月發放薪資	12,000,000

工人廣場

勞資爭議

何時了

張望



所謂的「調解成立」

根據內政部勞工司的統計，勞資爭議的結果，以去年為例大部份都「調解成立」，未解決的有六十三件，佔百分之五左右。

所謂的「調解成立」是指什麼呢？

內政部四十九年台內勞字第四二二六號令說明：「查協調勞資關係，調處勞

資爭議，為各級勞工行政主管官署重要職掌，勞資爭議案件所涉人數，雖未符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一條之規定仍應予受理。又勞資糾紛依動員勸導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的規定時，在交付評斷前，可依據職掌先予調處。」

「調解成立」所指的部份，便是由各縣市政府以調處方式，在勞資雙方發生爭議時，予以協調。協調的結果也許為勞資雙方同意接受，也許有一方不滿意，而訴諸司法機構解決，但二者都算「調解成立」。

所謂的「評斷」

事實上調處方式實行多年，已發生各種弊病，首先當主管勞工行政機關為爭議案件進行調處時，往往參與的除了勞資雙方外，還包括黨政及治安單位，這些單位可以在調處過程中有實際的影響力，使得原本單純的勞資爭議事件複雜化，也違背了民主憲政的精神，而且這些協調會議上所獲得的結論及過程，並沒有法律上的效力。

而所謂的「評斷」，是根據「動員勸導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所設立的評斷制度。評斷會並沒有專責的工作人員，以台北市勞資評斷委員會為例，其評斷委員包括社會局長、建設局長、警察局長、衛生局長、地方法院指派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指派人、市議會民政審查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市商會理事長、市總工會理事長、要召開一次評斷會議是多麼不容易，也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評斷制度的執行效力呢？雖然規定勞資糾紛當事人任何一方如不服從評

斷會的裁決，經主管官署強制執行，科以罰鍰仍不生效時，可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條例處斷，處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法院往往以違反評斷會的裁決，尚未構成違反或妨害國家總動員法，所以評斷會的裁決，在法律上並無有效依據。

工會無實際作用

在這份內政部勞工司的統計表中，大部份的勞資糾紛都「調解成立」，但這只說明勞資雙方達成的某種協議，這些協議包括司法途徑解決。

而打官司對勞工而言，耗時又費錢的事，多數勞工並不熟悉法律常識，除非萬不得已，他們很少願意主動的訴諸司法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調處及評斷」受人為及法令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公平也不具法律效力，勞資糾紛一旦發生，對勞工毫無保障，也不能迅速有效的處理。

台灣的工會軟弱無力，無法發生實際作用，勞工沒有後盾支援；在勞資糾紛日益增多下，未來的勞資關係的確令人擔憂。

他們簡直把我們當殖民地看待嘛！」

● ATARI 的魔術戲法，賺了就走

七月九日至十八日之間那段期間，華納利的勞工在焦躁懷疑情況下，陸續獲知一些所謂「公司改組」的內情。原來，早在去年四月間，ATARI設在美國加州矽谷的總部，即已着手大量裁員，並傳出要出售工廠的消息。ATARI總部早先曾宣稱：爲了減輕價格及競爭的壓力，決定其跨國企業的生產結構，將裝配廠移往台灣和香港，以利用這兩地較爲廉價的勞工。這項告示也許表露了ATARI起初的「投資意願」，但證之爾後的發展，情勢却急轉直下，華納利自去年八月開始接二連三的裁員不說，ATARI總部復於今年二月間將設於全球各地的工廠悉數售賣給TTL集團，台灣華納利公司即屬其中之一，但公司爲免員工知悉，始終隱瞞此事，甚至連華納利的美籍總經理蓋瑞，也推說直至七月二日，他才知道公司已被轉售。實際上，飛歌獲准改名華納利，是今年五月十六日的事，更名的目的不能不說是與配合公司的售讓契約有關，蓋瑞身爲ATARI

駐台負責人是可能不知情的。華納利勞工對公司不尊重他們選擇雇主的權利，均有受辱之感。

另外有一件事，在被華納利勞工探悉以後甚爲憤怒。美國ATARI集團，在將所屬各跨國公司變賣之後，曾對美國廠、澳洲廠、愛爾蘭廠、玻多黎哥廠、及六月間轉手的香港廠，均發給優厚的勞工遣散費，唯獨台灣廠沒有。華納利勞工認爲這是美商吃定台灣工會軟弱及勞工保障欠週的行徑。

● 工人散發傳單，號召對抗資方

這些因素累積起來，終於導致華納利工人的群起抗議。工會有鑒於此，想和公司好好坐下談談，數次接洽均未果，原公司負責人避不見面，新公司代表又不肯給予任何保證與承諾。事態愈演愈烈，最後只好召開會員大會，訴諸集體力量。

在七月十八日華納利工會召開臨時代表大會的前兩天，工人們在廠內現有的九百餘名勞工間，普遍散發了一份標名「我們的心聲」的傳單。在這份長達二千字的傳單中，他們如此聲稱：

「我們要求舊公司全部資產遣我們以示負責，這是非常合理的。新公司繼續生產，願意留下的留下，不願意留下的有自由選擇雇主的權利，這是最基本的工業民主。如公司強迫我們繼續爲新公司服務，民主何在？人權何在？」

同時在傳單中，他們還嚴厲譴責那些立場曖昧的華籍職員：

「工會決定拿出魄力和公司爭取到底，不料却被所謂的『中國高級知識份子』出賣，幫著公司威脅勞工，利用高壓手段圖謀私利，欺壓善良勞工。……中國一直不能太平，原來漢奸走狗太多！」

傳單還呼籲工人要「徹底底覺悟」，站穩立場，共同支持工會，迫使公司出面談判。他們說：

「這是一個長期的堅持與競賽，而且會有很多阻擾，這是不難想像的。」

最後，傳單要求工人們堅定幾個信念：

「第一，工會談判要靠大家支持，不容少數破壞。第二，這是一個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鬥爭，與主管無關，何況主管已不可信任。第三，不能白白的，眼睜睜的任由外國老爺擺佈，大家要化言語爲行動，堅持到底。」

這份傳單在結尾時的一句話是：

「勞工並非商品，勞工應被尊重」

● 談判的開始——工會展示集體力量

七月十八日下午三時，華納利工會的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正式在廠內的會議廳中開始了。全場擠滿了二百餘名代表、工人、及各地工會的幹部。華納利總經理蓋瑞及遠東區副總裁華爾德，還有TTL派來的那兩位港籍華人代表——施與賀，也都到場了。

主持會議的是華納利工會的常務理事趙光中，他首先向大會宣佈說：

「剛剛我們與新舊公司的負責人，初步談過，他們承認：美國TTL財團已買下台灣華納利公司的全部股權。華納利的英文名稱已由原來的ATARI Inc.變成ATARI CORP.，直屬TTL所有。」

接著，華爾德上台比手劃腳的解釋了一番，無非表示他和蓋瑞都已經被解職了，無權再發表任何有關員工動態的意見。

然後，趙光中就要求TTL的施姓代表上台談判。施並未作任何自我介紹，也不願透露他和賀姓代表的名字。上台劈頭就說：

「TTL與ATARI之間，並非資產轉讓，只是股權轉讓。這一點必須說明在先。」

他這句話是有目的的，因爲這正是整個談判的最後爭議點所在，不過在他剛說出來時，大家還沒意識到這個說法的詭詐性。

此時，一位陳姓女工代表站出來，直盯著施某問：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同樣是公司轉售，爲什麼愛爾蘭、玻多黎哥、香港的ATARI勞工有遣散費，而我們台灣的工人却没有？」

施某以廣東國語回答說：

「他們都是被解雇，而非遣散。」

另一位女工聞言後，站起來大聲說：

「不管怎麼說，反正他們都領了遣散費！」

又一位女工接著發言：

「我們這些勞工，在風風雨雨中，陪著公司度過了三年頭，幫著它賺進大把鈔票，現在業務不景氣了，豈能說走就走。我們不管你們是怎麼轉讓的，新公司對我們的年資與工作必須有所保證。」

施某大約聽出這些話並沒有太大的挑戰性，連聲回答道：

「沒有改變，一切都照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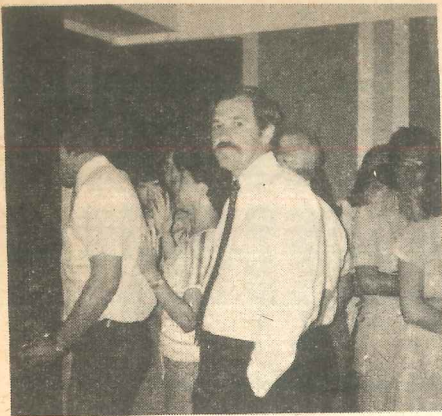
然後，又有一位女工站起來說了許多抱怨資方的話，其中夾雜了一句「我們也曾想以廠爲家……」云云。這句話顯然讓施某聽得很入耳，也不管那女工的真意何在，忙不迭的大聲應道：

「我很高興你說你們以廠爲家。」

但是，馬上另一位男工代表站出來質問說：

「這幾天廠方聲言有工人樂於自願離職，這是一個企圖分化勞工的陰謀，請廠方拿出具體證據來！」

施某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茫然答道：



●華納利美籍總經理蓋瑞也在會場出現

「我沒有這樣說……」

●我們有自由選擇雇主的權利！

此時，有一位勞工似乎不耐煩再跟施某磨洋功，站起來對着台上大聲喊：

「請新公司代表對工會早先所提要求，提出具體而明確的答覆！」

這句話引來全場勞工如雷的掌聲。

施某突然間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站在旁邊始終未發一言的賀某，此時也有點慌了。他們大概沒有料到台灣的工人並不如此聽聞的那麼溫順好欺。兩人趕緊交頭接耳了一陣子，然後仍由施某答道：

「大家放心，各位的年資與福利不但不變，公司還要增加員工，擴大生產。」

然而，工人們並沒有因此就放過他。一位男工走到距離主席台五公尺的地方，站定了，拉高嗓門宣稱：

「我們的要求是：全體工人先由原公司以優厚條件資遣，再由新公司徵詢我們的意願，重新雇用！」

全場勞工跟着喊：「對！」聲震四鄰。

施某與賀某當場被嚇了一跳，待弄清

楚了問題，才似有所恃的答覆說：

「我已說過，本公司只是承購 ATARI 的全部股權，華納利還是華納利，一切沒變，根本不涉及遣散和重新雇用問題。」此語一出，全場嘩然，抗議之聲，此起彼落：

「工人不是資方的固定資產，我們不隨股權的轉移而轉移！」

「我們是『人』，不是『東西』！」

「我們不是商品！」

香港來的代表，此刻顯然已從台灣勞工身上乍然嗅覺到香港工會的氣息，他們幾乎楞住了，半響，施某才恍若了悟的說：

「是『人』的問題？」

於是，在主席趙光中和另一位工會幹部洪裕榮的逼問下，他才修正原先的說法而承認道：

「ETL 向 ATARI 購買了全部股權 (All Shares)，包括全部資產 (All Assets) 在內。」

但是，他仍振振有詞的說：

「公司在台灣經濟部的公司名稱並未更改，僅是股權轉移，所以不必辦理資遣。」

施某的答辯，在台灣的公司法上可能

是站得住腳的，但是仍然有一個很大的漏洞不是公司法所能解決的。這個漏洞被筆者當場指了出來，筆者以記者身份向主席要求發言道：

「請問施先生，你剛剛說 ETL 向 ATARI 購買的全部股權中，包括了全部資產在內，那麼，請問，這全部資產中，有沒有包括『人』在內？」

全場勞工聞言，齊聲高喊：「對！」這一下，把香港代表「將」住了。施某與賀某走到一旁竊竊私語了半天，才站回原地答道：

「這個問題，要由我們的律師來答覆。」

●「人」的解放才是問題核心

當然，他們的律師並不在場，輕易避開了這個令他們難堪而又不自問自明的問題，因為根據台灣現行的有關法律，「人」是不能買賣的，否則契約無效，而且觸犯刑法，可以判刑。此外，依據民法的契約原則，當原公司將股權及資產轉售時，必須先與受雇勞工解除勞動契約，終止雇傭關係，然後依據有關勞工法規，支給勞工

優厚的遣散費。至於新公司基於熟練工人的成本考慮，而欲重新雇用原廠勞工時，自然必須依勞工意願，重訂個別或集體的勞動契約。

據此而言，華納利的工人們要求原公司全部資遣，而後再由新公司雇用的主張，無論就情（人道立場）、理（社會正義）或法（法律規定）而言，都是無懈可擊的。

但是，華納利的新舊老板，就像全世界任何一個資本家一樣，不敢面對這個最後以「人」的解放為核心的問題。

至於官方，在這件事上，自始至終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幾番想阻擾華納利工會領導工人與資方對抗，例如，在這次臨時大會召開之前，主管台北縣境各工會的縣政府突然行文給華納利工會，企圖干涉大會的召開，該函聲稱：

「有關事業單位，勞動條件之變更，貴會如認為不妥，應由理事會研擬改進意見，與事業單位妥為協調辦理，如必要亦得函有關單位予以協處，不宜均以召開臨時大會處理，請查照。」

此函所言，幾將台灣資產階級統治者之工運對策，暴露無遺，甚具代表性，茲分析如下：

①涉及勞動條件變更之勞資衝突，原則上一律規定由工會幹部（理事會）出面與資方「協調」，因為工會理事會是由黨部提名當選的，較有利益之顧慮，便於掌握。

②若工會幹部與資方「協調」中，須要外力支援，亦只准函請「有關單位」予以「協處」，因為所謂「有關單位」，全都是可靠且懂得如何平息工怨的人與機關。

③所有勞資交涉，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協調」，也就是在不生事的情況下把問題消除即可。

④無論如何，工運對策的最高目標就是不准有任何工運的傾向發生，因此要想盡一切方法禁止工人集結，阻止工會會員與工會幹部掛勾，最好是挑撥分化之，讓工人群眾對工會幹部失去信心，此即台北縣府所謂之「不宜均以召開臨時大會處理」也，因為工會的常會定期召開，過於形式，發生不了作用，唯獨臨時召開之臨時大會可予勞工群眾合法集結而發生群體力量之機會。

華納利工會對縣府這紙公文的應付方法是，臨時由大會主席宣佈將「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改為「會員代表座談會」。這

就是台灣工運在高壓政策下求發展的標準模式。

當然，類似的反應模式也可以應用在勞資談判中，資方陷於不利而勞方亦可能因此惹來不易招架的麻煩時，來個「見好就收」。七月十八日的勞資對抗大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收場的。

然而，華納利的工會及工人在這個反抗國際資本主義的空前大會上，所顯示的覺醒與力量，以及難以掩飾的意義，仍是了不起的。

尤其，當大會接近尾聲，在場有少數女工對工會理事會表示不信任時，一位不知名的工人立刻走上主席台，拿起麥克風號召全體會員團結起來支持理事會，警告大家不要在無意間做有利於資方分化的事。他的呼號，換得了全場震耳的掌聲，台上的諸理事也因而信心倍增。

目睹此情此景，我們愕然驚覺台灣的工運真的是進步了！

大會結束後，華納利工會的幹部群，憑藉七月十八日工會所顯示的實力，在往後的數日裏展開與新雇主的談判。但這次談判在失去了勞工群眾立即而明顯的集體壓力之後，竟變得弛緩而艱苦了，而何時再能集結會員展示一次實力，又未可知，

這是迄止本文截稿時（七月廿六日夜），華納利工會最大的苦惱。這個苦惱的癥結仍然在資方堅持的「股權轉讓，不必資道」問題上。

●國際資本主義 橫行四海

為什麼華納利的新舊美籍股東能夠如此有恃無恐的壓迫台灣勞工呢？在本文結束之前，筆者願略作幾點背景說明，以供同道參考。

①美國ATARI 財團當初來台承購飛歌公司，是由於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的引介之功。一九八一年中，喜萬年飛歌公司業績不振，接近倒閉邊緣。趙耀東鑒於飛歌是外商第一家在台保稅工廠，甚不願見死不救，為台灣招徠外資造下不利障礙，乃牽線引薦ATARI 購下飛歌。

②ATARI 集團係美國WARNER 財團龐大關係企業的一支。好萊塢「華納電影公司」即係WARNER 的重要投資之一。ATARI 於今年六月初將飛歌更名為「華納利」，而不名「阿塔利」，其故在此。

③ATARI 以及過去的喜萬年、福特

，經營「飛歌」一向著於技術轉移，故飛歌雖設有技術發展部門，但美國總公司從未將技術完全轉移，致在生產發生問題時，廠內的工程師無法即刻解決；若設計上有任何變更，也需得到美國總公司的核准才行，不僅浪費時間，也將技術部門形同虛設。這種現象實際上普遍存在於台灣的外商投資公司。

④「H-I」方面將接管華納利的經營者，原在美國一家電腦公司「康福懋」任職，半年前離開後，即於四個月前另在香港設立TRIMILL 公司。很多跡象顯示，TRIMILL 就是FETL 為接收台灣華納利，而特別在香港設立的。

⑤FETL 以二億四千萬美元購下台灣華納利公司，其中七千五百萬美元給付現金，其餘則以股票付息方式償付。

⑥那兩位不肯透露名字的FETL 香港代表，據可靠消息，很可能就是新華納利的主要股東之一，甚至是香港TRIMILL 的要角。施某有可能出任華納利駐台總經理，而那位賀某亦係未來廠中要人。

⑦FETL 的總資本額，最少在十三億美金以上，是一家有名的電腦、電報公司，且以專肆收購經營不善的電子廠，整頓後再予轉售，而聞名於世。

●工運的浪潮遲早會沖垮 資本家的狂妄與貪婪！

根據以上數點背景資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追究下面兩個問題：

①FETL 與ATARI 的成交契約，走公司法上的股權轉移方式，保留「華納利」中英文名稱，而且商標不變，其目的恐不單純是為逃避一百五十萬美金的員工遣費。商標的國際利益，以及與WARNER 財團之間的微妙關係，也許才是要點所在。此外，華納利甫經台灣經濟部核准的名稱保持不變，亦可能係便於華納利原屬公司ATARI 逃避整廠脫售的稅課。

②FETL、ATARI、WARNER 之外，還涉及一個香港的TRIMILL，以及兩個香港人，其間的奧妙關係，難免不與香港九七大限將屆，港商開始在台灣覓求投資灘頭堡有關。

但不管這些國際資本家在搞什麼鬼，台灣的勞工被壓榨、被欺騙、被出賣，總是事實。從華納利勞工不甘雌伏，起而反抗的例子，我們可以樂觀的展望，自今而後，台灣的工運勢將日漸茁壯，遲早有一天工運的浪潮會淹沒資本家的狂妄與貪婪！

勞動基準法

座談會

本刊編輯部

時間：七月十五日下午二時

地點：北市年輪茶藝館

出席：張曉春（台大社會系教授）

翟海源（中研院民族所）

徐正光（中研院民族所）

汪立峽（座談會主持人）

列席：柯水源、陳秀賢、尉哲明

汪：勞動基準法於立院已接近尾聲，這個法律是不是對勞工的權益會有改善？改善到什麼程度？以及它在整個台灣社會發展上的意義，勞工問題是不是因此就得到了解決？「夏潮」辦這次座談會的用意，是把勞動基準法當作台灣社會發展的里程碑來看待，特邀學者專家，就此討論。

瞿：對勞基法我不曾花時間作深入了解，大致說一下我的基本看法，作拋磚引玉之用。目前勞資關係，我覺得有二因素須考慮，①政治的主導力量在大陸時期及到台灣之後很明顯的並不允許勞工方面有自主、積極的參與精神，而是多多少少比較偏向資方，這個傳統影響相當久遠，②台灣本身經濟

方面的發展，勞工雖常常被視為有很大的功勞，但多半是場面的交代話，很少真心認為勞工在整個經濟發展上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勞，反而強調所謂獎勵投資條例，外資或其他政策上的成功，很少聽到說勞工本身的貢獻真的有那么大。

台灣六〇年代經濟的起飛主要靠勞



●張曉春（左）汪立峽（右）

力密集工業，勞工最重要，女工是其中一大部份，但在整個發展過程，都不太重視勞工。為什麼？除了政治主導力量本身不很重視勞工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大陸慘痛經驗之後，到台灣在政府運作下各階層在基本生活上保持相當的水準，不會餓死，不會有強

烈的被剝削感，使大部分勞工本身不會主動去爭取權益，使爲勞工爭取權益的做法，不論是運動或非運動型的方式，都不容易產生。基本上，也由於政治主導力量不允許產生。

這牽涉到第三個因素，即中國人「和爲貴」的心理。曾經有人在香港做調查。香港工人跟台灣情況當然不盡相同，但多少有相通之處。中國工人多半傾向與資方維持和諧的關係，在維持和諧的條件之下，勞方多多少少願意讓步，尤其技術階層，他們待遇好，本身介於資方與勞方之間，較願維持資方的和諧，所以在香港那樣一個允許工運及談判的地方，發現勞工不會太主動去爭取，我想這是中國人講究和諧。還有老式父權的形象，視老闆可依靠，高高在上，尤其是在中小企業，老闆常兼師父，所以勞工不會



瞿海源

一直去爭取什麼。再者想談的是，退休金的問題，資方不願出，勞方非要不可，折衷辦法是弄個基金，這個辦法特殊而荒謬，應該是資方來負責任的部份，到最後却轉嫁給社會大眾來負責，就像捐款，礦災後的捐款很令人感動，實際上是轉嫁的做法。沒有良好的應變系統，臨時再來激發大家的同情心，等於把負擔轉嫁到老百姓身上，這可一、可二，不可再三，畢竟不是正規的作法。第三點是範圍問題，從大的原則來看，有的教授也說，我們教授也是勞工啊！說實在話，仔細推敲確有道理。範圍縮小的話，可能並不妥當，尤其是一些文化事業、服務業都被劃在勞基法的適用範圍之外。最後一點，我懷疑法律訂出來以後到底有沒有效，假如在前面三個大因素的影響之下，法律的執行到底有沒有效？我們以前不是沒有這些相關的勞工法律，可是實行的很糟，就以童工來說就很清楚，往往立法從嚴，執法從寬，至於法律的訂定，在某個方面來說，象徵的意義大過於實質的意義。對勞動基準法基本上我有一個這樣的感受，怎麼樣使整體的法律制訂過程考慮到實際的執行狀況，

在事後又以一個怎樣嚴密的方式來執行，是極重要的。中國人法律訂在那兒，做的又是另一套，有關官員連法律都搞不清楚，所以在執行上很難有實質的改進。

汪：瞿先生似乎對勞基法不太樂觀，勞工法一貫是執行從寬，如今立法也從寬了。

工會像闖掉的公雞

張：瞿教授認爲過去的勞工法律對資方較偏袒，我有點補充。也許因爲一九四九年以後，台灣圖生存，極力發展工業，我用個名詞來說是「工業發展獨尊政策」。剛才汪先生提到資方揚言勞方假如一讀通過要翻案的話，資方要反擊，要把退休金從四十五個基數再降下來。資方有位立法委員的話最可見其心態，他說，假如退休金不降，中小企業的投資意願會降低。過去碰到勞工問題，不管黨政、資方民意代表、資方，他們唯一的法寶就是說如果照顧勞工過份的話，一定會減少投資意願，在此法寶下，要得法律行不通。還有，剛剛瞿先生說的勞資和諧，我有個補充，就是和諧必須有

條件，片面犧牲來要求和諧是沒有道理的，要在對等的條件下來處理和諧的問題。過去三十年，等於沒有勞工政策，這種情形下，怎麼和諧起來？所以我常覺得，勞資關係要和諧，一定雙方處在對等的地方，否則不能和諧，片面造成的結果，一定問題很多。另外不是沒有工會，但是很奇特的怪胎，我叫它爲闖掉的公雞，該啼的時候不啼，不但不能生小雞，連啼都不能啼，這樣的工會有何用？據工人說，收會費的時候，他知道有工會，碰到事情的時候，他就不知道工會在哪兒了？這十年來，四次大礦災——永安煤礦、內湖湖田、海山、煤山。

由地方基層工會，到省級的礦業聯合工會，台灣省總工會，沒有放個屁，連啼一聲都沒有！這是很奇怪的，按照工會法它應該發揮功能，而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護勞工權益工會設在辦公廳，煤礦工會的基層工會的常務理事，都是煤礦中高級職員，完全是御用工會。

高水準的政權運作魔術

徐：談資方時，得看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大型企業能透過官方或政治

徐：講到工會徒具形式，牽涉到政體的運作方式。像台灣這樣的政體在其他國家非常多，主要是把工會力量透過形式的管道逐漸消弭掉，這樣的話，一方面工人沒辦法利用工會的力量做些運動或集體性的申訴，政府比較容易透過正式的管道加以運用，比方這次爲勞基法的問題，汽車工會想做些事，工會的人或工人去找謝深山，而謝把他們擋在外面，政治的運作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控制工會，讓工人沒有辦法發生任何力量，這是所謂高水準的政權運作的方式。

張：勞基法在審查過程當中，台灣省省工會前後去了三、四批，後來第四批要去，有關單位下令不能再去，同時立法院也不再准他們進去旁聽，怕勞工旁聽給立委造成心理壓力。因爲在討論土木技師問題的時候，建築師之流到立法院會議抗議，把法案做了很大的改變，允許他們如此，却不允許勞工有同樣的行動，這就是所謂高級政治運作的一種魔術。

管道來影響立法，或立法的執行，對勞工的爭議，它也較有把握，中小企業的資源沒那麼多，在討論勞資關係時不能把擁有很多資源的大企業和中小企業放在一起，我想他們對勞工的態度或採行的政策不太一樣，大資本家對勞基法可能反對的沒那麼厲害，因付得起薪水做些政策性的保護，故比較無所謂，對競爭性的、常危機四伏的中小企業來說，我想是對勞基法非常關心的一群資方，所以在討論勞資關係時，得把他們分開。

大資本家反對

中小企業緊張

張：據我所了解，到底多少資本算中小企業，沒有明白確定，但我發現這幾年來，發生勞資糾紛的很多都是大企業。據我了解中小企業對勞基法所感受到的威脅沒有大資本家大，他們可能還在農業社會家族式的生產型態，雇用的勞工少，他跟勞工之間的關係主要用感情維繫，所以鬧糾紛的時候較容易解決，大企業中常鬧勞資糾紛，如王永慶企業及華隆等外資工廠。對勞基法恐懼，反對聲音較大的反而是



●徐正光

大資本家。

徐：這點是可肯定的，能不讓法律通過，對他們是最好的。工人爭議事件可由許多方面來處理，大工廠、大企業對工人的行為操縱、控制可能與中小企業不同，而之所以發生在大企業裏，除了你剛才說的那些因素以外，也許他們的勞工的組織性讓他們可以發生那種力量，另外大企業的勞工的素質如何？他的想法可能會影響他們發生這樣的事情，而小型企業就不一樣。張：我認為中小企業要健全的發展，如果無力負擔，不能發展的話，我寧願它關門，這才是經濟發展健康的途徑。

徐：目前經濟的動力，大資本家非常的重要，但中小企業也是很重要的部門。在一份雜誌上看到說：為什麼黨外的立委在勞基法審查的過程裏一直沒有參與，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他們不管在心態上或競選資金的來源都在中小企業。

汪：實際上，中小企業在台灣占九十五百分比以上，在勞基法審議過程中變緊張的，因為他們實際上受到的保障不大，比如在融資方面或經濟政策上，常常是犧牲者。過去之所以能生存就

是靠廉價勞工，還可以投投機，勞基

法訂立後他們很緊張，但我們時常聽到的聲音是來自大資本家。四、五年前工商時報第一次辦勞基法座談會時，王永慶當場翻臉表示對此法案的不滿，很明顯的看出大資本家在反對。在立法院整個審議過程中，給資方代表壓力的也是全國工商協進會及工業、商業團體，也就是說都反對。張教授說讓中小企業淘汰，這可能不可能呢？那麼大批工人又怎麼辦？

●中小企業貸款 回扣至少百分之十

張：依法來辦啊！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按員工福利基金條例，在創業時一定要提出一些資本作福利基金，台灣從王永慶以下無人如此。如果主管商業工廠機構按照法律規定，資金未準備好即不准他開工，很多公司、工廠就開不起來。倒的倒了，新的也不可能起來。汪先生談融資的途徑，中小企業要貸一塊錢難如登天，而大企業要貸幾千萬、上億却易如反掌。目前中小企業貸款，回扣至少百分之十，可是王永慶貸款根本沒辦法拿他

回扣。

汪：海山煤礦，老板要貸款，上級馬上命令土地銀行貸款支援。

張：海山煤礦老闆也投一部分資本於煤山煤礦。

汪：有個問題請教張教授，勞動基準法實施後，中小企業在資金上發生困難，比如像資遣費和退休金，優於抵押權對中小企業來說就成很大的壓力，很可能垮掉一些，大企業也在工業升級轉型期更換新機器，工人被解僱，如果發生此狀況，該怎麼辦？

瞿：我們常說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現在是立法也從寬，理想上，這是不對的，但這可能也是台灣社會調適的方式，假如真的立法從嚴，執法又從嚴，就一場糊塗，執法從寬的話，情形不會那麼嚴重。假如像張教授說，不合標準、不合法律就關門，第一個面臨最大問題的不是生產勞工，這次將大眾傳播事業也放進去，很多雜誌都會關門。如果真的執法從嚴，很多中小企業都會吃不消，但我預測不會發生，他們可能私下協調解決了。

張：我想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觀念，就是勞工發生問題，就影響到全社會，我們

都該有這個共同的認識。如果立法委員們能有勞基法是全民的觀念，今天也就沒有爭執的餘地了。

徐：這個觀念是可以接受的，但一種觀念之能否被接受必須先分析社會結構及各階級利益的結合。舉個例子，關於優生法問題一些婦女表現了她們的態度，但是為什麼她們沒想到在勞動基準法裏有一半以上的勞工是婦女呢？這就是涉及到這些婦女屬於那一階層。討論勞工問題，得放在整個台灣的發展階段來看。我想不能讓中小企業不行就關門。台灣的大資本家，還沒有辦法獨立的在國際上競爭，還得靠這批人，所以今天勞基法問題重重，就因為台灣經濟還在一個轉型期，大

資本家、中小企業的利益都得維護。

張：你的看法我同意，但如勞基法實施後，中小企業不能生存，我寧願讓它垮掉，這有兩個原因，①大企業靠小企業為衛星工廠來支持，現在小工廠宰割由人，我以為置之死地而後生，如果搞不下去，當道者可以好好的反省，使得資本家不要那麼窮凶惡極。過去二、三年，經濟不景氣，很多是被大貿易商、大企業逼死，所以我寧可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不要拖累了幾十萬的勞工。我跟你的看法基本上沒有出入。

●資方沒有社會責任觀念

瞿：法律本身應有前瞻性，對整個社會經濟有衝擊。不能做到一定的條件就關掉或處罰，所以就非變不可，變是痛苦的，但使經濟能突破。

張：韓國推動勞基法已十幾年了，經濟發展超過台灣，很多人總以為勞基法會影響投資意願，以韓國為例，當然我們有特殊原因韓國跟我們不同，但

不能夠做為理由。

徐：恐怕不能夠拿韓國來做例子，韓國是由國家來培養大的商社、企業群體的方式，跟台灣比較保守、中庸的方式不同，台灣強調工業升級，而勞基法就是促進升級的好路子，但勞基法過程相當複雜，執政者沒有信心能做得好，故一直在委屈求全。

張：對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韓國經濟發展是加工廠的方式，但以前的情形可能比台灣更糟，八個十個工人的工廠更多，這樣而能發展出大的工廠，就很微妙，他們的發展型態固然由國家來培養大企業家，但我們也培養了三十年，裕隆一開始即培養，台塑也是尹仲容用各種優越條件培養出的，如說勞動基準法是當道者在委屈求全，我不大同意。可以說完全是在資方壓力之下屈服的。

勞基法草案比55年前的工商法看不出進步，55年前可以存在的法律，現在還那麼難產，實在很奇怪。其實韓國的小企業可能不比台灣少，韓國是小工廠能存在即存在，不能存在決不掏腰包。「新光」快倒時是陳誠下令向台灣銀行貸的款，利息不收，債不討

，遠東企業，也如此，企業都在這情形下搞起來的，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如果由國家培養、栽培的角度來看的話，可能超過韓國而無不及。當然台灣複雜，有許多特殊的原因造成壓力，變成資方有恃無恐。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資方沒有國家觀念、沒社會責任觀念，否則一個55年前可以存在的法律，而現在却那麼難產，實在想不通。

●勞資糾紛應廣為報導

汪：勞基法，不能拖延其原因，勞資糾紛增加，勞工不滿增強，他們又無法經由工會或工運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只好寄望政府為他們立法。再加上經濟發展到了必須要工業升級的階段，所以加速通過這個法律。勞工人數增加，勞工智識增高，會不會發生一些影響？

張：假如有權力及有錢的資本家沒有認識的話，問題就很嚴重。勞工普遍教育程度提高，他們愈來愈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如果勞基法或有關的勞工法

實施不好的話，以後的勞資糾紛絕對不是因勞動基準法，而是勞工教育程度提高，對應享的權益更清楚，就會去爭，這趨勢會愈來愈明顯。第二個就是勞工的性別結構會發生變化，國外爭取勞工權益較積極的是男工，因為男的要負擔家計，目前我們有四百多萬勞工，三分之二是女工，如果將來男工愈來愈多，情況會有很大的變化。過去企業家三十年來不守法，犯勞基法恐懼症的原因是此法實施後，非守法不可。所有勞資糾紛幾乎沒有一件不是錯在資方，所以勞工人數增加，教育程度提高，而且男工增多，未來情況會有變化。

瞿：根據省社會處的勞工生活調查，官方調查不見得可靠，但可供參考看出來，當然知識程度越高會比較強調爭取權益。台灣勞工教育程度高的不多，比例仍低，近年來勞資糾紛增多。跟勞工教育程度的提高（例如從國中到高中）是否有關，我懷疑。

張：勞工年齡普遍愈來愈年輕，加上大眾傳播的影響，使他們較懂得爭取，而五、六十歲的老工人快面臨退休，沒有什麼好爭的，除非到了退休時，

退休金被吃掉了，或不按法律解決，才會去爭。彰化有六個工人從日本時代開汽車開到去年退休，才拿到三、五萬塊錢，太不合理，才鬧出。碰到跟自己切身利害時，一定發生問題。

瞿：台灣工人要跟自已密切相關，才鬧出來。

汪：張教授強調勞工生活經驗及教育程度，但就外國勞工運動經驗，勞工本身很難了解自己受壓迫的真象，雖然可能有個別的勞資糾紛，但很難形成有意識、自覺的集體力量。

徐：性別也好，智識的程度也好，假如沒有外在環境的配合，我想發生的作用不大。

常只有少數人知道某處發生勞資糾紛，而沒有在報紙電視報出來，讓勞工知道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幾乎只是孤立的，沒有大眾普遍化。

張：我想是報導還不夠，還應將勞資糾紛最後結果是什麼公諸於世，勞工打官司，應將判決要點報導出，使勞工知道總有贏的一天，又使他們知道有哪些途徑，哪些勞工法對他們有利。

汪：台灣工人一直抬不了頭，一直被壓制。

瞿：不是被壓制而已，而是很微妙的被系統的歪曲。工廠壓壓壓，過了半年出去玩一趟，就沒事了。所以不會有自覺的意識、強力的去爭取，維持稍微好一點的生存，就覺得滿意了。

徐：瞿先生所提的勞工希望和諧相處及視老闆為父長，都是在大環境下培養出來的東西，如果環境有變，或稍微改變，這些都能去掉。

張：我的看法是有意做出來的。

徐：所謂意識的形成，都是在一種衝突，長遠的奮鬥過程中形成出來的，當然它有客觀條件的結合，但台灣也許具備一些客觀條件，工廠也累積了很多，但沒有讓意識發展出來的情境。比如人口多、性別比例也在變，知識程度高。條件都具備，如有工人教育程度高，有他的不滿，一直埋於心中，一旦碰到私利就表現出來，外在環境不能使他們因別人的不滿而結合起來，可能剛開始想到，人家就把你打掉了，已經有人採取行動對付你。張：工會組織不起來，而且現有的工會發揮不了作用，造成個別勞工碰到個別問題，就自行找途徑解決，我不強調他們會不會產生自覺意識；我強調任

何人都不利用勞工，勞工是全民的問題，任何黨派、團體，不可用勞工來當政治籌碼，否則勞工問題愈搞愈複雜。

瞿：只要有一個勢力存在，總是有人要去用。

勞基法目前所謂立法從寬，不理想，也是勞工本身力量發展不成形所造成的！現在立法是利益團體在爭，現在勞方力量小，勞方立委也少，勞工也不了解，勞基法是什麼？自然資方佔優勢。

●勞基法聞不出

三民主義味道

張：勞基法這個草案不該叫勞動基準法，因為在美國、日本、韓國的勞基法，在開頭就有一句話，「勞基法內所規定的條件都是最低條件！適用此法之廠工作條件，待遇比勞基法高的話，不得因勞基法實施而降低，但我們無此二點，所以我不把它當勞基法。廿一條規定基本工資由主管機關擬定，行政院批准，很顯然違背憲法一〇八

條，將非法律合法化，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基本工資暫行辦法，而這個辦法是違背憲法的一個行政命令，憲法一〇八條第二項的第十五款明白規定，勞動法以及其他社會立法，根據第一項，應該由中央制定，並執行之。工資是勞動法中明文所載。基本工資暫行辦法是引起勞資糾紛的一個根源，因為基本工資所立定的契約六千一百五十元，可是台灣省、台北市任何一個勞工的工資包括一切在內，一定超過六千一百五十元，這樣的工資暫行辦法，我用八個字形容，「保護勞工不足，圖利資方有餘」，實際工資已超過基本工資，這個辦法幹嘛存在。勞基法，為什麼那麼難產就是利益團體的壓力。現在勞基法是二十多年前勞動法的第二章，而二十年前的勞動法第二章比現在的勞基法要好幾倍，當初為什麼那麼好，現在卻一再而再而三的難產，內政部一再有壓力下來，我比喻為坐滑梯，每滑一次就落一次。適用範圍，現在放寬到大眾傳播、農漁牧。據我了解，我們沒有公務人員服務法，日、韓都有公務人員任用法

還有其他服務法，日本有教師法！其他都塞入勞基法中，台灣與他們比，真是差一大截。我們公務人員，無公務人員法保障，教師也無教師法。在歐洲，都算勞工，就是自己經營或自己僱用自己者除外，跟外國比起來，我們試用範圍比人窄。其他如礦災，日本規定喪葬補助費，資方得支付一千個工作天。勞工死掉，可拿分期的補償費，拿八成薪到配偶死掉，小孩十八歲，很人道，我們都沒有。勞基法實在聞不出三民主義的味道。經濟發展應包括農林漁牧，而三十年來，台灣的工業，已將農林漁牧弄得很慘。五年前到現在經過一次大戰，又有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很多法律觀念都發生變化，五五年後，人家外國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發展，但我們連五五年前的東西都容納不了。原因就在：我們強調經濟發展，資方的法寶就是勞資法訂太好的話會減少投資意願，這情形下，什麼事不能幹？

●資方以影響投資意願為威脅手段

徐：勞基法和中小企業投資意願的問題，我想是其影響是程度上的問題，對台灣整個經濟發展的利弊如何，是得考慮的，是不是將可以靠勞工吃飯的中小企業提到另一個階段呢？假定勞基法不致太影響到投資意願，而又能促使中小企業提到另一種發展方向。如果能達到這些目的，我想勞基法是件好事。

張：大小小工廠能拖延就拖延，係運籌談工業界級談了四年、五年，升到哪級？趙耀東也不知道，三、四年都打爛仗，最近吹牛要發展資訊工業，他們沒政策，只是由民間的幾個發展出來，他見一定會賺錢，順水推舟，願意洽融資，新竹科學園區，給優厚的條件。

汪：台灣企業的投資意願跟政治很有關係，因工業要升級，要成為技術密集工業必須要有長程規劃，投資一定是長期的，資本家在投資時一定會考慮到台灣未來的政治情勢，擔心得不償失。這是關鍵所在。

張：很多大企業，在外國設公司，如在國外賣出一百萬美金，LC開八十萬，永遠留一部分在國外。中小企業沒辦法這麼做。

汪：勞基法拖了二十多年，還是開倒車，勞基法對投資意願會有影響？或者是資方的藉口？

張：當然是資方的藉口。首先要由政治體系的性質看來，韓國實行了十幾年，工業也沒有倒退。我們的工業已經面臨到何去何從的階段，如果實行勞基法會減少投資意願工業發展不起來，那韓國應該比實行勞基法以前更糟，但並沒如此，反而情況更好。所以勞基法的產生應該有助於工業升級。現在有權力跟有錢的人，應該把眼光放寬。

汪：投資意願的說法可以說是資方的一種威脅手段，但經濟部、經建會真的很在意。

張：經濟部、經建會在意的是王永慶之流，中小企業死了都沒關係，他們貸款可能貸得到嗎？還得拿東西去抵押，能吃掉銀行黑帳的是小公司還是大公司？經建會不知道中小企業現在需要錢、技術、需要政府替他們拓展外銷，政府那點做到了，離開資料看，倒了銀行的，絕對不是中小企業。

瞿：我想這是個社會結構的問題，中小企業講求短期的利益，很多工廠做一批生意，垮了，再做另一批生意，本身

不是有規劃的企業，在這狀況下，很可能會影響投資意願。勞基法強調長期的正常經營，他們做不到，另外我們的儲蓄意願很高，去年至少百分之廿五，資金不是沒有累積，但政府、銀行本身對資金的運用不夠積極，錢在那兒，中小企業卻要不到錢，各種抵押還不夠，他們覺得錢出去了回不來很麻煩，願意貸給大企業、暴發戶，利潤很高，沒有長期的協助企業發展投資的傾向。所以銀行有資金，沒辦法貸出。使中小企業經營不易，當然不願受勞基法約束，去大量投資。因此金融機構和政府企業必須信任企業。另外又必須好的規範讓企業去遵從貸款方式。還有很多企業大賺錢，會計制度也成了問題，工廠有兩套帳本，賺了錢用逃稅的方法，或者轉移到國外，或者轉移到別的事業上，煤礦最清楚，轉移到建築業上，我的看法是，台灣的企業界，及整體資源，並不缺乏，而是漏掉了。

●資方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跑

汪：勞基法在審議過程中，資方有恃無恐，意味著什麼？

張：資方有恃無恐，主要因他們有很大政治影響力，並以投資意願作威脅的手段，足見我們的勞基法不是三民主義的。而工會又是聞雞，沒有制衡力量。

徐：近十幾年來，資方已經能用自己的力量來影響政府的決策，他們的關係已經不像二十年前，因此政府的勢力能夠操縱資本家。

張：我想不是控制的問題，而是黨政結構本身發生了變化。

瞿：國民黨中常會裏有林挺生，辜振甫等大資本家，但沒有勞工。

徐：國民黨有歷史的包袱，退到台灣來以後，對那些反對勢力，有種恐懼感，所以積極的想要控制，現在的性格已經變了，經濟力量會影響到它的決策，它不得不變，要變一定要跟很強的勢力結合，很有些內在的矛盾衝突。尉：勞方軟弱無力，所以資方更有恃無恐，迫使執政者讓步。這跟台灣經濟發展政策有關係。例如：它發展什麼樣

●資方運用力量影響決策

張：台灣企業家沒眼光沒有整套規劃，都是打爛仗，打游擊戰的做法。資方常說台灣的勞工不敬業不樂業，說勞動效率太低，這樣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跑，可是資方不守法，該放假的星期天不放假。女工跟我說到了星期五他們就擔心，怕星期天這個假期會銷掉。因此工作情緒大受影響。所以勞基法實施後，有可能提高生產效率。

的經濟型態，培養那些人，壓制那種力量的成長。今天工會受到有力的控制，勞方自然軟弱無力。資方則可透過高階層的政治勢力，來影響勞基法的制定。

瞿：林挺生、辜振甫在中常會都為資方說話。

●黨外立委代表中產階級

汪：請各位談談黨外立委的角色問題。

張：不論黨內，黨外的立委都該關心勞工問題。尤其台灣地區選出的立委特別有責任。去年競選時，黨內外立委異口同聲要為勞工爭取權益，可是在勞基法審查時，有幾人為勞工說過話？不可以票拿到手了，勞工利用完了，就過河拆橋！

徐：談黨外立委的角色是有意義的。他們票源在那裏？他們的出身背景及所接受的價值系統訓練，是傾向那一方面？是值得探究的。

瞿：目前台灣的增額立委多半是中產階級的想法，甚至有些是代表資方的。黨外立委的意識是中產階級的，表面上

他們必須說說保護勞工權益的話，但實際上，不見得，只因勞工多，保護勞工成了一種流行的說詞。

汪：勞基法草案擬甚久，在這段期間，黨外立委無所作為。原因是黨外立委不明瞭，勞基法在社會發展上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立法院很多法案我都得分配時間去關心。我認為所以如此有二：一是角色混淆，他們是黨外，政見會聽眾中有不少勞工，為爭取區域立委的游離選票，所以會談勞工問題。再者，這一兩年來年輕的黨外黨工為他們搞宣傳，寫演講稿，因此他們會談，但那並非其本身關心勞工。還有就是，黨外立委的支持者，主要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如青商會、獅子會等白領階級。在一讀時，他們若對勞基法發言過多，會得罪支持者。事實上，他們還沒發言，青商會已私下要求他們不能講話。第二，黨外立委不明瞭勞基法的性質。有些黨外立委是律師，但他們自己承認在他們法學教育中沒有勞工法律這一門。自然他們無法瞭解勞基法的意義。所以碰到勞基法無從著手。

張：我不同意汪先生的說法。瞭不瞭解勞

工法律跟大學中有沒有受勞工法律的教育無關。這主要是立場問題。只看有沒有心要關注勞工。只要有心，就會研究、找資料。我不是學法律的，但勞基法我也談。最主要是有心無心的問題。

汪：勞基法的適用範圍為何不及於金融業、服務業、不動產、商業？

●罰則過輕

勞基法效用堪慮

張：國泰集團的蔡辰洲及新光集團的洪文棟為什麼要當立委？還不是美國式、日本式的利用政治鞏固財團的利益。

汪：內政部在草擬勞基法時，已邀資方、勞方及黨政方面的代表一再磋商。

張：勞基法適用範圍是資方壓力來一次，就修改一次。

汪：適用範圍之所以不及於商業、金融業、服務業，是因資方立委的票源有許多來自他們控制的員工，如商業、金融業等列入勞基法適用範圍，那麼工資、資遣費、退休金都是須考慮的問題。票源、成本，這兩項是他們最要顧慮的，因此不願讓自己的事業納

入勞基法的適用範圍。

張：資方的心態很簡單，他們不願付錢。國泰都想把華僑銀行吃進去了，他還不能影響勞基法嗎？

尉：商業、金融業因掌握龐大的經濟實力，所以有足夠的力量使金融業、商業不列入適用範圍。而服務業員工有相當多數，如列入，在政治上會發生問題。

徐：歸結起來就是說如要把商業、金融業、服務業等納進勞基法適用範圍，則反對勢力太大；再者，執政者不願列為勞工身份人數增多，以免勢力膨大。

張：最主要的是來自資方的壓力。資方不願成本增加。

尉：但是，如果服務業等被納入適用範圍，在勞基法中其權益得到法律的保障，一旦沒辦法確實保障時，問題就出來了。

汪：公司行號職員過去不認為自己是勞工，可是一旦在勞基法中被列為勞工，他就會以勞工自居。

張：權益被侵犯，他們就會去爭。

瞿：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資方壓力，一是政治理由。服務業很廣，太複雜

，弄不出來就算了。

汪：現在談談罰則問題。

尉：這是勞、資雙方爭論的焦點。

張：勞方立委受到壓力，已被壓扁了。我認為懲罰應從嚴。法律是要對付不守法的人，守法的人還怕什麼？

瞿：剛才已經談到資方較有力量，當然不願訂立嚴法來罰自己。所以資方堅持頂多罰款，可以為所欲為。勞方沒力量，只有退。

尉：如果罰則上沒有徒刑，就不具威嚇作用，勞基法豈非形同具文？

張：對，罰金沒什麼用。

汪：台灣勞工只有形式的工會，沒有實質

的力量。因此，更寄望國家的公法來保障他們的權益。政府也知道勞資糾紛不斷，需要有個法律來處理。勞基法是強制性的法律，所規定的不是勞、資雙方的關係，而是國家跟資方的關係。國家要資方服從法律，法律的力量就在罰則。如罰則過輕只是罰款，資方不怕，他們怕的是坐牢。罰則過輕，法律的監督效用就沒有了。

張：勞基法是公法，與刑法同性質，對違法的資方須重罰，否則貽害甚大。例如，礦災之所以發生常因資方不負責任，安全檢查沒做，危害多條人命。這不用重罰不行。法律若沒有嚇阻作用就沒用。

「我的學徒生活」

鄭學稼／著

劃撥帳號五八〇一帕米爾書店

訂價：七〇元

郵購優待價：55元掛號另加郵費6元

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施行「全球的經營戰略」，把全世界當作市場，加以規劃經營，並與其本國政府合力，運用經濟、政治勢力在全球各地進行經濟掠奪，榨取更多的壟斷利潤。

本刊資料室

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高度壟斷發展的產物，十九世紀末期，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已開始出現，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或日本滿鐵公司，都是名著一時，略具雛形的跨國公司，但以當時的規模和經營方式而言，尚且保存著樸素的資本主義色彩，較之今日的跨國公司，實不可同日而語，也就是說，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交通運輸工具及電子通訊設備日益發達，在這樣的條件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中，形成了權力高度集中，管理靈活機動，如身指臂的跨國公司。這種跨國公司施行「全球的經營戰略」，把全世界當作市場，加以規劃經營，並與其本國政

府合力，運用經濟、政治勢力在全球各地進行經濟掠奪，榨取更多的壟斷利潤。近年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也步上後塵，打著「援助」、「支持」的旗號，在其它國家中，大搞聯合企業的手腕，實質上就是「跨國公司」的翻版。

簡而言之，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即是一種國際性的壟斷組織，（又譯為「多國公司」）；日本稱為「多國籍企業」，在現代人的生活

中，由於其禍害不易被察覺，甚而，或因其禍害裹上一層美麗的糖衣，使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工業和經濟日受蝕害而不自覺，這種隱而不晦的事實，有人又稱跨國公

司為「看不見的帝國」，或戲稱之為「廿世紀的怪物」，例如揚名國際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曾藉著雄厚財力，在拉丁美洲橫行霸道，甚至推翻當地政府，而獲得了「章魚」之渾名，即是一例。

跨國公司具有下列之特色：

一、建立國際壟斷組織：由於二次大戰後，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地發展，舊的殖民主義行不通了，列強國家改而採取新殖民主義政策，對亞、非、拉國家進行剝削、掠奪和控制。例如美國戰後，隨著生產集中、資本集中之高度發展的結果，造成少數幾家大公司壟斷美國經濟，進而越出

一國之範圍，向國際壟斷組織發展，以追求更高的壟斷利潤。

二、通過私人壟斷資本向外的直接投資而建立起來，並以本國的母公司為中心，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就地僱用廉價的勞動力，從事生產、運銷、金融等工作。如此一來，跨國公司可以繞過所在國的關稅壁壘、進出口限額以及外匯管理等方面的重重限制，壟斷該國的市場和原料，進而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使該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處於受制的地位。

三、跨國公司的國外分支機構（子公司），一般而言，乃由某一國的母公司獨資經營，或與當地的私人資本或國家資本所合資經營，也有經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壟斷資本合資經營。

四、跨國公司管轄下的公司所有權，無論是獨資經營或合資經營，完全掌握在母公司的手裏，受其全盤控制。

五、跨國公司管轄下的經營管理權，高度集中在母公司手裏，由母公司統一指揮。一個大型的跨國公司往往在若干地區同時進行生產，分頭製造零件，集中裝配，然後透過統一的分銷網向世界各地銷售。

六、為了適應變化多端的國際經濟，抬

高自身的競爭能力，以及在各國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鬥爭下，謀取生存發展，跨國公司的未來發展趨勢，即將傾向於：擴大經營範圍，進行跨行業、多樣化的綜合經營，所以說，跨國公司已經是一種跨國家而且跨行業的國際壟斷組織。

七、以母公司為中心的企業體系，形成一個外來的強大勢力，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為「國中之國」，進行著各種難以彌補的破壞性工作，舉凡：壟斷生產、企業併吞、掠奪原料、剝削勞動力、破壞民族經濟、干涉內政、進而從事顛覆破壞活動。（例如一九七三年，美國一手導演「顛覆阿萊德政權、殺害阿萊德總統」的醜劇。）

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國家的石油鬥爭事件中，使得反對跨國公司的反帝、反殖、反霸，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而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項著名的創舉，不僅印證了「哪裏有剝削和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和鬥爭」，同時證實了第三世界的覺醒和壯大，大大地減弱帝國主義的威風，使第三世界的人民重新開拓眼界。

如今，反對跨國公司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以阿拉伯國家的石油鬥爭為例，則分別採行減產、禁運、提價、國有化和

增加本國股權等措施，來監督或限制跨國公司的掠奪活動，此外，並實施資源和外商企業國有化，組織區域性、行業性的經濟集團來對抗跨國公司，進而從事反剝削、反掠奪、反控制的鬥爭。此項由中東燃燒起來的烈火，對於跨國公司不僅是致命的打擊，也使得阿拉伯產油國的實際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不到一百億美元增加到六百多億美元，其經濟上的重大收穫，成為第三世界人民新覺醒的鐵的事實。

以目前的社會而言，不可不謂是資本家趾高氣揚的時刻，正因為如此，依舊有不少人深深懣懣著這良辰美景，而把個人生活的劣根性暴露無遺，舉例言之，某些代表著資產階級的人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不僅為跨國公司大唱讚歌，並解說跨國公司將為世界帶來「合作」與「和平」，帶來「新的世界秩序」。這一派的說詞，無非是認定跨國公司可能把「現代技術和經營方法」帶進發展中國家，能克服「經濟落後」，為第三世界帶來「經濟繁榮」。但是在跨國公司的狼羣中，除了侵略和弱肉強食，新的殖民地還能奢談什麼？而面對資本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和腐壞性，人們能不讓自己去思考滾滾向前的歷史思潮嘛！

膨風的革命家

張金策批判許信良

張乃信

許信良是來自島內的黨外，許信良的許多問題，也很可能是島內黨外的問題。許信良的問題的暴露，也應當有助於島內黨外人士的反省。

七十年代，郭雨新、張金策、吳銘輝相繼赴美，他們這些黨外人士，在島內與國民黨有直接鬥爭的經驗，來到美國後，也先後成為鼓舞海外運動士氣的「樣板」，有如反共義士一樣，在宣傳過一陣熱後，就被冷凍了。「強龍不壓地頭蛇」，黨外人士終不能成為海外運動的地頭蛇。彭明敏如此，郭雨新如此，許信良也如此，其他就更不足論矣。

被「冷凍」後的彭明敏剩下一個「台美協會」，郭雨新守住個「台灣民主同盟」，挾島內黨外運動之勢的許信良則在「台灣建國聯盟」之後，創辦了海外的「美麗島週報」。

進入八十年代後，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除了海外「法統」的台灣獨立聯盟外，在原本的統獨分裂和左右各異的紛爭中，又出現了島內來的黨外人士和原來海外運動人士的不同。台灣聯盟最近發生洪哲勝等集體退出的事件，島內來的黨外人士也長期的不合，最令島內注目的黨外人士許信良，竟在海外受到同是島內出來的黨外人士張金策的嚴厲批判。

張金策原為郭雨新選舉時的大將，並以黨外身份當選礁溪鄉鄉長，並任「台灣

政論」副總編輯，另一副總編輯以「叛亂」判刑入獄，張金策也以「貪污」被處重刑，張金策的「貪污」有類於施性忠，故棄保逃亡赴美。赴美之初，在台灣聯盟的安排下，也曾風光過一陣，被冷凍後，又和「台灣時代」混過一陣子。許信良挾島內「美麗島」之名在海外創辦「美麗島週報」。八一年二月，張金策也創辦了「海外政論」，以不同的筆名展開了對郭雨新、許信良及台灣聯盟等的批判。尤其在第七期以後，批判的重點放在許信良。

雖然張金策批判許信良的動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批判中，却暴露了許信良在海外運動中的許多問題。許信良是來自島內的黨外，許信良的許多問題，也很可能是島內黨外的問題。許信良的問題的暴露，也應當有助於島內黨外人士的反省。除了張金策批判許信良外，最近又有洪哲勝等退出台灣聯盟的事件，可見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島內的台灣人也應有權知道真相。

●代表了「誰人的精神」？

本期要目
敬告福特總統 本社
我們的態度 黃信介
醫師法醫治不了問題 郭雨新
我們的方向與現代化 張景涵
相忍為國之道 黃華
為自由候選人助陣 金文吉
高普考的配額 姚嘉文等
比利時三個無業遊民 李登庭
被漠視的一群 何文振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號(月刊)

臺灣政論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第4期

「海外政論」在創刊號上就有一篇文章「海外台灣運動的癥結」，其中就有一段話向許信良質疑：「民主同盟發「快訊」，台灣聯盟印「參考消息」，其最重要的也是在向同鄉表示自己「島內」有人。而「美麗島週報」的出刊，更是唯恐人不知的特地印上「繼承他們的精神，執行美麗島的工作」，其實，「美麗島週報」人員，真能繼承島內在獄美麗島志士的精神嗎？」這一項質疑當是後來批評的一個伏筆。

由這個伏筆，第十期「海外政論」就有一篇陳秋山的文章更仔細的說：

「許信良不只儘在現成的人物、團體之中打轉，還和聯盟一樣，充分地利用海外同鄉對島內反抗者的敬佩與關切之情，隨時隨地都在找機會把自己和島內志士黏合在一起。

高雄事件發生後，短短幾天內，從倡議到組成建國聯合陣綫，並使當時「一黨獨大」的聯盟拱手讓出召集人的領導地位。許信良憑藉什麼從一個島內的革新保台論者，一躍而為要消滅國民黨的陣綫領袖，順利地完成

被國陳中國民黨黨籍聲明

余嘗思地方員吏之於民如蠶食桑之於葉。若竊葉而食之。豈遭逆氏家之情。不以未獲稅。名而不改。初來寧遭國陸而不易其志者。蓋不見見國國仁人義士如淚流沉之悲。業漏焉。今日不肖。工營上苟之工具。

許信良

●許信良此心長為國民黨員？

更重要的是，台灣美麗島社畢竟是在國民黨體制下從事合法運動，許信良自己脫離國民黨掌下，來到海外要怎麼說消滅國民黨都可以，再怎麼說都不應該把國民黨下的美麗島社同仁代表進去。

不只一次！許信良繼續不斷地挾島內美麗島社以自重，【美麗島週報】創刊後，每期都刊載如下的聲明：

「本刊原有主要成員，目前均在獄中，現有的成員繼承他們的精神，代為執行美麗島的工作。」把目前仍在島內獄中的民主運動人士，說成是現在美國發行的【美麗島

請問，什麼是島內美麗島受刑人的精神呢？當許信良堅決反對民族綱領與反帝綱領的時候，他是在執行受刑人的「精神」嗎？後來他又轉而舉起這兩個綱領的旗幟，也同樣是在執行受刑人的精神嗎？當他聲稱要把「國民黨從地球上消滅」的時候，也是在執行受刑人的「精神」嗎？

我們都知道張俊宏等人一向以台灣
的「中智階級」爲中心來看問題，
可是去年的世台會上許信良居然公開
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左派」，這又
是誰人的精神呢？」

● 不負責任的想當然

許信良到美國來後，出版了作為其參與海外運動理論根據的一本書「革命萬歲」，這本書也受到「海外政論」嚴厲的批判。例如，他在「革命萬歲」中說到：

『一個有歷史的生動活潑的群眾運動是不會沒有組織的，不管是有形的，或是無形的。革命者以及革命組織最重要的組織工作，是找出這些組織，連繫這些組織，統一這些組織，領導這些組織。』

這一段話，也引起了上引陳秋山文章的批評——

『由「有歷史的生動活潑的」這些字眼的連想，就推測出目前台灣的群眾運動有革命組織的存在，這實在是不負責任想當然的說法。「有歷史的生動活潑的」，並不足以證明這個群眾運動就有革命組織的存在；沒有什麼歷史，不夠生動活潑的群眾運動也不一定就沒有革命組織。有無之間，憑什麼論斷？許信良也表露出含混玩弄後的心虛，緊接着就加上「不管是有形的，或是無形的」，這就更奧妙、更無從對證了。不過，也正因為如此，適足以讓大家看出【革命萬歲】的欺騙性。』

爲了反證許信良所暗示的『目前台灣
的群眾運動有革命組織的存在』，第十期
「海外政論」陳東輝的文章說：

「許信良是不會也不願作此了解

的！他把島內目前為止那些運動領導者的「長期的努力」，說成是反統治的努力，並認為已建立起「反統治群眾運動的權威」，以此做為「領導革命的必要條件」。這種想當然的邏輯，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了。

不過，我們難免會疑問到，我們所能看到的那些島內運動領導者，是否就可以因許信良所說的「長期的努力」，過渡到具備「領導革命的必要條件」呢？

幾年之前，許信良應該是相當頂峰的島內運動領導者，我們不妨以他爲例來看。

許信良退出國民黨、投身黨外，
他認為的價值和意義是：

「第一，我一直覺得這是促使國民黨反省和檢討的最好機會。第二，我在省議會的表現和我的著作，在廣大的社會已經激起一種政治革新的希望。……我覺得有責任不使社會對政治革新徹底失望。」

第三，我強烈感覺到，台灣目前面臨相當大的危機。……在選舉中強烈表達追求自由民主生活的

意願，才能讓我們的國際友人，
尤其美國朋友，有理由支持我們。」

（四）【選舉萬歲】頁四三三、四三三

變成黨外一份子之後，許信良對國民黨有怎樣的看法：

「第一點，二十年來它對台灣仍有貢獻。」

第二點，它做的很多事情使我們不滿，但也非事事皆錯。

第三點，以它的黨內成員來說，國民黨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滙集。」

(【選舉萬歲】頁四一三)

許信良人在黨外，有沒有就此

「我從頭到尾就沒有離開黨的頭。而且我相信國民黨中有百分之八十的黨員是和我一樣的人。」（【選舉萬歲】頁四三五）

上述這些已足夠讓我們明白許信良過去在島內所做的，是革新保台論者的努力，做許信良所說的「國民黨現代化」的努力，和目前康寧祥所行

選舉萬歲

桃園選戰
中壢事件

許信良的
基本見解

林正杰·張富忠 合著

的態度，那個島內革命者敢與他連繫？他又要用什麼來統一、領導呢？」許信良的這種政治立場不斷的改變或改變，也不免令人懷疑。因此，柑縣客就一再指出許信良的馬列主義不過是史明餵食的「煉乳」，其實是御用化的史達林主義，柑縣客在第十期的「海外政論」上說：

「許信良追隨史明而主張馬列主義，是一大進步。我們台灣人不能沒有獨立的判斷，只知道跟著美國人的屁股後面五十步（或十五年）走。但在瞭解馬列主義上我雖然是一個後來者，也看出史明的是史達林時代御用化、公式化了的馬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馬克思的學說是一個徹底批判、追根究底的學說，不但反對保守的右派怕怕，「共產」國家的既得利益階層更怕，所以在後者馬克斯才會被「供上神壇」，用御用版的解釋把它隔離起來，不使它發生批判的作用。中共官方欽定的馬列主義就是這個樣子。」

逸宏則在「革命必須革心」（第十期

是完全一致的。」

●左派流行病

許信良政治立場的多變性，也成為「海外政論」詬病之處，他由中央黨部的幹事變成「此心長為國民黨」的黨外，再由革新保台的黨外，變成「馬列主義革命者

」。陳秋山說：

「並且，不客氣地說。雖然許信良由「此心長為國民黨員」變為誓要把國民黨消滅的「職業革命家」，但一下子「無產階級在台灣沒有前途」，一下子又自稱起「馬列主義革命者」，說什麼「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不來領導這個革命！」，這種毫無原則

（一）文中，翻出了許信良的舊作和談話，指出許信良的思想是受儒家和「三國演義」的影響，而非馬列主義。將許信良前後所說的對話對照起來，逸宏說：

「從「風雨之聲」、「當仁不讓

」，「選舉萬歲」到「許信良專訪」，我們觀察到的許信良，無疑地受中國封建思想的影響，非常廣泛，也非常深刻。把這些言論與許信良自稱「馬列主義者」之後的論點來比較，我們只能得到三種可能：

1. 許信良當年在台灣胡扯；
2. 許信良的「馬列主義者」是欺騙；
3. 許信良正在經歷思想自我鬥爭的過程。」

「海外政論」十二期，刊出吳有田「看左派流行病」一文說：

「誰才站在台灣勞苦人民或無產階級的立場？不要以為自己是左派就是站在這個立場，這是需要隨時就實際言行來驗證的。許許多多人士一旦自居起左派來，就滿口都是口水地說自己是無產階級立場，是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並且由此，動不動就把革命運動的問題，隨便地推做什麼左、右派的問題，隨便地就說這是什麼無

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立場差異。

如此地說左就左，劃分左右，把革命、不革命轉移為所謂的左右的對立。這無異是拿無產階級當裝飾品，貼在自己身上做革命的標記，在革命運動中混水摸魚，是大小政客投機的又一種形式表現。

總結起來說。今天海外的許許多多左派，大部份是左派流行病下的產物。把左派等同為革命，以左為貴、以左為傲地自稱起左派來，藉此宣揚自己是前進的、革命的。基本上，那是高人一等的那種封建意識的表現，是落伍的、反動的。這種深受封建意識所左右的左派，其所散播的言論也必然是封建的、教條的，是有礙於台灣革命運動的。」

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指名許信良，但是「海外政論」一直以許信良為「投機政客」的。

●召集人神話

「高雄事件」發生後，海外立即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綫」，許信良任召集人，現在建國陣綫又如何了呢？「海外政論

」第七期，連三士有「召集人的神話」一文，茲引述部份原文如下：

「在海外台灣人運動中，到目前為止，大概找不出任何一個團體或組織，像台灣建國聯合陣綫這樣地成立之速、癱瘓之快了！

一九七九年底高雄事件發生後不久，在許信良的主催之下，包括獨立聯盟、台灣臨時政府及許信良、郭雨新等在內的海外十個台灣人運動團體或人士，共同發表宣言，宣佈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綫，並推舉許信良擔任召集人。

這個聯合陣綫，在發表了宣告成立的聯合宣言之後，從此就沒有下文



，除了同時透過台灣之音廣播呼籲大家捐錢外，再也不會有任何作為。

並且，從一成立開始，成員之中就各說各話，不論從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不出一點聯合的樣子，好似這個聯合陣線是專為發表聯合宣言而成立的。

這樣的聯合陣線，再怎麼說都是失敗的。然而，參與的成員若能面對失敗，好好的省思、檢討並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未嘗不能從這次聯合陣線的失敗累積來日聯合陣線成功的基礎。

而且，做為一個政治運動者，更必須要有面對失敗、承認失敗的真誠和勇氣，才能夠負其責任地及時改正錯誤，才能避免再走上同樣的失敗道路。

可是，從台灣建國聯合陣線宣告成立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這塊建國諸公意氣飛揚要號令天下的招牌，竟如無主神牌一般地無人收拾、隨地棄置。我們不曾看到當年熱烈參與其事的十個成員裏頭，尤其是身為召集人主持其事的許信良，有過任何負責任的明白交待或結束，任令這

個聯合陣線在島內外台灣人心目中，留下一個從事台灣人政治運動不負責任，虎頭蛇尾的紀錄。

不只如此，我們還看到的是，拋下建國聯合陣線不顧一走了之的許信良，在七月一日出版的【革命萬歲】中如此說道：

「在黨外的領導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之後，在黨外運動危疑震撼，徬徨失措之際，聯合陣線的出現，對於黨外運動的活動者來說，就像狂風暴雨中的孤舟看到了夜岸的燈塔，指引了方向，也燃起了希望。黨外運動能很快重新捲起了風雲，聯合陣線是功不可沒的。」

如果真的像許信良所說，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的出現，對台灣島內的黨外運動活動者，是「夜岸的燈塔，指引了方向，也燃起了希望」。那麼，做為這個陣線召集人的許信良，莫非是神話中光照千萬里的夜明珠！

假使一事無成甚至連團結象徵都維持不住的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發表了一個成立宣言，就能夠如許信良所言「黨外運動能很快重新捲起了風雲

，聯合陣線是功不可沒的」。那麼，「建國」諸公真是法力無邊了！在美國的紐約諸公們聚個會簽個名在白紙黑字的宣言上，就有了使萬里外太平洋對岸的台灣島內黨外運動，重新捲起了風雲的「不可沒」之功。當然，主持其事的許信良更應該記大功了！

● 膨風的革命家

許信良談建國陣線的「功不可沒」就遭到連三士的批評：

「許信良把自己和郭雨新等人簽名發表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說成對台灣黨外運動功不可沒，基本上，和國民黨政權的宣傳，同樣地是在神化自己把自己看成太偉大了，也同樣地把群眾看成是無知、愚蠢，以為使用花言巧語玩弄美妙神奇就可以讓群眾跟著陶醉。」

許信良不但誇張建國陣線，並且夸夸而談台灣社會已處於「革命前夜」，因此，「海外政論」第八期有林格的「許信良的革命前夜」一文。

從一般社會群眾來看，林格認為：

「首先，我們要指出的是，許信良以台灣社會上發生攻擊警察等事件，就由此伸論到台灣人不只想反而且敢反，這種一絲相連就擴大成面的片面誇張，實在和國民黨把黨外人士人

權日的遊行推論到「叛亂」一樣，完全是統治哲學那種唯心經驗論想當然的論斷。詳細一點說，國民黨加【美麗島】黨外人士「叛亂」罪名的推論是，黨外參與政治不加入國民黨，就是反國民黨，反國民黨而至於結眾遊行，那不是叛亂是什麼？許信良用同樣的推論，警察、銀行等是國家統治機器，攻擊它、搶劫它，當然是反統

治法律和權威，而攻擊、搶劫是暴力，那就證明了「台灣社會的反統治力量走向暴力」。

這種國民黨所慣用完全不照事實驗證純憑一己感覺隨心所欲的論斷，許信良居然也跟着運用起來，當然，就一樣地欠缺合理的論證。

許信良如果要以台灣社會所發生的攻擊警察、搶劫銀行等事件來證明台灣人想反、敢反，至少應該具體地說明這些事件如何具有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意識；否則，是不應該只在這些事件頭上加上頻繁、大膽等形容詞來膨風的。

事實上，不僅這些事件裏無從找出若何反統治的政治意識；現階段的台灣人民大眾，雖然飽受國民黨這個統治集團的壓迫、剝削，但在那套中華民族封建道統思想的灌輸下，所能具有的反統治意識，仍然是相當有限。」

由於沒有要求革命的社會群眾，也就不可能有要求革命的群眾領袖，今天的黨外人士，基本上只有改革的激進與溫和之分，而沒有革命不革命的問題。所以，林格對許信良一廂情願的「革命前夕論」批



判爲：

「總而言之。許信良所說的台灣已到了『革命前夜』，那完全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任何一個稍對台灣現社會有所了解的人，都隨時可以舉出很多的例證來駁斥他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不過，我們相信許信良絕不致於有眼無珠到真的認為台灣已到了『革命前夜』這個階段；我們認為這完全是許信良無中生有的縱橫政壇策略。」

很顯然的，許信良是爲籌組新聯合陣綫才喊出這個『革命前夜』來的。在『革命萬歲』裏，許信良用了許多諸如『機不可失』、『它是會變化的，會失去的』、『要乘勢而動，因勢而成』……這類令人感受迫切的字句，來襯托『革命前夜』這個動人心弦的前提，引發、增強海外群眾的危機意識，企圖由此逼使每一個海外革命者跟着他再去組織一個新的聯合陣綫來。

這種製造、運用危機意識的手法，和國民黨並無二致；而且是脈絡相通的。國民黨用宣傳中共會侵犯台灣來製造台灣人的危機意識，由顧忌中共

侵犯而忍受國民黨的統治，由畏懼動亂而害怕、反對起革命來。」

●畫大餅糊大砲

受到了『海外政論』的批判，許信良也發表了一篇『再論當前的台灣革命情勢和台灣革命者的任務』，而又受到趙清水在『海外政論』第十期上的批判。趙清水說：

「許信良畫大餅、糊大砲地喊出『革命前夜』，正是迎合海外這些落伍而好高談闊論的『高級知識份子』，企圖讓他們在再度自我陶醉之餘，跟着許信良起哄，再像幾年前那樣地大喊『大團結，組聯合陣綫』，再來扛『神明』繞街。」

當然，投機政客迎合落伍同鄉『乘勢而動』的論調，總是飄浮不着邊際的，總是站不住腳，經不起批判的。許信良『革命萬歲』的論調，即使不看『海外政論』的批判，任何一個稍具革命認識的人只要略加留意，單從許信良自己的文章內容，也不難覺察其論調的自相矛盾、錯誤連連。

但是，再怎樣的矛盾、錯誤，再

怎樣的混淆、危害，政客是不會爲此檢討、收斂的。而且，在遭到批判後，大都難以克制被打破權威、騙局後的惱怒，往往連政客所賴以裝扮的『胸懷、氣度』的外表都不顧了；原形畢露地東抓西扯起來。

許信良被『海外政論』批判後發表的『再論』一文，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政客末路掙扎情急敗壞的樣子。除了『死鴨硬嘴』地重覆其『革命萬歲』那些站不住腳的論點後，幾乎所有統治者用來歪曲欺騙的愚民手法，都赤裸裸地用上了。讓我們從其『再論』一文擇要提出幾點，來檢視、討論其所搬弄的手法。」

趙清水還強調，許信良的『革命前夕』和『危機意識』其實是從國民黨的統治手法中抄襲來的，並且是漠視現實真相的。他說：

『國民黨這一套，許信良竟拿來海外台灣人運動裏招搖。他雖口口聲聲要把國民黨消滅，卻儘在舊有的陳腐人物團體間合縱連橫，從來不好好踏實地從事革命的基礎工作，不曾致力於新生反抗力量的開拓。並且無視台灣現社會雖有不少人對國民黨不滿

邱村葉的原文如下：

『我台灣民族擁抱東西文化，順應世界潮流，美國有的，我們當然也有。台灣聯盟的張主席就是一個應用『有用的幻想』的專家。

很多同鄉一定還記得台灣聯盟的『蔣經國通緝令』，當聯盟大員四處分發的時候，我還以爲這只是因爲個別的聯盟大員缺少幽默感而已。最近我看了張主席的一篇訓詞，才知這件事非同小可，原來是『現階段獨立運動的工作方針』之一，有其奧妙的理論基礎。（『台灣公論報』七月十七日）。張主席認為『咱應該知道，要推展獨立運動或任何革命運動，最重要的理論是方法論，是策略』，所以『咱盟員要熟讀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吸收其中『政治作戰，心理作戰和謀略的使用』。

這樣說來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豈不爲一種集體催眠，但被催眠的人總有夢醒的時候，夢醒了又該如何呢？答案仍然是空白的。

許信良的『膨風』被『漏氣』後，還有人說『不管是不是革命前夜，這樣講總

●日不落同鄉會

許信良『誇張虛浮』的作風，八一年九月美南出版的『半屏山』上也有一段記述如下：

『許信良的演講一開始就讚揚『Houston 台灣同鄉會』是全世界最好的台灣同鄉會』，接着又稱海外的台灣同鄉會爲『日不落同鄉會』堪與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相提並論，進而達到『台灣人全是最優秀的民族』的結論。諸如此類誇張虛浮的說法及不倫不類的比喻，對於增進老同鄉的自信心或能產生一定的作用，然而搞革命不是辦選舉，需要正確地瞭解群眾，教育群眾，從而帶動群眾。迎合群眾或能一時有助於短期目標的實現，但就長遠的革命目標來看，華而不實的言論只會使群眾高估自己，錯估情勢，不能繼續作自我提昇的工作，最後終將延緩台灣革命的脚步。』

除了許信良以外，據『海外政論』第八期邱村葉的文章說，張燦鑒亦復如此，

却普遍欠缺革命覺醒的事實，居然聲稱現階段台灣已存在『農工小市民忍無可忍』、『中小企業者普遍絕望』、『台灣人不想反，而且敢反』的深刻革命危機，呼籲大家『在這革命的前夜』，要『乘勢而動，因勢而成』，『立即成立戰鬪的組織，進行戰鬪的動員』。

表面上看，許信良這麼喊，是很引人注目或興奮的，就像蔣介石當年喊『反攻復國指日可待』一樣，是很令一些『老芋仔』心動鼓舞的；海外台灣人當中那些不問真假只知附和的老台獨士紳們，也難免藉此再度自我陶醉一番。甚至，有的還會振振有詞地說：『不管是不是革命前夜，這樣講總是有鼓舞作用的』。

「高雄事件」發生後，台灣有人檢討其原因，乃黨外人士『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錯估了群眾』，許信良當時是黨外領導人之一，這項錯誤估計的造成，他應當是有責任的，應當要徹底檢討的，但他來到海外後，不但不檢討自己，而且仍然沿襲在島內的錯誤估計到海外鼓動同鄉，而受到了『海外政論』嚴厲的檢討。

是有鼓舞作用的」。另外，在第十一期的「海外政論」有篇短文又記述了許信良類似的另一個故事。文章中說：

「許信良在『再論當前的台灣革命情勢和台灣革命者的任務』（美麗島週報一八一一期）一文中說：『我在《革命萬歲》中是敘述它的存在，並不論證它的存在。……』這使我想到多年前一次有他在的同鄉聚會中的往事。」

在那次聚會中，許信良正大彈其「台灣民族優秀論」，舉出台灣人很會做生意，海外台灣人子弟讀書表現優良等，以作為「優秀論」的證據。當時有一位同鄉加以反駁說，台灣人很會做生意，不過因為政治一途遭到壓制，像目盲的人，耳特別靈一樣，做生意也就似乎特別厲害；同時，台灣人一向受中國士大夫觀念的影響，而且來海外的又多半是留學生，對子女教育當然特別留心，第二代的表現自然比一般人好。所以，所舉之例都不能作為「優秀論」的證據的。

許信良理窮之餘，竟回答道：「我們說台灣人優秀究竟有什麼不好？」

是把群眾當作玩物一樣的侮辱。

我們要奉勸許信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再搬弄神話了！

●咱就像在做賊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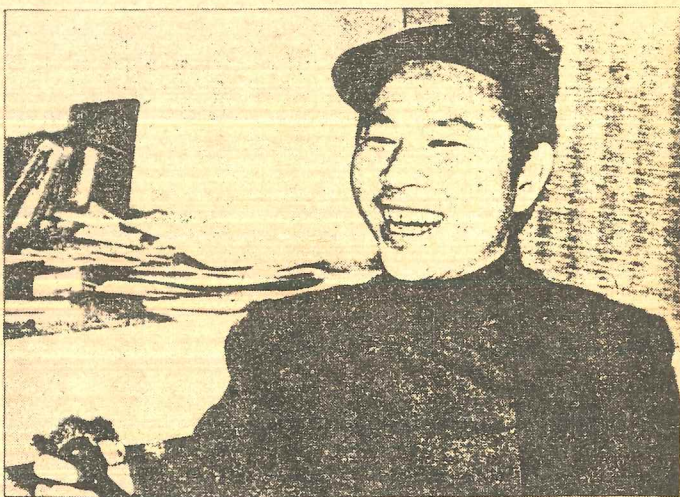
八二年十月出版的「海外政論」刊出張金策在該年度世台會的講稿，全文以許信良為批評的對象。其中有一段話是耐人深省的。他說：

「但是，選舉和革命難道相同嗎？選舉若是可以想出一個好的策略、好的權謀，能夠抓住今日群眾的心理，明日煽下去，大家火燒起來，興奮起來，後日投票下去就結束了。但是，革命煽下去，不一定是明日，不一定是下個月，不一定一年後會燒起來。火沒燒起來不要緊，最主要就是咱一個革命組織、革命者，難道可以在咱群眾中一直煽嗎？」

假使無足夠的火種，無足夠的木炭、乾柴時，就隨便煽下去，很可能煽起來的不是火，而是風飛沙。

所以咱必須要了解，了解什麼呢？咱的群眾不能讓咱這樣一遍再一遍

●膨風的革命家——許信良



許信良的「誇張」和「虛浮」，並沒有因建國陣綫失敗而有所檢討、有所收斂。八二年十月出版的「海外政論」連三土的文章說：

「當建國聯合陣綫仍未負其責任地做個明白的交代或結束時，許信良又呼籲起組織『台灣民族民主革命聯

合陣綫」了，他在七月一日印行的「革命萬歲」裏這樣說：

「和兩年半前一樣，現在的形勢又要求我們團結了。和兩年半前不一樣，現在的團結是號角而不是燈塔。形勢要求我們團結，形勢也可能不待我們團結。」

在此，我們要告訴許信良，豈只是兩年半前或現在，任何時候，任何形勢，都要求台灣革命運動者團結；也都要求將不負責任、玩弄權謀的政客從革命陣營中清除掉。

同時，今日的台灣革命運動和群眾，也和兩年半前不一樣，不論許信良如何奇妙地將「燈塔」換做「號角」，怎麼動聽的什麼新聯合陣綫，再也不會有人去理會了。

更多的群眾已經認識到許信良吹起的號角，絕不是革命的號角；至多，只是如同成功嶺上吃飯時間到了的吹號。

從事政治運動，失敗並不可恥；最可恥的是明明失敗了却不敢面對、不願承認，甚至還要多方粉飾、解釋為成功。這樣不只是欺騙群眾，而且

地一直煽，這樣煽下去的結尾會怎樣

？結尾不但對信良兄、對張金策也好，對所有從事革命運動的人，對整個革命運動都是不好的影響。

為什麼？剛才信良兄有提起一點，咱說起來很慚愧，咱就像在做賊仔，你知道嗎？咱今日在做台灣獨立革命的人，未必然受台灣人的尊敬，未必然給台灣人有信心，甚至有的台灣人看到咱，還轉過頭避開去，這表示什麼？表示咱久年來獨立革命運動沒建立足夠的信心，及建立足夠的威信。」

張金策批判許信良的動機，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許信良在島內時曾自稱「職業政客」，並稱群眾只有十三歲。所以，張金策所批判的，都是許信良自己曾經承認過的「職業政客」的海外版而已。當時他們大談「職業政客」時，余登發就說過，黨外人士不可以政客自居。

虛張浮誇，譁眾取寵的政客性格，在島內因與國民黨對抗而未能暴露，但在脫離了國民黨統治的海外，就暴露無遺了。島內的黨外運動，自去年選舉失敗後，有識人士開始作反省和檢討，但如果不能檢討到這項政客性格的話，島內的黨外運動也很難有真正的突破。

最近海外台灣人運動，除了張金策對許信良的批評外，洪哲勝退出台獨聯盟也當是一件大事。今年美東夏令會，各派台灣人政治團體，各不相讓，互挖瘡疤，也使得大家寒心，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也應當要有嚴肅而認真的反省才是，否則，離開了本土的沒有根的海外運動，更是容易土崩瓦解的。雖然張金策對許信良有如嚴厲的批判，但是，翻遍「海外政論」，除了「反封建、反特權、反獨佔、反壟斷」的口號外，叫得最響的也只有「革命」。

但根據「海外政論」和張金策自己說，許信良的「革命前夜論」是一種「膨風」的錯誤估計，那就是說，目前台灣沒有革命的條件，沒有條件而要創造條件去革命，豈不成了為革命而革命？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高喊「革命」，是不是也是一種「誇張虛浮的說法」和「有用的幻想」？或者是用這種「誇張虛浮的說法」和「有用的幻想」來滿足一些海外台灣人基於各種因素而仇恨國民黨的情感。

如果台灣的「革命前夜」遲遲不來到，海外的革命志士們豈不是只有抱著自己所喊的「革命」口號而終老海外？

為陽光小集「自行解散」來函說明

向陽

編輯先生：

頃閱貴刊一九八四年七月號，署名江明遠先生大作「陽光小集自動查禁解散」一文，牽涉「陽光小集」內部事務部份，因作者未經查證，與事實嚴重不符，也與貴刊一向標榜之「有深度、有內容、有啟發性」之特色相違，令人深感遺憾。

謹依該文談論內容，就事實條例說明如左，敬祈依出版法第十五條規定加以更正足禱。

一、江文謂「以向陽為首的詩刊同仁，決定自己查禁詩刊」（頁八二）句，純係揣測之辭。依本社發函，以陽光小集十三期在未經發行人、社長、總編輯之審決下，某同仁即逕予編輯、付印並擅自發行，

故「堅決不承認發行」，此一態度就法、理、情言之，均屬正當。換個角度來看，假使此事之當事者移位為貴刊，貴刊亦當會如此處置才是。乃江先生評論此事，遺漏該信「堅決不承認發行」句，而謂之為「自動查禁」（標題）、「自己查禁」（內文），實有違報導求實的原則，也有背評論公允的道德。

二、江文第二段謂「陽光小集」發函「所指的某位同仁係指苦苓，所謂不當的稿件，係指該刊內文有關「春風」的評介，以及政治詩座談會紀錄有關葉石濤、楊青矗等部份言論，但探究其緣由，主要是因為春風……造成有關單位的過度敏感，使某些詩人不願因而受到衝擊。」（頁八三）云云

，實在匪夷所思，頗具想像力。按，陽光小集十三期純係因為某同仁在未經全社同仁授權下，擅自夾雜稿件，越權編輯，擅自交付印刷，而稿件未經發行人過目同意，又於社內進行協調之際，拒絕協調，擅自發行。本社發函所指「不當稿件」，即係該同仁交付印刷時擅自加入之「陽光短打」及部份抽、換詩稿（與總編輯定稿交付時不同）。乃江先生既能收到（或看到）非由本社寄出之該期，又能收到（或看到）本社寄出之通知書，應屬查證甚易，而仍在未經查證之下，以高度想像力自行編織原因，如此態度，未免稍嫌草率。

三、江文第三段之後之評論，皆由一、二段延續而來，而一、二段在報導程序上的有

所「缺漏」，在評論態度上的未加查證已如前述，實屬遺憾。唯不能已於言者，此段論述既依沒有事實根據的揣測及想像為之，與江先生結論之「不願看到政治污染台灣文學」的誠摯心願，似已完全背違，正義應從事實來，自由應從尊重來，願與追求正義、崇尚自由的江明遠先生共同勉勵。

謹說明如左，敬請貴刊依出版法「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版面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惠予刊佈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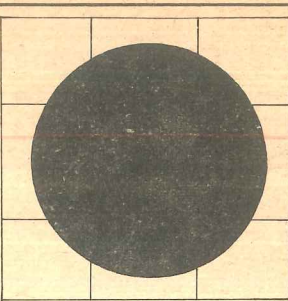
陽光小集詩雜誌社
發行人 林淇養

七月五日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
段228巷10弄13號七
樓

閉戶關窗，何來陽光！

答向陽先生

江明遠



謝謝貴刊轉來向陽先生來函。

對於向陽先生之不同意於本人關於陽光小集第十三期「自動查禁」之報導者，謹答覆於後：

一、向陽先生指責本人報導不實者三項，1.「某同仁」係指苦苓。2.陽光第十三期是「堅決不承認發行」不是「自動查禁」。3.「不當稿件」部份。關於第一項，向陽先生來

函並未提出反證，且經本人再三查證，此「某同仁」確係苦苓先生無誤。

二、關於陽光小集第十三期，無論是「自動查禁」也罷，或是「不承認」發行也罷，不發行總是事實。一本花費了同仁諸多心力，金錢印成之書刊而不予發行，則與「查禁」何異？向陽先生來函所謂「堅決不承認發行」與「自動查禁」「絕對無法劃等號」云云，無非只是名詞之爭，文字魔術而已，大可不必多費唇舌。

三、關於「不當稿件」部份，如果事實上竟而不是如本人所判斷之為關於春風詩刊的評介以及政治詩座談會紀錄中葉石濤、楊青矗等人之言論，而是如向陽先生所言僅為部份抽換詩稿與「陽光短打」，則更令人百思不解。遍閱陽光第十三期，衡以台灣目前之言論尺度，並無所謂「不當」之文字。陽光發行人糾察自行宣稱有所「不當」已屬費解，「不當」之部份竟而是些無甚意指之詩作及兼具報導與評論之「

陽光短打」則更令人費解。

又，關於春風詩刊的評介屬於「陽光短打」第二棒。

四、現代詩一向晦澀難解，本人實無意介入陽光小集內部之紛爭，故拙文雖與向陽先生來信用辭略有不同，然皆為明顯之事實。至於不易查證之「傳言」如向陽先生為示堅決不承認發行之「堅決」態度，將八百本陽光第十三期自動解交國民黨文工會一節，本人並未因其絕不構成對向陽先生之譏謗（蓋國民黨自難謂為不名

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其殖民地台灣，如火如荼地搞皇民化運動。我就是在此期出生，並渡過我的童年。在未進公學校前，除了令人厭惡的日本警察前來查戶口時，聽他像放屁似地留下那幾句我全家沒人聽懂的日本話外，根本就不曾聽過什麼外來語言。

●日語的落第生

在前幾期的「前進世界」拜讀到我的老友田朝明醫師和林海波先生討論「國語與台灣話」的大文，觸起我對往日的回憶，也想來談一談語言與生活的逸趣。我既非語言學家也不是人文學者，我只想以半生流浪過半邊天涯的一介百姓人的觀點，來談一談語言在我生活中的切身體驗；即使是湊湊熱鬧，也無所謂吧！

一個民族的母語，代表著她背後的文化，爲了深一層瞭解日本民族的生活和文化，我捨棄學校供給的宿舍不住，而在郊外農民部落的農家裡借宿，利用假日幫幫農家種田、和部落人們一起作息。在這種生活中很快就習得當地的方言和生活上的種種不同風俗習慣，這是在求學中，在異國所得到的豐富的生活經驗。

●學北京話，苦盡甘來

學校裡的外語課有「北京語」和「英文」，我對「北京語」特別用功。學習北京語的過程中，在發音方面遭遇過不小的難關，那就是捲舌音「ㄔㄣ」部，這在我們河洛語或日語發音系統裡是沒有的。因此，要學得正確發音必須從發音器官系統徹底的調適訓練才行，的確是一件最艱辛的過程。每晨花三十分

台灣語三問題 之我見

黃順興

漫談語言與生活

正因爲如此，在我進入公學校就學以後，一直到六年畢業，對於說日語這門功夫仍然是一個落第生。六年間，在學校因爲說台語而被掛上「清國奴」小木牌的次數，已難以記憶了。因爲這樣，使我對外來語言抱有很大的恐懼和排斥感。

命運之神將我送到日本，進入一個沒有人能說、能聽台語的生活環境裡，除了拼命學習日語，要不然就得回家耕田。這時候，我才領悟到語言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恐懼和排斥感也就消失了。

譽之團體，文工會亦難謂爲不道德之單位，而發行人自行查禁書刊更難謂爲不法之行爲。而隨聲附和，喧騰於衆。至於所謂向陽與苦苓兩先生因爲爭奪「國家文藝獎」而反目成仇，同室操戈，以至分裂詩社，

取消「陽光」之說，亦以其無可查證而未予報導。

五、刊物發行人代表刊物並負法律上之責任，「當然」有權對刊物爲不發行之處分，乃竟出諸以集體簽名，通告週知之方式，實可謂畫蛇添足，

多此一舉，故其用心，頗足玩味。

邇來輿論對於當局之動輒以語意不明，意指不確之理由查禁書刊之不當作爲多有論評，被查禁之書刊雜誌或爲無言之抗議，或據理而力爭，雖皆

打短光陽

有理三扁擔
無理扁擔三

獎的另外一面

△最近又連續有好幾個文學獎

頒佈，例如國家文藝獎、中興文藝獎章還有文協的文藝獎，有的固然是實至名歸，有的則要靠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有力團體的推薦。無論如何，在文人不受重視中的社會，得個獎總算是安慰，如果還有鉅額獎金可拿，也就不枉幾年的辛苦經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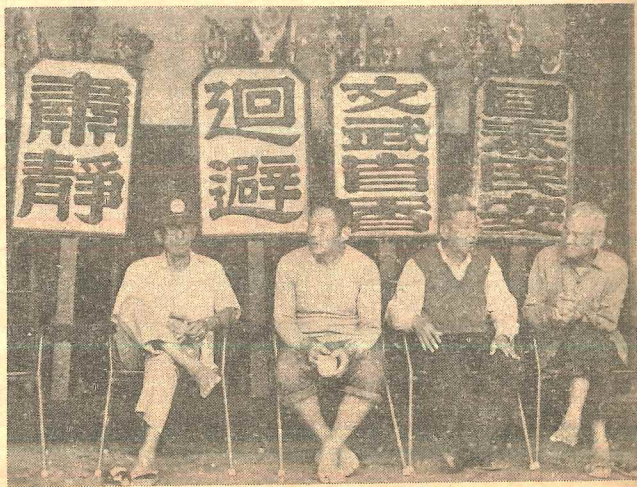
△五月號的「夏潮論壇」封面上有一行標題：「春風——三十年來第一本被查禁的詩刊」，「夏潮論壇」走知識份子的黨外路線，作法值得稱許，然而這個標題卻錯了：第一本被查禁的詩刊是標準的「詩潮」，第二本是「陽光小集」第九期，第三才是「春風」。

• 141 •

力爭不得，抗議無效，總之，皆爲爭取言論自由略盡棉薄，此所謂「盡其在我」，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乃應合於近世求民主、爭自由之大潮流，今者向陽先生「人不禁我我自禁」之舉措，可謂倒施逆行，大反潮流。論者以爲向陽先生或有反潮流之需要，而無反潮流之擔當，故乃假借民意，挾衆自重。

以上五點簡答向陽先生，併附上陽光第十三期之「陽光短打」影本一份，祈請刊出，俾便讀者共同檢視「不當」之處何在。

最後，期望於全體詩人者，爲人則能存其真性，爲詩則能詠其真情，勿再你爭我奪，甚至爾虞我詐。而敬告於向陽先生者，則請勿再嘖嘖於一、二文字之異同而對既成事實拒受公評。否則，閉戶關窗，何來陽光？



鐘，大約苦練過六個月，才能得到北京籍老師「勉強合格」的一句評語，而且還是當時全校僅有的一個合格者哪！

雖然如此，第一道難關克服過後，就覺得興緻勃勃，進入順境了。往後遇到不少學北京語的外國朋友，談起來都不約而同地道出相同的經驗。

後來當我第一次到東三省旅行，與大陸同胞交談起來就能無往不利，叫我深深感覺到學習語言者的快樂！

●國語地位的爭執

後來我在上海就職，登上黃埔灘，才發覺原來上海方言與北京話乃南轅北轍的兩種語言。絕大部份本地人根本不說北京話，或聽不懂北京話，外地人除非學習本地話，否則生活就困難重重了。難怪，光復後第一批考取交通大學的台灣學生，上課不到三個月就退學的退學、轉學的轉學，走光了，據說是當時連教授都用上海話授課。幾個月後，我才明白滬浙人當時還不肯認定北京話的國語地位，當時有位在學的青年朋友，即曾昂然地向我表示：上海（包括浙江省一帶）有著上億人口說上海話，而且上海是現代文明發達的地方，

如果中國一定要有一種統一的共同語言，為什麼不指定上海話？

在大陸還常聽到外省人講一句笑話：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講官話（指北京話）。而我一個廣東朋友也曾對我表示過：民國革命是俺廣東的孫文先生倡議的，他是中國之父，國父說的是廣東話，應該以廣東話做國語才對啊！如此這般婆婆都有理。我記得大概是在「胡適文存」，看過一段民後在北京召開制訂「國語」會議的記載，當時也曾有過很大的爭執，最後才勉強的通過採用現在的「國語」。

話歸正傳，我上了岸發現與本地人群的語言根本無法溝通之後，爲了生存，又得重新學習另一種語言——上海話了。上海話不用捲舌音，除了鼻音較重以外，在發音系統方面都和河洛話系統大同小異，因此學起來頗爲快速而順利，大約不到六個月光景就能熟練了。

●客家話與政壇生涯

當年在江灣，宿舍裡同住的還有三位台灣同鄉，兩位是北部，一位是南部，都祇會說客家話（也會日語）。由於食宿以及工作都在一起，他們三位自從我的介入

以後，常常很勉強的用日語交談，我坦率的向他們說，我想學習客家話，希望他們交談時用客家話，有需要我才請教他們；就這樣很意外的，我又得到多學習別種語言的機會。當時我那裡會想到幾年後，客家話對我的公私生活竟會派上偌大的用場哩？

我從大陸返台，有兩年的時間在南部服務，在旗山、美濃地方工作時，遇到不少不會說河洛話的客家人，在上海學的客話就大大的發生效用了。

住後我又遷居台東，住在一個村落，其中又是客家居多數的地方，相處起來亦格外的融合親切。正因為這些因素，後來才被推上政壇，幾乎可以斷言我之以一介窮迫的新來移居者，而能在不數年間崛起且一帆風順，潤步台東政壇，此中「語言」所產生的助力非常之大。

我在少數民族多達七種語言的東部一住十八年，儘管我對學習語言的好奇和興趣未曾減退，然對山胞語言竟一種也沒學好，這是我終生的一大憾事。因素固然不少，例如年齡的制約致記憶力減退，發音器官硬化等是甚難克服的阻碍，此外生活時間的緊湊，無法專心也是原因。

台東一縣除了漢人，另有五種不同的

語言，他們分別是：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布農族、雅美族等五族（花蓮還有太魯閣語等二種）。他們之間極少通婚，在光復以前以及以後，約十五年間他們之間及與漢人之間之共同語言，仍然沿用日本話。就是到光復快四十年的現在，那些上了年紀的山胞們，仍然祇能用日語來做互通意思的溝通工具。

●台東縣議會的饒趣故事

這裡我想起四十八年，發生在台東縣議會的一件饒趣的故事。

在一次定期大會中，一位由榮民保障名額選出的張姓議員提出一個議案，這位在抗戰期間失去一隻手臂的退役榮民，振振他剩下的一隻手臂，義憤填膺地嚷著說：他們抗戰八年好不容易打敗了日本鬼子，沒想到到了台灣，竟然在這堂堂中華民國國語發言堂上，看到議員同仁用日本鬼子的國語發言的場面，實在不成體統，令他痛苦不堪。爲此，張議員提議應該禁止在開會時使用日語。

張議員用北京語發言，經秘書再用日語翻譯過後，議堂上立即引起很大的騷動。少數民族議員們激動地表示，若是通過

這動議，他們即將集體退出議會，並且催促我講話支持他們，因爲當時廿七位議員當中，我是唯一不屬國民黨的成員，當然義不容辭；於是我就起立發言說：張議員的慷慨陳詞理直而氣壯，無隙可擊，本人願予贊同，但有附帶條件，本議會會有八種不同母語的代表，北京語、河洛語、客家語、阿美語、卑南語、布農語、排灣語、雅美語，現在議會秘書只有懂得前三種語言者，必須增聘懂得五個少數民族語言的秘書，而且在每一不同語言的議員發言之後，必須一一翻譯爲七種語言，才能充分溝通，這也才算是公平而民主的作法。

當時的許姓議長本來已受組織方面旨意，準備在張議員動議陳述之後，就要憑著黨員多數，而糊裡糊塗表決通過的。經我這麼一說，他也覺得事體嚴重，再也不敢馬虎應付。經過反覆激辯之後，終於要求大家以後儘量使用國語的拜託聲中，擺平了這件棘手的爭論。

●多民族與民主之道

其實，民主政制的運行，像台東這樣一個多民族長年共處的縣份，比起單一的民族縣份，反而能夠得到更理想的成果。

因爲在誰都不是絕對多數的社會中，人們已經學習到自我節制的必要性，而人們也或多或少領教過，稍不經意溜出嘴的一句話，大則會釀成民族間對立的亂局，少則會傷害到對方而引起無謂的爭端。於是大家都知道唯有包容和謙讓才是維持和平相處之道哩！

從政治而言，我很佩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在國家語言方面，處理的非常妥當，只從這一端，就充分表現他的確是一位有高超智慧和有作爲的政治家了。

後記

去年旅行日本期間，獲悉在彼國一般年輕一代學習中國語文風氣甚盛，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往事，當日帝侵華期間，凡派赴大陸各地服務的日本人（非軍人），非但不願意學習當地語言，反強迫中國籍員工背習日語，且每以開革爲威脅。及至戰敗，這些人集中於上海四川路底「施高特路」一帶，擺攤賣零食的時候，才開始猛背幾句上海話，向當地人叩頭求活。

想當年那盛氣凌人的霸氣，看今日頻向大陸人民送秋波，豈真是大和民族之能屈能伸乎耶？！

台灣文學的歷史和個性

《中》

●松永正義／著 ●許南村·周偉康／合譯

光復後，台灣與大陸的知識份子同心協力，共同為克服殖民地文化，創造中國之一員的新台灣文化而努力。

為了理解這幾年間台灣的文化氣氛，有必要介紹一下「台灣文化」這本雜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游彌堅、許乃昌、陳紹馨、王白淵、楊雲萍、沈相成和蘇新等人，以克服殖民地文化、創造中國之一員的新台灣文化為目的，創立了「台灣文化協進會」，並發行雜誌「台灣文化」月刊。協進會曾出版許壽裳所著「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等書，並且舉辦各種音樂會、畫展以及推展中國國語運動等廣泛的文化運動，從而集結了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單就「台灣文化」的執筆而言，即可舉出吳新榮、楊守愚、呂訴上、劉慶瑞、



洪炎秋、劉捷、呂赫若、廖漢臣、戴炎輝和黃得時等人的名字。他們都是在戰前和戰後的困難之中，保護台灣的文化遺產，並且和嗣後七十年代新的展開有着明顯連繫的文化先輩。

不能忽略的是，在「台灣文化」上執筆的有力作家中，除了上述諸人之外，尚有許多從大陸渡台的進步知識份子。許壽裳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許壽裳和魯迅同鄉，從在日本留學起就是魯迅的知友，也是魯迅周邊許多文學青年的最佳保護者。一九四六年八月台灣省編譯館設立，他渡台擔任館長，負責組織和營運的工作。編譯館的宗旨，在於學校教材的編輯、出版以及社會教育和研究，分為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和台灣研究組四大部門。其中「台灣研究組」的負責人，便是擔任「台灣文化」編輯工作的楊雲萍。

許壽裳並且把作家、國學家台靜農、中國古代神話研究家袁珂（袁聖時）、近代中國文學史家李何林、和作家兼俄國文學家李霽野等人，延攬到編譯館來。台靜農和

名著選讀

李霽野，曾在魯迅的指導下組織未名社，李何林也曾有一段時間參加未名社。此外，陶行知的學生，跟隨魯迅學習木刻的美術家黃榮燦，以及法國文學家、「申報」副刊「自由談」主編，曾得魯迅和茅盾等人投稿，領導當時文壇的黎烈文等人，也以新聞記者身分住在台灣。於是以許壽裳為中心，集結了一群和魯迅有深厚淵源的文學家，成為「台灣文化」有力的筆陣。許廣平、田漢等人也遠從大陸投稿而來。一九四七年楊逵等人創辦的「文化交流」，也有許壽裳投寄來的稿子。

以台灣和大陸知識份子間的交流——「文化交流」的刊名，正表現出該刊的宗旨——為基礎，這些雜誌一方面重新接受了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果實，另一方面也企圖將日據下橫遭破壞的台灣固有文化加以發掘和復活起來。在這樣的志向中，確實存在着克服前述日本殖民統治所造成之傷痕的可能性。但是非常不幸，這個可能性却過早地受到壓制了。

腐敗官僚到「劫收」。糧食匱乏、通貨膨脹、厲疫橫行，使台灣居民對於光復的歡欣，急轉為憤怒和失望，激生了「二二八」，進步知識份子不分省籍都遭鎮壓。

台灣人民起初曾以熱情的歡呼聲，迎

接了以台灣省行政長官身份來台接收的陳儀。但是，和陳儀一起來的，是一批軍紀

紊亂、素質低落的軍隊，腐敗官僚和貪嗜利權的無賴。凡沒有直接遭逢戰火的台灣物資，都成了他們劫掠的目標。他們開始獨佔日本人留下的各種企業和機關，以「受到日本奴隸教育毒化」為由，從這些企業和機關中把台灣籍工作人員驅走殆盡。對待台灣人民，這些接收大員宛若新的統治者。這種腐敗的構造，在當時全中國境內，比比皆是，而且也是擁有強大武力的國民黨却不能不敗於中共的理由之一。然而，這種腐敗與民衆的對立，在台灣，卻同時以本省（台灣）人與外省（一九四五年以降大陸來台人士）人對立的形式表現出來，後來便使這個問題益趨於複雜化。由這種腐敗統治所變本加厲的嚴重糧食匱乏、惡性通貨膨脹、衛生制度崩潰，導致霍亂、鼠疫的橫行，使台灣居民對於光復的歡欣，急速地幻滅而轉成憤怒和失望。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七日，警方在取締私煙時射殺了一名台灣人。翌日激昂的台北市民起而為此舉行抗議遊行，官方以機槍掃射回報抗議群眾，造成許多傷亡。以此為契機，引起了全島的反政府暴動。這便

●陳儀



是在戰後台灣史上留下深刻傷痕的「二·二八事變」的開端。台灣人民佔據各地行政公署、公營企業，並且向政府提出制訂省自治法、起用台籍人士、言論與結社自由等三十二條要求。但陳儀却以死者將近一萬人的鎮壓，來回答這些要求。許多台灣人民在抵抗中被殺、被捕，有人逃向中國大陸，有的緘口封筆，以終其生。

陳儀的鎮壓，並不止於對付台灣人。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夜，許壽裳被人用利斧砍殺至死。由於當時許壽裳已轉往台灣大學，一面撰寫「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等文章，一方面對當時的「統治口殊筆伐」，所以他的慘死無疑是陳儀的特務所下的毒手。前舉藝術家黃榮燦，據說也被處死刑。李霽野、袁珂

、李何林等人逃回大陸，留下來的台靜農和黎烈文，則在台灣大學內過着學究生涯。關於黎烈文的生與死，最近巴金有追悼他的文章（巴金：「探索集」）。

一九四九年四月，國民黨在大陸的敗績已呈決定性，蔣介石爲了萬一的準備，派遣陳誠和蔣經國來台灣。五月發布戒嚴令，逮捕了成千上萬的人，不少人被處死刑。此戒嚴令却一直延展到今日，成爲一般公民可以適用軍事審判的一個依據。一九四九年作家楊逵被捕，在綠島的監獄中關了十二年。在這樣的鎮壓下，不論是台灣的知識份子、進步的大陸知識份子，都變得噤若寒蟬了。而「台灣文化」也變成研究台灣史的刊物，失去了當年的志向和熱意，終竟不能免於停刊的命運。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積極支持國民黨，使國民黨得以鞏固統治基礎，遂行排他性的一黨獨大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蔣介石入台灣，形成「蔣」的起初權力的基礎頗不安定，但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解救了蔣氏政權。美國立刻宣告台灣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巡視台灣海峽，嗣後積極在政治上、經濟上支持國民政府。但這個蔣氏

政權，是由恐怖政治所支撐的看似壯偉而實爲「蔣」的存在。

蔣氏政權的政治體制，是依據一九四七年一月頒布的「中」民「憲法」。以下試觀其梗概。

首先是由各縣市選出的代表所組成，代表全體國民的國民大會，掌管總統、副總統的任免及有關修改憲法的事項。國民大會選出總統爲國家元首。總統之下設有相當於日本國會的立法院，相當於內閣的行政院，監察國政，擁有公務員彈劾權的監察院，司法機關的司法院，審查公務員資格的考試院。其中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由選舉產生，行政院長、司法院法官、考試委員在立法院或監察院的同意下，由總統任命。

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選舉，一九四七、四八年曾經在中國全土舉辦過，其後中國全土的選舉也就變成不可能了，一次也不會改選，當時的成員一直保留到現在（一九六九年以後開辦增額選舉）。雖然號稱是當初的成員，其實只是一些跟隨蔣介石前來台灣的人而已，以他們代表全中國作爲「骨架」，從而在法律上支持總統的「蔣」。

而且根據憲法，總統的權限必須受立

法院制約，但藉著一九四八年制定的動員勸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擺脫了這種制約，可以自由地在戒嚴令下行使幾近無限制的權力。

在中央政府下面，還有地方自治體台灣省政府。省主席爲官派，其下的各級首長和台灣省議會議員分別自一九五一年、五四年起經由選舉產生。然而國民黨以外的候選人一直受到有形無形的壓迫，且橫遭作票等露骨的選舉干涉，因此未能迎合政府意向的候選人要想當選，也就難上加難了。

政黨方面，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只是名存實亡，實質上是國民黨的「蔣」，除此之外任何政黨的組成在事實上都是不被允許的。因此，是否能組織新黨，遂成爲反體制運動的一個焦點。

以外省人爲主的國民黨控制了政治、經濟的主要部分，反國民黨高壓統治的台灣人因而多半表現爲反外省人意識，進而醞釀成否定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

如前所述，台灣民衆已經完全被排擠出中央政治的層次，在地方自治層次上也徹底遭到國民黨「蔣」的壓制。支撐這種「蔣」的當然是特務的「蔣」政治，名義上國民黨政權是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政府，不久就

要打回大陸去，這種所謂的「反攻大陸」基本國策，正是支撐其「蔣」的「全國政權」的根據。並且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平條約、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伴隨而來的日美援助，對這種體制的批判，全都被視爲有利於共產黨而遭到鎮壓。

台灣人民對這種「蔣」政權的反抗，多半表現爲「反外省人意識」，也並非毫無根據。外省人控制了政治、經濟的主要部份，而且在這幾年間流入台灣的外省人——由「蔣」政權及其附隨的官僚、政商、無紀律的軍隊、欠缺生活基礎的難民等構成——多達二百萬人。台灣的人口只有六百萬，戰敗返回日本的日本人五十萬，從這些數字加以探索，也就不難想像那裡所引發的社會摩擦之大了。此外二·二八的

反政府暴動形態上是反外省人的，英美內部也有捨棄「蔣」的國民黨想在台灣製造反共獨立政權的意向，台灣人之中也有與之互相呼應的動向，這些因素在皆導致蔣氏政權視「台灣人」意識爲危險之物而極力排斥。如此醞釀而成的台灣人與外省人的對立，遂在台灣人之間產生了可姑且稱之爲「台灣民族主義」的心理傾向，否定「中國」，甚至包括自己內部的「中國」。於是一九三〇年代出現的中國和台灣在民族主義上的分裂，非但沒有在前述的「台灣文化」的方向上得到克服，反而以增幅的形式愈演愈烈了。

魯迅等三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均被否定爲左傾文學，遭到查禁。台灣作家無從承續文學傳統。許多接受日文教育的老輩作家受到鎮壓和語言障礙，因而折筆。大陸來台作家則流於無根。

而且魯迅等對國民黨採取批判態度的作家，以及滯留大陸的作家——亦即主要的近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全部遭到查禁，尤其是三〇、四〇年代文學均被否定爲左傾文學，因此台灣的作家遂從主要的近代文學傳統被人爲地切斷了。如此一來，無論是從殖民地時代的文學傳統、或大陸的文學傳統，皆遭到內在的、外在的徹底切斷，並且對未來前途的發言也受到鎮壓封鎖，這種狀態對文學而言，實在是無比的困厄。

但是困難不僅如此，對於一向被迫接受日文教育，以日文寫作的台灣作家而言，用國語（白話文）寫作也帶來超乎想像的困難，光復後，楊逵爲了便於台灣人閱讀，把「阿Q正傳」譯成日文，附上中文原文出版的事實，嘲諷地陳述了日文的浸透力和台灣脫離中國的實態。楊逵正式以中文寫作，是在綠島監獄修習的結果；同樣的作家鍾肇政最初是用日文寫作再譯成中文，漸漸變成以日文思想以中文寫作，最後好不容易才能用中文思想和寫作。日常以台語交談，文學創作時却又另當別論，語言障礙造成的二重沉默底逼迫，許多作家因而折筆。

●吳濁流



再就大陸來作家而言，大部份著名作家皆留在大陸，而來台者又都無法自由寫作。而且他們也被截斷了和故鄉大陸的聯繫，不僅和大陸的文學脈流斷絕，同時又因為外省人的身分，也和台灣民眾切斷了連結，在二重的意義上，遂淪落於失去認同的無根的境地。

於是五〇年代成為台灣文學史上一個非常大的空白時期。在現象上填補此空白的，是喧囂的反共御用文學，是大陸的鄉愁文學，以及品質低劣的通俗小說等等。

在這個時期活動的大陸籍作家，有謝冰瑩、蘇雪林、陳紀澄、王藍、彭歌、和稍遲的姜貴等人。此外掌管軍中思想工作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也戮力於文藝工作以作為思想工作的一環，利用「軍中文藝」雜誌的發刊（一九五四年——）和有獎小說的徵選等等，在軍隊及其四周製造了許多作家。他們被稱為「軍中作家」。總括說來，這些文學被認為是在反共的框框裡，脫離了台灣和大陸現實的一種不結果的花架，但是當時文壇之牛耳的正是這些外省作家。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六年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夏濟安（江蘇省人）創辦了「文學雜誌」，一九五八年政治大學中文系

學生尉天聰等人接辦「筆匯」的編輯，從而以大學文學系的師生為中心，文學創作的氣運開始萌芽，相對於軍中作家，被稱為「學院派」的他們，否定以文學作為反共宣傳工具的手法，顯示了純文學再生的胎動。雖然這往往陷入和現實無緣的藝術至上主義，但終究脫離了「反共的現實」重新投向文學，功績不可謂不大。

在這段期間台灣作家之中，「亞細亞的孤兒」作者吳濁流完全和文壇脫離，埋首於文學的創作。日據時代曾旅居北京的鍾理和，一九四六年返台後，一直在貧窮之中專注於描述農民貧困的樣貌，一九六〇年終於在悲苦的生活中死於結核病。鍾肇政靠著自修不斷地利用中文習作和翻譯，克服日語的障礙，建立了六〇年代創作活動的基礎。他們全都孤立于文壇之外，但是却一點一滴地繼承了台灣文學的傳統，並且薪傳給下一代。

此外，承繼台灣省編譯館系統的省文獻委員會及各地的文獻委員會，也有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參加，繼續台灣歷史和民俗的研究，成為過渡到七〇年代的橋樑。其中一九五四年「台北文物」（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所作的日據時代新文學運動特集，執筆者網羅了日據時代具有代表性

的文學家，成為同期台灣文學史研究的根本資料之一。從以上的苦心經營之中，感受到台灣知識份子和文學家那種強勁的抵抗精神的，相信不只筆者一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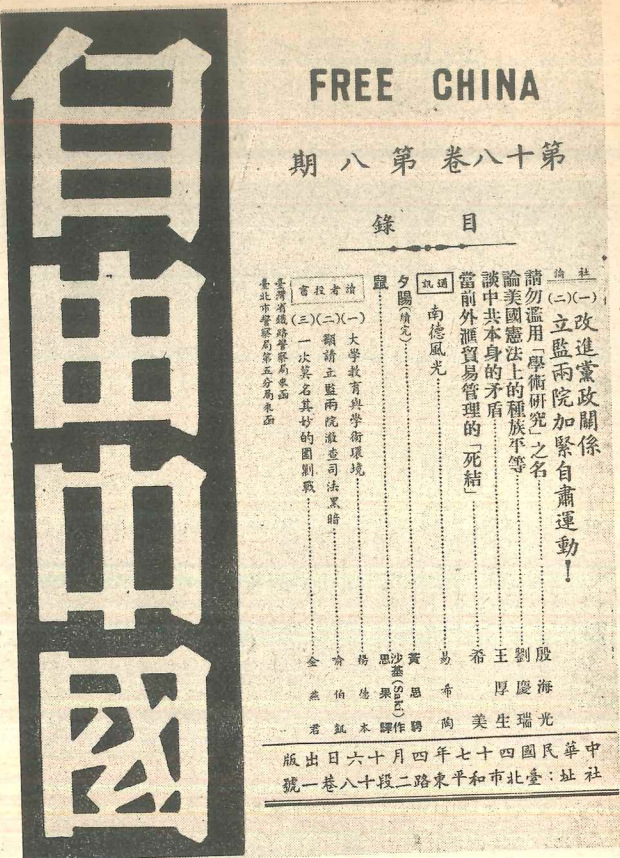
就外省文學家而言，軍中作家和學院派的形成，以及台灣文學家孤立的苦心經營，這些正是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大概的構圖。

國民黨來台，實行土地改革，朝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前進。由於土地改革，以地主階層為中心產生強烈的反國民黨情緒，成為獨立運動的基礎。

國民黨一方面作為反共尖兵，得到美國的支持，一方面對內又藉著一連串的土地改革謀求社會的安定，朝著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前進。一九四九年實施「三七五減租」降低佃租，一九五一年將部份公地放領給佃農，一九五三年根據三民主義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把地主的土地放領給佃農。共產黨在大陸上□□的理由之一是土地改革，以此觀之，這些措施大體上可說是得當的，不過其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台灣的地主並不在國民黨的權力基礎之內。也因此以地主階層為中心，產生強烈的反國民黨情緒，成為獨立運動的一個基礎。但無論如何，如此開發出來

然而站在這種經濟發展上的權力機構，却是受□□和□□支撐的、具有陳舊封建體質的東西。這是和資本主義發展所要求的合理性完全矛盾的，隨著美援流入的西歐自由主義思想，便成為批判此權力體質的合適基礎。

在這之前，李萬居（台灣省人。抗戰時在大陸活動，於重慶參與台灣接收準備工作，一九四七年創辦「公論報」，是唯一台灣發行的民營報紙，對國民黨展開批判）、高玉樹（一九五四年擊敗國民黨候選人當選台北市長）、和嚴厲批評國民黨的省議員吳三連、郭國基、郭雨新等人，自一九五七、五八年起以地方自治研究會之名，出現集結的趨向。一九六〇年這些台灣政治人物和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國」集團聯合起來，企圖組織新黨對抗國民黨。國民黨的元老雷震，自一九五六年起在「自由中國」（一九四九年胡適等人創刊）雜誌上，批評反攻大陸等等，站在反蔣親美的立場展開徹底的國府批判。□□對於國民黨反對派和台灣人的結合感到危機，於是下令逮捕雷震，粉粹「自由中國」，並且在鎮壓之末奪取「公論報」。新黨運動於焉崩潰。



●反蔣親美的「自由中國」。

農民生產意願，也使得支撐龐大軍費的□□與社會的大致安定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又以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正式化的美援為槓桿，推進工業建設，以充當土地改革之抵償移轉的公營企業為中心，進行土著資本的累積，從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遂得到大致的經濟穩定。到了六〇年代又在這個基礎上，以華僑資本為首積極地引進外資，推動產業

的國際市場化。六〇年代安保條約修訂後，取代美國的日圓借款以及越戰的特別需產業，更加速了這個趨勢，終於在六〇年代後半創造了世界矚目的急速經濟成長。

隨著美援流入的西歐自由主義思想成為批判國民黨的武器。「自由中國」站在反蔣親美的立場對國民黨展開徹底的批判。



大革命的前夜

■ 電影文化

——評介
「南京的基督」

李健文

● 一個苦難時代的縮影

「南京的基督」原是日本大文豪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原著是以一個日本旅行者的觀點來描述信仰基督的中國農村女子金花。金花因為父病而淪入妓院，不幸感染梅毒後，由於心地善良而不肯傳染給別人，有一天來了一個洋人，臥病在床的金花竟誤認為是基督降世，來醫治她的惡疾而獻身。嗣後金花身上的梅毒痊癒了，但那個假冒基督的洋人原來是路透社的記者，却因為感染了金花的梅毒，最後病死在上海的旅社。

本片導演王菊金和編劇林清玄將原著更動甚多，甚至完全脫離了原著的面貌。根據林清玄的講法，是因為「芥川原著沒有足夠的素材，它只提供了幾個人物，對

於中國的背景與情況沒有真正的關懷，找不到堅強的立足點。」

在劇本中，金花變成了小鳳，增加了男主角祥子，地主、佃農、鴉片煙館等情節，並且把時空放置在民國初年列強環伺、軍閥混戰時期的蘇北。

本片透過男女主角祥子及小鳳的悲慘遭遇，呈現出封建經濟體制及列強帝國主義對當時中國民衆的雙重壓迫。全片始終在這兩條不容忽視的歷史經緯上，起落發展，極具強烈的控訴性，這也是本片最撼動人心之處。



● 飢餓邊緣的中國農民

片子一開頭，是一段戰亂下中國百姓的逃難流離圖（紀錄片），王菊金的這項安排，似乎有意在觀眾落座不久，就猛然拉進到那個似乎遙遠、却又實在的悲慘時代；而在片尾，王菊金又引用了一段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導演強烈的初始意圖。小鳳與祥子的戀情，在頭尾這兩段紀錄片的烘托下，有了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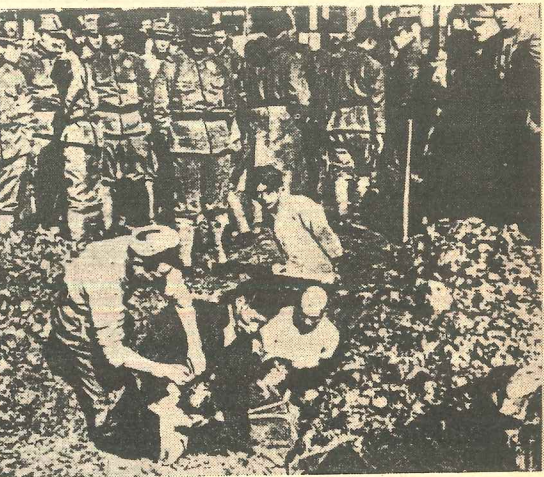
能令人心悸欲泣的血肉了。

接著，敘述小鳳的出身背景——民國初年蘇北的一戶貧苦佃農家中，老父長年臥病在床，因貧窮而脾氣暴躁的老母，整日辛勤工作，某日家中無糧可食，小鳳只得在夜晚到白天自己耕種的田中偷割麥子充飢，不幸被地主的兒子高少爺發現而慘遭強暴，青梅竹馬的男友祥子要高少爺娶小鳳為妻，却在爭執中誤殺了高少爺。

在當時中國農村封建的經濟剝削體制下，軍閥政客們提供了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權，而後者也在經濟上對軍閥政客們做出相對的奉獻，狼狽為奸，互為奧援。結果處於最底層的廣大中國農民就要接受最直接而無情的壓榨。像小鳳一家這樣的佃農，終年牛馬一般辛勤耕作不屬於自己的土地，却僅能以稀薄的米粥糊口，仍不能免於飢餓的威脅。地主高少爺強暴小鳳後，竟用六包米打發了事，片中無能為力的鄉民們，正反映了農民生存的無奈及地主階級的跋扈。

在封建經濟的剝削體制下，地主階級除了用有形的政經力量壓迫農民外，還透過無形的封建道德力量，從心底深處去麻痺被壓迫者的反抗心理。當小鳳的母親要求小鳳前去偷割自己種的麥時，小鳳表現

出極大的為難及羞恥，因為這是「偷」，而「偷」是不好的、是罪惡的；同樣的心理，表現於小鳳偷麥被發現時的慌張恐怖，及被強暴後不敢聲張，顯見小鳳在饑餓及道德觀之間的掙扎無奈，人殺人固然是犯罪，剝削制度大量無聲地殺人，罪行是不是更大呢？「偷」是罪惡，而逼人為了生存而去「偷」的體制是不是罪惡呢？本片成功地表現了封建道德如何以偽善的面具，成為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有力工具。



很諷刺的是，地主階級却不必受這樣的封建道德約束；例如當祥子要求高少爺娶小鳳為妻以示負責時，高少爺的回答竟是：「她不配！」當然，佃農的女兒與地主少爺之間的距離，是天壤之別呵！

導演及編劇在片中靈活地運用了一些小人物，像是地主的走狗，打圓場的村長等，活現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村的真實面貌及生產關係。天災及人禍，使貧窮及苦難，成為中國農民的普遍遭遇，從生至死，總在屈辱中，睜著令人心碎的眼光，環視這一切不可理解的苦痛！

最後，片中小鳳的父親去世後，小鳳為了醫母病，而賣身至南京的妓院。在這之前，祥子早因殺人而避禍南京，憑著精壯的身子拉人力車，出賣氣力過活。

帝國主義的壓迫是多樣性的，除了軍事力量外，最顯著的就是經濟上的壓迫，列強透過租界、通商口岸，慢慢吸乾了中國的血。祥子在吃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去嚐了那最後的毒藥——鴉片，而走向滅亡之途，對於一個流亡到城市的中國貧苦農民，或也是個宿命又無奈的結局吧！片中鴉片館的場面，令人悚目驚心！透過電影的描寫，我們真正感受到鴉片曾經對中國的巨大毒害。

雖然本片對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有強烈的控訴，但是對於帝國主義如何造成中國農村的極度貧困化，以及這種貧困化如何影響了像小鳳祥子這種農民的一生，並未有清晰而具說服性的交待，未免是美中不足之事。

● 帝國主義下的人肉市場

民國初年中國沿海的城市，是東西列強的競技場，帝國主義挾其先進的科技，豐富的資本及軍事力量，自由「進出」中國，除了掠奪農工原料，摧殘中國民族工業外，並以借款、賣軍火等方式，左右中

● 天國不是我們的

出身在貧農家庭的小鳳，飽受封建地主的壓迫與折磨，在偶然的機會裏信仰了基督，終其一生而不悔。她的信仰是真實的；她在貧窮裏祈求賜福，在哀苦裏祈求喜樂，祈求著那幾乎遙不可及的基督的救助，但是基督終沒有解救她走向死亡的命運。在她死亡前用井水淨身，仍然滿懷希望能夠「洗去一身的罪孽」。究竟她何罪之有？真正的罪人又在哪裏呢？這或是編劇要讓觀眾回去思考的一個課題吧！

片中也偶而出現一些令人深思的鏡頭，像是在農村的教堂前，一大群農民，張



● 民初流離失所的難民

國的政治；勇於內鬥的軍閥們乃成為他們最好的棋子，進而嚴重摧殘了廣大中國人民的生計。駐軍、租界及洋行，便是列強魚肉中國最具體的象徵，而鴉片則是他們意欲癱瘓中國最得意的商品。

小鳳自賣身到妓院後，憑著美貌與楚楚憐人的儀態，很快地成為南京城的名妓。然而，她日夜思念的，仍是早日結束賣身契，重回鄉下與祥子共創未來。而祥子也懷著同樣的心情，日出晚歸，賣力地拉人力車，「不知跑破了多少雙鞋」，同時四處找尋著小鳳的下落。這對情人，終於在南京見面了，祥子忍著痛苦接受了小鳳已成為妓女的事實，兩人在生活與精神的煎熬下，共同期許著美好的未來。

在當時帝國主義勢力籠罩下的中國城市，統治階級除了封建地主、官僚、軍閥，還有少部份依附在外國商行的買辦階級，除此之外，就是一般破產的農民。他們進入城市後，只能從事廉價勞力的工作，像是片中的人力車夫、丫環、保鏢或是傭工等等；而女性有一條普遍而悲慘的出路——娼妓。小鳳及祥子就代表了當時農民進入城市後的生活型態。

片中接著敘述小鳳不幸染上梅毒，這在當時是無法治好的惡疾，雖然在妓院老

大著眼，瞪著桌上的牛奶，而無視牧師的佈道；像是到妓院大談柏拉圖愛情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基督徒學生。

個別的看，宗教或神職人員（如片中的牧師），容或有許多正面意義，但是透過小鳳及祥子的遭遇，我們相信基督的恩典，是不可能出現在那樣無望、陰霾時代下的中國貧農身上的！天國對他們來說，或許只是種精神上的鴉片吧？

● 結語

「南京的基督」像是一個時代的橫剖面，藉著男女主角走進破滅的網罟過程中，讓我們看到了整個苦難時代的真貌，與其說我們被這部電影感動了，毋寧說是小鳳和祥子的苦難，必然成為中國人民向歷史奔躍的最大動力的事實感動了我們。被壓迫的人民終究要起來反抗的！

讓我們向導演、編劇及演員們致敬！「南京的基督」擴大了我們的歷史視野，雖然它仍存在著許多缺點，但它必將為八十年代的國片，開拓一個被人們長期忽略的無限寬廣的世界。

台灣社會問題與

社會運動(下)

江海晏

●不要先打大老虎， 但也不能老打小蒼蠅

蕭：這就必須小心了，而且必須講求策略。舊金山有一位消費者聯盟的公共利益律師曾於三年前到台灣與我們討論，提供若干經驗。總結他們的經驗，我們得了一些啟示：要有先後次序，不要先打大老虎，但也不能老打小蒼蠅。絕對要避免讓自己在打大老虎之前就被老虎吃掉了。例如，我們免費贈送試驗劑試化粧品內的含汞量，印送購買須知……。這些都是很實際的問題，又沒有特定的打擊對象，就好比匍匐前進，這效果還不錯。

記：早年呂秀蓮同台提倡新女性主義，籌組「保護妳」專線時，她所受的阻力似乎比你們大多了？

蕭：她比我们早了五、六年，當時台灣未曾出現太多「突出」的婦女不幸事件，社會條件還不成熟。七八年至八〇年之間，台灣發生了太多消費者受害事件，加以七四年以後的台灣政治和社會都轉型成較開放，所以社會條件對消費者運動有利。此外，另有三個原因有利於消費者運動的順利展開。第一，我們表面上儘量不與廠商敵對，我們的口號是「保護消費者便是保護優良廠商」。一開始味全食品公司和三商百貨各捐了一百萬元給我們

當「種子基金」。味全請輔仁大學的一位教授代表出任董事，三商的董事長並被選為我們的副董事長。第二，消費者運動是由青商會成員所發起的。這批中產階級擁護台灣長期的安定與民主，在台灣有雄厚的基礎，政治立場還頗能見信於執政當局。第三個原因是新聞媒介也主動參與消費者運動。我個人認為大眾傳播本身也應負起社會責任，所以就建議在一開始籌備時就主張是「五面代表」，包括廠商、消費者、政府、學術界和大眾傳播。傳播界也應是主角，而不是被動的「報導」，各報乃派記者參加，新聞報導非常踴躍。

社會運動

寧：我今年二月初為EDB（二溴乙烷）

事件回台時，對消費者基金會的新聞網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是他們大力支持是很難推展開的。我也曾和柴松林先生談起消費者運動與當年呂秀蓮婦女運動的不同命運。柴先生認為消費者運動成功的幾個主要因素是第一，消費者運動的參與者都是成名，

有地位的專家、學者，而呂秀蓮當年形象、關係尚未建立並且孤掌難鳴。第二，動機要單純，沒有政治野心。第三，不與任何人有金錢瓜葛。第三點似乎與蕭新煌先生剛剛所提的百萬捐款似乎有些出入。

蕭：三商、味全所捐的是種子基金，而且明言不可干涉基金會的方針。幾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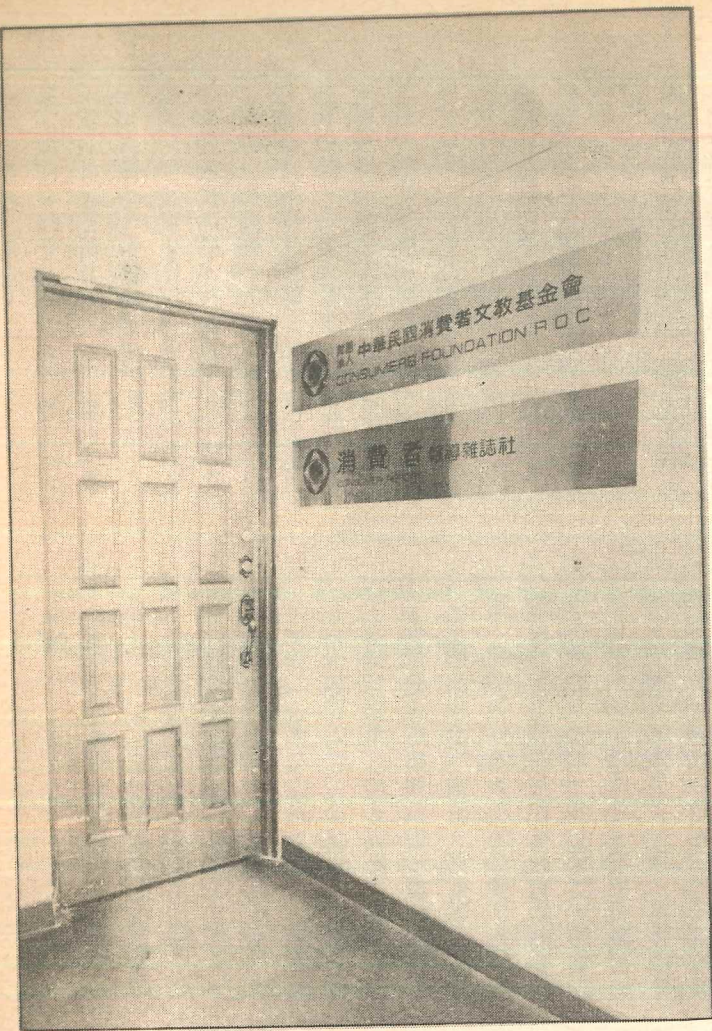
的經驗證明這是辦得到的。有錢才能辦事，我們辦活動時也會受捐款或儀器，但與政府的宗旨並不違背。但「消費者報導」却絕不接受捐錢或廣告，完全靠消費者支持，這樣才能維持言論的公正和公開，目前已有兩萬多訂戶。

記：當年呂秀蓮所遭遇到的阻力是否與老毛鼓吹「女子也能撐半邊天」有關？

蕭：我不甚清楚，但我覺得時機與策略恐怕佔的成份較重。目前台灣的社會較開放，所以李元貞女士（「婦女新知」的創辦人）辦的活動很多人參加。此外李元貞女士採取的姿態較低，儘量從日常生活中提高婦女的「自我認識」，不像呂秀蓮當年握着拳頭高喊：「女人！女權！」。這一點我認為是明智的策略。在台灣搞社會運動必須先從低姿態開始。

記：消費者基金會目前有多少成員？

蕭：基金會有三十三位董事，每一位董事任期不超過兩屆。辦事處設在仁愛路三段，有秘書處和出版部。專職人員有十幾人，負責申訴、檢驗、追蹤，出版。我們還有義工來協助。我們前後招訓了三批義工，第一批約四十人，



多為公務員，在職人員和家庭主婦。第二批亦有四十人，主要是學校教師。第三批義工招考時，我已離開台灣，不甚清楚。希望能透過這些種子，在社會、學校發生作用。例如我們會舉辦舊物義賣活動，全由義工一手設計、辦理，提高他們的參與感。真正負起基金會推動工作的是秘書處，是靈魂和中堅。秘書長是李伸一律師、副秘書長是劉炳森先生，董事會是決策機構，董事長則是對外代表。基金會成立以來，所有的董事都是義務職，沒有分文到口袋，這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個人覺得基金會在今後如果想在組織上突破，應要慢慢講究企業化經營。

●環境運動的兩條路線 ：浪漫路線與強硬路線

寧：我回台時曾見識了消費者基金會義工工作的情形，幾萬份雜誌的發送，三兩下便清潔溜溜。這種草根性的發展是其他運動少見的。例如我印象中的台灣環境運動，知識份子只停留在文化層面，甚少與草根結合讓更多人參

與，以致整個運動的幅面很小，缺乏組織。

蕭：台灣與「環境」有關的組織目前有三個，一、「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這可以說衛生署的外圍組織；二、「中華民國環境衛生協會」，這是工商界的美容師，由王永慶等支持，另一個是「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由張豐緒、陳履安等人發起的，前兩者以公害防治為主，後者以保育為主。另一個則是由黃順興創辦，現已停刊的「生活與環境」雜誌，它是以「反公害、反污染」為突出的目標。若以路線區分，着重自然環境保育的稱為「浪漫路線（SOFT LINE）」，如關心紅樹林、伯勞鳥事件。其中貢獻最大的是文藝界的幾位女作家。再其次才是學術界，其中以改組之前的東海環境科學研究中心為首，出版了幾本有關生態的書。台大的環境工程研究所近年來也很積極。不少學者報章雜誌上發表通俗性的文章，呼籲生態保護。

着重公害防治的路線可稱為「強硬路線（HARD LINE）」。在開發中國家，我認為反公害問題是特別迫切需

發揮「強硬路線」代言人的功能。

記：一個開發中國家往往為了求經濟成長而恣意破壞自然環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公害。假若民衆的有關環境公害的知識豐富些，反公害運動可能比較容易推廣。我曾讀過廖名鴻所翻譯日本作家有吉佳和子著的「公害與你」。書中將洗潔劑、防腐劑、多氯聯苯等污染的嚴重性，用很通俗的文字介紹給讀者，不知台灣能否加強這方面的教育？

蕭：「公害與你」這本書出版之後，我曾寫過書評，並建議用它當消費者手冊，書評資料很豐富。我也曾做過一個調查，百分之六十的民衆認為環境公害問題在台灣是很嚴重的。只是知道是一回事，能否組織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記：多數人比較容易察覺「顯性」的問題，如阿米諾諾酸的臭氣熏人，養殖魚被廢水毒死等。但許多「非顯性」的環境問題，瞭解的人便較少了。例如使用有螢光劑的洗衣粉洗碗筷，結果將致癌性的螢光劑食入體內。或是過量使用洗潔劑，使下水道內藻類大量繁殖而廢水排除不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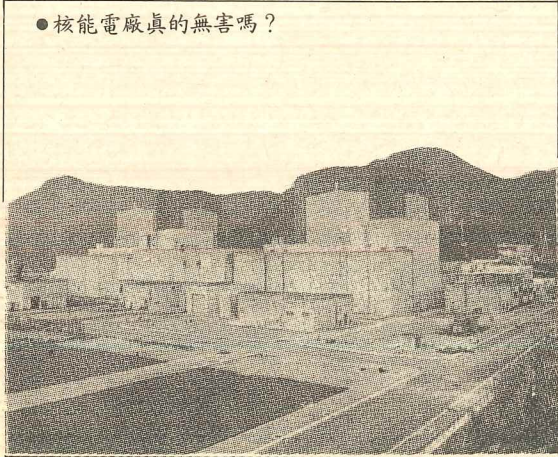
●台灣民衆對核能 發電廠缺乏認識

蕭：這是教育問題。消費者已在注意這個問題，例如我們曾分析洗潔劑，打破「泡沫多便是好」的神話。不過民衆的習慣的確仍是一個嚴重問題。以台灣的核能發電廠為例。我曾做了一千四百個樣品的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六的人不知道台灣有核能發電廠。

「對核能發電廠的瞭解有多少」，回答「很少」的佔百分之廿三，「一點點」，百分之卅八，「全不知」佔百分之卅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已有把握瞭解。「核能發電有無危險或安全顧慮？」，百分之四十點六回答「不知道」，「不危險」的佔百分之廿三，認為「根本不危險」的有百分之五點八，換言之，表示「不危險」和「根本不危險」有百分之卅。表示「危險」和「很危險」的加起來也是百分之三十。這證明我們的核能教育是完全失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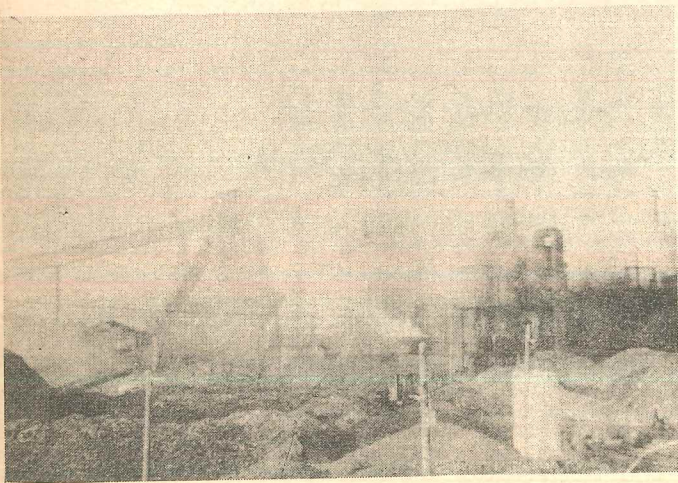
政府和台電花錢做了許多廣告，又強調核能的正面性，卻沒讓民衆真正

●核能電廠真的無害嗎？



要的。在台灣因為缺乏組織與秩序的協調，一直沒有適當的申訴管道，於是近年來有不少與公害有關的，例如高雄林園的阿米諾諾酸事件，桃竹苗地區的火力發電廠以及各地的垃圾戰。如果有知識份子介入，那麼就有可能轉向法律訴訟的途徑。像彰化花壇事件，因為有專攻公害法的劉毓卿律師參與，所以能在初審獲勝。「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在八十二年六月也成立「環境委員會」，希望能在今後逐漸

瞭解核能。我的調查中另一個問題，「你認為核能發電是否有必要？」回答「不知道」佔百分之卅，「很有必要」佔百分之廿五，「有必要」佔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五認為「有必要」。與上面問題連接起來便形成很有趣的現象——對核能的不瞭解，有無核能亦不知，却認為有必要。這



●台灣公害日趨嚴重

種無知却又嚮往的態度實在要不得。我並非堅決反對核能發電，但是政府有責任讓民眾瞭解真象，台灣北部白沙灣的核能發電廠旁蓋了華美別墅；屏東南灣，在通往核能電廠公路上，沿途蓋了許多商店住宅。商人們投機，以為台電的建設，將來對土地增值必有大發展，但對核能發電廠却不考慮其安全問題。我認為理想的方式是——核能電廠方圓數十公里內，政府通知民眾遷居。若不遷居，政府應當負擔某些費用。但是在台灣，台電的總經理却一味反對承認核電廠有絲毫的安全顧慮。

寧：在這些環境、公害問題上，知識份子最多寫寫文章，却對運動組織沒有信心，不敢投入。

蕭：知識份子的負擔太重了，該做的事情也太多了。許多自然科學專家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好，寄望他們能站出來。許多人已被吸收至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我期望他們能從目前的浪漫路線轉至強硬路線。中國知識份子使命感很重，却不肯自小處着手。消費者運動剛開始時，一些參與的學者曾被取笑「知識份子去搞這種柴米油鹽的事」。

。」等運動展開後，大家才意識到柴米油鹽是很重要的。

●消費者運動終究要走入政治層面

寧：台灣的社會問題很多，黨外却没有注意這種草根性發展的問題，多數是自已關門窮過癮。

蕭：黨外近幾年的發展是與社會有些脫節的，他們訴求的標的與一般社會需求的目标有差距。我認為黨外運動今後若想要有發展和突破，應該確認幾項社會問題做為黨外呼籲的主題，而不應該只着重高層次的規範性探討。在去年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中，就支持黨外的總票數而言，黨外並未失敗，失敗的是黨外自己的組織與策略。這次結果，就議會政治而言有幾個缺點，第一，黨外當選人減少，第二，黨外當選者都是新手，對議會運作不熟悉要重新學習，很容易陷於議會程序的泥沼，並且也較易被執政黨擺平。黨外一定要注重社會問題才能廣開票源。

寧：國民黨一向有因人廢言的習慣，黨外

若參與社會問題，是否反而會阻礙社會運動的發展？

蕭：過去幾年，黨外不注重社會問題，所以消費者此一社會運動，能夠較單純的發展。但消費者運動將來一定會慢慢走入政治層面的。但是我個人的意見是，並不是要黨外的成員馬上就加入這種運動，而是希望黨外先在議會中透過議會政治支持並監督政治。

寧：提到消費者的政治路線，目前消費者基金會的政治價值很高，假若你們有人參與選舉，可能得票很高。

蕭：消費者基金會內的董事，規定五年之內不能競選公職。這就是中西政治文化性不同的地方，中國政治文化總以為你一定是政治野心才會要出來搞社會運動，但是在西方就一定要透過壓力團體。

寧：我認為發展運動最好是單一事件，如果要談社會問題，最好不要涉及黨外。我這次回台談EDB的問題，便是因為沒有透過黨外的管道，反而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注意。

蕭：就消費者運動或是環境運動本身的發展着想，我並不希望黨外立即將「政治」色彩帶進來。在開始這幾年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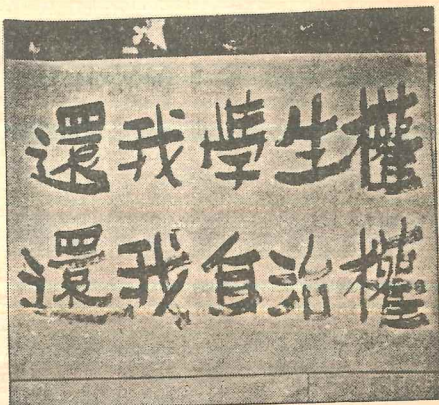
最好開發自己的新領域做為「主題」。但關心社會問題批判社會問題却是不可避免的條件。

記：楊祖珪去年競選立委時，發表政見都是有關社會、環境問題，儼然是台灣的綠黨。消費者基金會所呼籲的問題若和這些人相同，會不會被懷疑和黨外掛鉤？

蕭：楊祖珪過去並沒有從政經驗，這次又是匆促參選，能獲得兩萬多票也是很不錯的成績，這也可以顯示社會問題受關心的程度。我曾分析三十年來立委質詢，自一九七〇年以後，環境、公害等社會問題已不斷地被提出討論，尤以增額立委質詢最多，而且還不論黨內、黨外。所以我不以為消費者基金會將被以為與黨外掛鉤。事實上，基金會對社會問題的覺醒不是比黨外更早嗎？關心社會問題並不是國民黨或黨外的「專利」！而是整個社會的義務和責任。

●國民黨當局誤導學生運動

寧：最近「民主台灣」連載一篇文章談台



灣的學生運動。

蕭：我只看了上半部，這方面的文章已不少，討論的範圍也愈來愈廣而深，我覺得是有意義的一個方向。

記：最近討論學生運動的文章的確不少。台灣的龍田出版社在七九年出版了「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由丘為君等編著。夏潮論壇自第九期（八三年十月號）起也開始連載由李綠著的「台大學生運動卅年回顧」，可惜只刊載到第三部份便無疾而終。

蕭：保釣運動後所引發的台灣學生社會服務熱潮其實是被有意扭曲的，原先的

學生運動是比較政治性的，準備向社會和政策開刀。但當局不願事件擴大，便使用種種方法，將政治的潛在性轉向社會服務。原本的社會服務是很有批判性的，宣稱向社會進軍。做了農村調查，漁村調查等種種調查報告，結果因上局的政策，迄今十餘年了，仍然沒有一份報告公諸於世。這又是另一個扭曲，結果現在的社會服務大多流於形式，唱歌、跳舞、像上山郊遊一般，某大學還訂做服務隊的制服，由教官帶隊。一些大學的社團比較獨立，但因缺乏經費和長期計劃，只能做一些慈幼性的工作。多數參與的年輕人挫折感都很大。我曾建議台大的社服同學把目標放低，不要奢求能立即解決問題，設法與當地民眾和地方政府的資源配合，配合當地居民的需要，長期工作，保持聯繫，並在報告寫文章、揭發問題，並讓當局了解問題。這是一種「辯護」的角色。大學生能做到這點就不錯了。

寧：聽來台灣大學生的社會服務與早年軍中的文康隊差不多，一下子就完了，好像不能與美國的和平團相比。至少和平團是經過有計劃的訓練。

記：六十、七十年代初期的台灣大學生不是忙着郊遊舞會便是啃教科書、考托福。參與社會服務的學生算是比較關心社會的。雖然多數的社會服務是流於形式，但至少給生長在溫室中的大學生上了一課活生生的社會學，讓他們知道台灣的山地、漁村和農村有什麼樣的問題存在。

蕭：沒錯，我絕不否認當年參與社會服務的學生，在十年後的現在是較其他人有社會良知的；例如幾位現任的年輕民意代表都是當年參與社會服務的。可是這並非學生運動的原意，而是被引入他途的副產品。我早年也曾參與耕莘文教院所辦的山地服務隊做有關山地研究的工作，那個山地服務隊是在保釣之前便存在的。當時又是教會的純愛心服務，所以能持續十幾年而挫折感較低。不像後來的大學生，雄心萬丈地想向社會進軍，結果發現不僅不能進軍，反而要撤退。

就一般社會運動而言，運動的情形可以用一個鐘型曲線表示。第一是「潛伏期」，這時社會上存在一些問題，也爆發過幾次事件，但不見得能提昇至運動的層面。若有人出面鼓吹，

組織，便有可能進入第二個階段——

「高潮期」，在高潮期，學者、專家參與，大家討論，政府和社會大眾都非常注意。第三階段是「制度化」。這時的運動已開始組織化。但組織可能由政府「兼併」掉，而開始沒落、僵化。若想維持草根性的活力便必須改變運動的口號和訴求對象。例如當政府的衛生署成立消費者中心後，我們便改提「立消費者保護法」，來改變訴諸對象。像當年大學生的社會服務運動便是在高潮以後被救國團和學校的教官制度化了，學生們因為不能提出新口號，整個運動便由生到死而結束了。環境運動目前只停留在潛伏期，能否提昇全賴今後大家的努力。消費者運動則已進入制度化階段了，假若我們能不斷提出新口號，一再改變訴求對象，就有可能不斷製造高潮，而使運動孳生不息。

後記

由於時間的關係，尚未涉及農業問題和勞工問題便不得不結束這次訪問。長期

居留海外的人言行一向比較開放，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我們仍然欽佩寧明杰先生關愛台灣的熱情。至於蕭新煌先生，一位長年留在台灣從事教學和研究者，竟能如此開放客觀的談論現實問題，祖國的胸襟令人佩服。臨別前，記者突然想起中共強制實施一胎化政策，便請蕭新煌教授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做為本文的結束。

「目前大陸實施一胎化政策顯然是從現實的人口問題出發，否則人口壓力會吃掉經濟成果，降低生活品質。這個方法如果行得通，或許可以解決十年之內的人口問題，但是到了公元二千年，老人問題便會很嚴重。能養老人的年輕人減少，依賴率高，屆時經濟困難可能比人口成長更嚴重。我懷疑大陸的一胎化政策，背後有沒有夠水準的人口研究做支持。再者，我非常不贊成他們的執行方式，施用壓力團體，強行墮胎，還灌輸小孩子「我不愛哥哥，我不愛弟弟……」。這種做法非常不民主、不道德、缺乏人道精神，同時也嚴重地破壞中國的家庭倫理。而且政府干涉人民的生活內容太多了，這次管生育，下一次可能是別的，結果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而無法收拾。一胎化的副作用實在太大了。」

您可以使

「夏潮」的讀者倍增

●夏潮論壇社

電話(〇二七)八四一九一

郵政劃撥帳號：七一四三六三王永帳戶

地址：台北市安居街八巷六弄五號三樓

零售每本八〇元，訂閱全年七三〇元。

●每一個「夏潮」的讀者，都認為「夏潮」是一本豐富而有思想文化深度的好雜誌。每一期「夏潮」的大部份文章，都有其他黨外雜誌文章所不常見的思想性、文化性、歷史性和批判性。在台灣中產階級黨外文化日趨荒蕪的今日，「夏潮」被進步的黨外知識份子、青年和群眾公認為中流砥柱。

●您！做為「夏潮」熱情的讀者，一定至少有一位談得來、互相知心的朋友。可是您却忘了把「夏潮」介紹給您的這位朋友，讓他也與您同樣享受閱讀「夏潮」時特有的知性的啟發。

●如果您常自問：我能為「夏潮」做什麼？那麼，我們建議您，把「夏潮」介紹給您的知心朋友。如果您是訂戶，現在就多訂一份送他。如果您每期零買，從現在起多買一本，介紹給他看。這樣，您就可以使您心愛的「夏潮」讀者倍增。因為一切進步的黨外知識份子、青年和群眾，都應該讀進步的「夏潮」！